

甘肅史志



2016.2

甘肅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

全省市州志办主任工作座谈会召开



2016年5月17日上午，全省市州志办主任工作座谈会在兰州召开。各市（州）志办主任，省史志办主任、副主任、副巡视员，各处负责人共30多人参加了会议。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张军利主持会议并讲话。张主任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市州志办主任工作座谈会，是在全面总结省政府与各市州政府签订的《2013—2015年地方史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考核情况、制定和实施全省地方志工作“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时间节点召开的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会议。三年来，各市州以《目标责任书》的签订为契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史志部门和队伍建设得到持续加强，二轮志书编修进度明显加快，年鉴工作取得长足进展，信息化建设水平不断提升，史志工作领域有了新拓展，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成绩、新进展、新提升。

对当前和下一阶段工作，张主任强调，要重点把握六句话，即：推广一条经验，就是持续推广落实“一纳入、八到位”这条成功经验；服务一个大局，就是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大局，充分发挥史志工作“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制定一个规划，就是制定并实施好省、市、县三级政府《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抓紧五项业务，就是抓紧抓好志书编修、年鉴编辑及信息化建设、地情资料编研、地方史编修等工作；建好两支队伍，就是适应新时期史志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努力建设好方志工作的专职队伍和兼职队伍；夯实一个基础，就是始终坚持抓基层、打基础，促进史志工作可持续发展。

会上，省史志办副主任钱旭、李振宇结合各自分管工作，就三年来各市州二轮市县志编修、年鉴工作和信息化建设情况进行了总结，剖析了当前工作存在的问题，并就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进行了翔实的安排部署。

（陈谦供稿）

贯彻落实全省地方志事业 “十三五”发展规划

钱 旭

随着“十三五”时期全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推进,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精神,制定印发了《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规划》是指导我省今后五年地方志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各级地方史志部门一定要抓好《规划》贯彻落实,努力开创地方志事业新局面。

抓好《规划》贯彻落实,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甘肃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第五次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十二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坚持方志工作正确方向,坚持依法治志,坚持全面发展,坚持改革创新,坚持质量第一,坚持修用并举,全面推动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繁荣。

抓好《规划》贯彻落实,就是要到2020年全面完成省、市、县三级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为启动第三轮修志做好准备;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做到一年一鉴;重视部门志、行业志、乡村志等各类志鉴和地方史编纂工作;加强地方志信息化建设,逐步建成多功能的信息化综合服务体系;推进方志馆、地情资料室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建设数字方志馆;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展示地方志成果,提高服务成效;实施精品工程,提升地方志质量。加强业务建设,拓展工作领域,基本形成修志编鉴、理论研究、质量保障、开发利用、工作保障“五位一体”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

抓好《规划》贯彻落实,就是要继续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部门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地方志工作体制,进一步强化地方志工作的法治保障、制度保障、经费保障、队伍保障、宣传保障,健全“一纳入、八到位”的工作机制。



甘 肃 史 志

季 刊

2016 年第 2 期
(总第 26 期)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1—0098 号

卷首语

贯彻落实全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钱 旭(1)

政策法规

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4)

工作论坛

甘肃地方志研究综述 ……………陈郑云(11)
陈云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历史文献 ………王 杰(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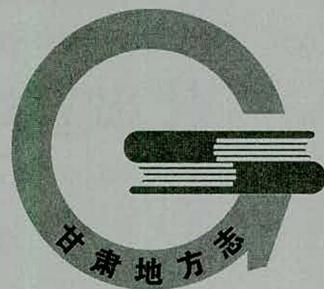
志鉴编研

浅谈二轮县志初审评审组织 ……………陈平军(24)
以前志为鉴试论二轮省志人物志的编纂 ……毛珏珺(26)
关于县级综合年鉴编辑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李春斌(29)
对地方综合年鉴中几个具体条目的探讨 ………王文生(31)

篇目选登

《民勤县志》(1986—2005)篇目 ……………(34)

录



历史回眸

- 平凉籍学人与《四库全书》……………朱克雄(40)
马廷秀在西和的几件事……………魏泽明(46)
民国时期定西的差徭……………张 慧(52)
杨土司与中央红军的一段往事……………银开源(53)

陇原人物

- 鞠躬尽瘁的老县长贺遐志……………贺红梅(55)
清代陇上二澍—张澍邢澍简介……………陈 谦(60)

史地考证

- 王基永湖南失踪之谜……………魏泽民(62)
岷县方言地名研究……………王小红(69)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民勤部队番号考……………孙明远(74)
世界文化遗产—瓜州锁阳城遗址……………李春斌 胡 艳(77)

乡土民俗

- 崇信县民俗“三绝”……………张 涛(79)

工作动态

- 甘肃省农垦事业办公室重视二轮修志工作……………(80)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 任:张军利

副 主 任:车安宁 钱 旭

李振宇 李拾良

编委委员:张正龙 贺红梅

石为怀 张占社

主 办 单 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甘肃史志》编辑部

主 编:张军利

副 主 编:钱 旭

编辑部主任:贺红梅

责任 编辑:梁兴明 陈 谦

孔令奇 石战涛

司德芳 高天成

王 旭

本期责编:陈 谦

联系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
南路 51 号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7821911

电子 邮箱:gsdfz911@163.com

印 刷:甘肃省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电 话:0931-8960384

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 年 5 月 23 日印发(甘政办发[2016]72 号)

为推进全省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充分发挥地方志工作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大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的通知》(国办发[2015]64 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基础与机遇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历史悠久,连绵不断。多年来特别是“十二五”以来,全省地方志工作按照“以三级志书为主体,以地方综合年鉴为主导,以信息化平台为依托、以服务社会为支撑”的总体工作思路,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大力推动地方志工作基础条件建设、业务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和理论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

——工作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基本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部门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体制。“一纳入”(即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八到位”(即“认识、领导、机构、编制、经费、设施、规划、工作”到位)的工作机制初步形成。

——法规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1985 年省人大作出《关于重视编修地方史志的决定》,2008 年省政府颁布《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2013 年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初步形成了我省地方志工作法规和政策体系。各地也相应制订了配套的制度规范,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责任,强化了地方志工作部门履行组织、指导、督促、检查的行政职能,地方志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程度显著提升。

——编修成果不断丰富。首轮修志任务全面完成,二轮修志稳步推进,年鉴编辑工作全面展开。累计出版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 272 部,部门志、行业志、乡镇(村)志 800 多部,综合年鉴、部门行业年鉴 400 多部,与现存 280 多部历代旧志和 2000 多册各类地情资料丛书,构成不断丰富的地方史志成果群。

——基础平台建设稳步推进。建成省级地情资料室 1 个,市州、县市区方志馆(地情资料室) 26 个。建成省级地方志网站 1 个、市州地方志网站 9 个,县市区地方志网站 30 个,方志馆(地情资料室)、地方志网站逐步成为研究地方历史、提供资政服务、开展地情教育的新载体。

——服务社会能力不断提升。各级地方志工作部门自觉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系统整理传统民俗文化,主动参与重大专题问题研究等,积极发挥促进区域文化交流、申报“世遗”“非遗”、寻根谒祖、旅游开发、申报地理标志产品等方面的作用,地方志工作资政、存史、教化、育人的功效日益彰显。

——理论研究逐步深化。紧密结合修志编鉴实践,积极开展理论研究,以《中国地方志》、《甘肃史志》等期刊和史志简报为平台,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志鉴理论研究成果,为志书编纂和年鉴编辑提供了理论指导。

目前,全省地方志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但也存在一些制约事业发展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少数地方和部门对地方志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够,地方志工作未纳入日常工作;个别市州、县市区地方志工作机构不健全,编制、人员、经费严重不足;现有队伍业务能力还不能适应修志编鉴的

需要,人员素质有待提升;方志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志书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信息化建设与方志馆建设进展滞后,基础条件有待改善等。这些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二、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甘肃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第五次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决策部署,锐意进取,改革创新,依法全面推动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繁荣。

(二)基本原则。1.坚持正确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通过编修和开发利用地方志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资信支持,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2.坚持依法治志。省地方志办公室依法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根据国家统一要求和我省实际及时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认真做好地方志文献和资料的搜集、整理、保存工作,有序开展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和开发利用工作,依法规范社会修志用志行为。各市州、县市区地方志工作机构依法做好各自职责范围内地方志工作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3.坚持全面发展。按照“志为主体,史志年鉴和信息化建设多元一体”的工作格局,统筹抓好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和各种专业志鉴编纂,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方志馆建设、理论研究、旧志整理、专题资料编写和地方史研究编纂及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等工作。4.坚持改革创新。在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修志传统的基础上,解放思想、探索规律、与时俱进,推动体制机制、理论方法、管理运作、能力素质等方面创新。利用“互联网+”等国家重大战略契机,整合汇聚全省地方志资源,打造“数字方志”、“智慧方志”,实现方志

资源开放共享。5.坚持质量第一。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确保志鉴质量。正确处理质量与进度的关系,将精品意识贯穿于地方志编纂出版工作全过程,严把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文字关、出版关,编纂出版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地方志成果。6.坚持修用并举。发挥地方志资源优势,围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大局,全面提升开发利用水平。拓宽用志领域,增强全社会修志用志意识,提升地方志工作服务社会效能。

三、总体目标与主要任务

(一)总体目标。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积极推进省、市、县三级方志馆(地情资料室)建设,进一步提升信息化水平,加强对社会修志的指导与管理,组织开展地方史的研究编纂,做好第三轮修志准备工作,基本形成修志编鉴、理论研究、质量保障、开发利用、工作保障“五位一体”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努力开创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新局面。

(二)主要任务。1.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到2020年,全面完成省、市、县三级二轮修志规划任务。按照《“十三五”时期二轮省志编纂规划表》(见附件1)、《“十三五”时期二轮市县志编纂规划表》(见附件2)进度要求,确保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全部出版。全面总结第一轮、第二轮修志工作经验,认真研究修志工作的组织管理、运作模式、续修方式等,为启动第三轮修志做好准备。2.提升地方综合年鉴工作水平。逐步做到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按照《“十三五”时期综合年鉴编纂规划表》(见附件3)进度安排,到2018年,县级以上综合年鉴全部启动;到2020年,实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加强对年鉴工作的业务指导和质量管理,推动年鉴工作改革创新,缩短出版周期,增强服务能力。3.重视部门志、行业志、乡镇村志等各专业志鉴和地方史编纂工作。加强对已开展和准备开展志鉴编纂工作部门、行业的业务指导和管理。指导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积极响应实施好中国名镇志、名村

志文化工程。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将地方史编写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统一规范管理。4.加强地方志信息化建设。按照分级建设、资源共享、安全高效的原则,加快省、市、县三级地方志网站建设进度。未完成地方志网站建设的市州、县市区要创造条件,尽快建成。已开通地方志网站的市州、县市区,要按照全国地方志事业信息化发展意见的有关要求,不断升级完善地情网站和地情资料库软硬件设施,广泛应用“互联网+”、微信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逐步实现修志编鉴的数字化、网络化,构建多界面、多渠道、多元化、全方位的信息化综合服务体系。5.推进方志馆建设。积极推进省方志馆的规划论证和争取立项工作和已立项的市州、县市区方志馆建设。提倡市州一级建设方志馆,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建设方志馆。暂不具备建设条件的市州、县市区要加强地情资料室建设和管理工作,确保各类藏书安全和读志用志需要。6.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编制全省旧志目录及旧志整理规划,统一整理出版全省历代方志集成。引导社会各界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推动地方志成果进校园、进机关、进军营、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等。加强对地方志资源的深加工,拓宽服务渠道,增强服务功能,创新服务手段,更好地贴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贴近人民群众需要。推动乡土文化建设,开展家谱、家训、家风、村规民约系列丛书征集和编纂工作,提升成果普及程度,培育地方历史记忆。7.深化地方志质量建设。严格执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出版规定》和我省《第二轮修志有关问题的几项规定》、《地方综合年鉴管理办法》等规定,规范地方志工作目标责任考核、督查通报、志书“一评三审”等制度,认真执行志书印刷出版有关规定,健全志书质量保障体系。实施精品志鉴工程,将地方志书、年鉴和学术成果纳入各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或有关图书评奖范围。建立落实各类志书、年鉴及各种地情资料向上级业务部门及方志馆呈报制度。8.开展地方志理论研究工作。制定全省地方志工作理论研究规划,加强对方志理论研究和当地历史文化研究的引导和支持。依托各级地方志学

会,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地方志理论研究和论文评选活动,活跃学术研讨,推动理论建设。

四、保障措施

(一)法治保障。认真履行《条例》、《规定》赋予的各项职责,切实提升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完善与《条例》、《规定》相配套的工作制度体系和实施细则,适时开展对《规定》的修订工作,并争取纳入省人大立法规划。开展政府行政执法检查和定期政务督查,依法纠正、查处执行不力和违法行为。

(二)制度保障。健全地方志工作部门主导、社会各界参与修志编鉴的工作格局。加强督促检查,健全和完善目标考核责任制、督查通报制,强化责任落实。健全完善地情资料收(征)集及管理制度、修志编鉴业务制度和主编(总纂)责任制,保证在组织启动、篇目设计、资料收(征)集、初稿编纂、总纂统稿、志(鉴)稿评议、审查验收、出版发行、报送备案等环节均有章可循、有序推进。

(三)经费保障。改善地方志工作部门条件,保障修志编鉴、印刷出版、方志馆与信息化建设、开发利用、图书资料文献保存、对外交流等经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把地方志事业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做到足额及时拨付。省财政要支持做好省志各分卷出版工作和修志人员培训等工作的经费保障。

(四)队伍保障。各级地方志工作部门的设置和人员编制,要与其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的要求相适应。各市州、县市区地方志办公室、承担省志编纂工作的省直部门应在保证编制内人员到位的情况下,根据工作需要,按照专兼职相结合的办法,解决好地方志编纂工作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加大对全省地方志部门负责人、志鉴主编(总纂)、修志业务骨干的专项培训力度,实现修志编鉴人员岗前培训全覆盖、培训工作常态化。建立省级地方志工作专家库,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熟悉省情地情的老同志参与志书编纂审核工作。建立干事创业的激励机制,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开展全省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活动。

(五) 宣传保障。充分运用新闻媒体和新兴媒介,以及各级地方志工作部门的宣传平台,大力宣传地方志工作部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新举措、地方志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绩、地方志工作者投身现代化建设的新贡献。挖掘地方志资源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推出一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地方志成果精品。

五、加强组织领导

继续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部门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地方志工作体制和“一纳入、八到位”的工作机制。依法依规理顺工作关系,进一步明确和强化政府修志主体责任,各市州、县市区政府及省志各分卷承编单位主要

负责人为修志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是直接责任人。

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各承编单位要根据本规划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地区、本部门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或实施方案,全面提高地方志工作水平,确保全省地方志事业平稳、有序、健康发展。

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要对本规划落实和执行情况每年进行督促检查,并将督查情况报告省政府。

- 附件:1.“十三五”时期二轮省志编纂规划表
2.“十三五”时期二轮市县志编纂规划表
3.“十三五”时期综合年鉴编纂规划表

附件 1

“十三五”时期二轮省志编纂规划表

志书名称	承编单位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建置志	省地方志办公室	修改完善,提交复审、终审	—	—	—	—
地震志	省地震局	修改完善,提交复审、终审	—	—	—	—
政府志	省政府办公厅	修改完善,提交复审、终审	—	—	—	—
军事志	省军区	修改完善,提交复审、终审	—	—	—	—
农业志	省农牧厅	通过初审,提交复审、终审	—	—	—	—
水产畜牧志	省农牧厅	通过初审,提交复审、终审	—	—	—	—
农垦志	省农垦事业办公室	修改完善,提交复审、终审	—	—	—	—
财政志	省财政厅	通过初审,提交复审、终审	—	—	—	—
卫生志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修改完善,提交复审、终审	—	—	—	—
档案志	省档案局	通过初审,提交复审、终审	—	—	—	—

“十三五”时期二轮省志编纂规划表

志书名称	承编单位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商务志	省商务厅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
国土资源志	省国土资源厅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
政协志	省政协办公厅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
人民代表大会志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完成资料收集,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工业经济志	省工信委	完成资料收集,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出版志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完成资料收集,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民政志	省民政厅	完成资料收集,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信息产业志	省通信管理局	完成资料收集,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粮食志	省粮食局	完成资料收集,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审判志	省高级法院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 完成资料收集,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环境保护志	省环保局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 完成资料收集,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质量技术监督志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 完成资料收集,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邮政志	省邮政管理局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 完成资料收集,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报业志	省委宣传部	完成资料长编,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检验检疫志	甘肃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 完成资料收集,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铁路志	兰州铁路局	完成资料收集, 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测绘志	省测绘局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 完成资料收集,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军事志·人民防空志	省人防办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
地理志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 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金融志	人行兰州中心支行、甘肃银监局、甘肃证监局、甘肃保监局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 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人口和计划生育志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 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外事志	省外事办公室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 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侨务志	省外事办公室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 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供销合作志	省供销合作联社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 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 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 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 提交复审、终审	—

“十三五”时期二轮省志编纂规划表

志书名称	承编单位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概述	省地方志办公室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提交复审、终审	—
民主党派工商联志	省委统战部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提交复审、终审	—
宗教志	省宗教局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提交复审、终审	—
建设志	省建设厅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提交复审、终审	—
公路交通志	省交通运输厅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提交复审、终审	—
扶贫志	省扶贫办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提交复审、终审	—
发展计划志	省发展改革委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提交复审、终审	—
物价志	省物价局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提交复审、终审	—
海关志	兰州海关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提交复审、终审	—
旅游志	省旅游局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提交复审、终审	—
文物志	省文物局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提交复审、终审	—
工会志	省总工会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提交复审、终审	—
残疾人工作志	省残联	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提交复审、终审	—
生物志	省地方志办公室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修改完善	提交复审、终审
统计志	省统计局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修改完善	提交复审、终审
共产党志	省委办公厅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修改完善	提交复审、终审
民族志	省民委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修改完善	提交复审、终审
人物志	省地方志办公室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修改完善	提交复审、终审
司法行政志	省司法厅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修改完善	提交复审、终审
文化志	省文化厅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修改完善	提交复审、终审
妇女志	省妇联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修改完善	提交复审、终审
劳动和社会保障志	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修改完善	提交复审、终审
附录	省地方志办公室	制定编纂方案、编纂大纲,完成资料收集	完成资料长编,编写初稿	完成初稿,征求意见,修改完善	通过初审,修改完善	提交复审、终审

“十三五”时期二轮市县志编纂规划表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出版	终审	评议	出版	终审	评议	出版	终审	评议	出版	终审	评议	出版	终审	评议
兰州	七里河 安宁	兰州		兰州					榆中 红古				榆中 红古		
嘉峪关	嘉峪关														
金昌	金昌														
酒泉															
张掖	临泽 高台		民乐		民乐	肃南 山丹	民乐	肃南 山丹	张掖 甘州	肃南 山丹	张掖 甘州		张掖 甘州		
武威	武威 民勤	凉州		凉州											
白银						靖远		靖远			靖远				
天水			清水 秦州 麦积		清水 秦州 麦积	甘谷 秦安 张家川	清水 秦州 麦积	甘谷 秦安 张家川	天水 武山	甘谷 秦安 张家川	天水 武山		天水 武山		
平凉		庄浪	华亭	庄浪	华亭	灵台	华亭	灵台	泾川	灵台	泾川		泾川		
庆阳	镇原		西峰 庆城		西峰 庆城	环县 宁县	西峰 庆城	环县 宁县		环县 宁县					
定西						安定 岷县		安定 岷县		安定 岷县					
陇南	康县					陇南 武都 文县 徽县		陇南 武都 文县 徽县	成县 礼县	陇南 武都 文县 徽县	成县 礼县		成县 礼县		
甘南	迭部		甘南		甘南	碌曲 夏河	甘南	碌曲 夏河	卓尼	碌曲 夏河	卓尼		卓尼		
临夏	康乐 东乡		临夏州 临夏县		临夏州 临夏县	广河	临夏州 临夏县	广河	积石山	广河	积石山		积石山		

注:表格中所列市州、县市区均代表列入修志规划的二轮市州、县市区志。

“十三五”时期综合年鉴编纂规划表

市(州)	已经开展	2016 年出版	2017 年出版	2018 年出版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安宁区、榆中县、皋兰县	西固区	七里河区	红古区、永登县
酒泉市	市、县区全覆盖			
嘉峪关市	市、县区全覆盖			
金昌市	金昌市	金川区、永昌县		
天水市	市、县区全覆盖			
武威市	市、县区全覆盖			
张掖市	市、县区全覆盖			
白银市	市、县区全覆盖			
平凉市	平凉市、崆峒区、崇信县、庄浪县	灵台县、华亭县、静宁县		泾川县
庆阳市	市、县区全覆盖			
定西市	定西市、岷县、临洮县		安定区、通渭县、陇西县、漳县、渭源县	
陇南市	陇南市、成县		宕昌县	武都区、两当县、徽县、西和县、礼县、康县、文县
临夏州	临夏市、康乐县、永靖县、和政县	临夏县	广河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县	临夏州
甘南州	甘南州、舟曲县	合作市、迭部县、夏河县	卓尼县	临潭县、碌曲县、玛曲县

甘肃地方志研究综述

陈郑云

摘要:甘肃地方志的纂修源远流长,从魏晋南北朝的地记、隋唐的图经、至宋元以降定型的方志,无不备存。文章主要研究的“甘肃方志”是指甘肃行政区划所在区域内从魏晋到民国官方及私人编纂的地方志资料,从宏观性综合研究、微观性个案研究、甘肃古旧方志的整理等三个方面展开回顾与总结,以期梳理出甘肃地区地方志研究的现状,旨在让甘肃地区地方志的研究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甘肃地区;地方志;研究综述

甘肃地方志的纂修源远流长,从魏晋南北朝的地记、隋唐的图经,至宋元以降体例完备的方志,无不备存。据不完全统计,从魏晋至民国年间,甘肃纂修方志见于各类文献记载的约有349种,保存至今的约有208种。甘肃方志数量多,因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历来受学界重视。本文提到的“甘肃方志”是指甘肃行政区划所在区域内从魏晋到民国官方及私人编纂的地方志资料,这些志书成为史地学领域研究者倚重的参考资料。但目前学界对其本身的研究却多集中在对志书目录整理、作者考辨、成书背景、方志发展史等问题上,较全面地对甘肃方志作专门纵深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

总体来看,目前学术界对甘肃方志研究的关注度仍不够,对于甘肃方志既有研究和今后发展趋势仍缺乏必要的总结和思考,这一状况显然与甘肃方志的历史价值及地位不太相称。综观目前学术界对甘肃地方志的研究,其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对甘肃地方志的宏观性综合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甘肃地方志的宏观综合研究,主要成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地方志目录的整理与研究

张维《陇右方志录》、《陇右方志录补》(1934年)是西北地区第一部总结性的方志目录。凡当时所见的西北方志,均收录无遗,二书合计收录方志329部,其中现存西北方志共10部。该书分类明确,考证精审,评价得当。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甘肃省》,第172~182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一书,共收录自秦汉至元代的方志2200多种,凡元代以前旧志存遗文一条以上者皆加以辑考,逐条记录佚文所在之书名、篇卷,其中涉及甘肃佚志二十余种。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收录甘肃较为重要的古旧地方志181部,但存在着许多不足与错误。王继光《陇右方志录补正》(《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对张维《陇右方志录》补正126种。张令瑄《三陇方志见知录》(连载于《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1995年第1期)、《明代庆阳府各志考述——三陇方志见知录补稿》(《图书与情报》1995年第3期)整理、辑补、笺注张维先生遗稿数十种。易雪梅《〈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甘肃方志著录校读记》(《图书与情报》1995年1期)一文,分纂修与刻版年代有误、卷数有误、书名与纂修者有误等三种类型详细分析考订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收录的181种甘肃古旧方志著录中的舛误、疏漏之处约三十余处,同时,将该联合目录未收录的八部志书做了提要。《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金恩辉、胡述达:《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甘肃》,第26-1-3,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中的甘肃省部分主要由邵国秀和易雪梅纂修,在《甘肃省地方志述评》中所述主要据邵国秀《甘肃省地方志考略》(《图书与情报》1994年第1~2期)一文而成。易雪梅、刘瑛《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统计现存甘肃地方志 222 种。王立明在《新中国建立后大陆影印出版的甘肃旧方志》(《甘肃史志》2012 年第 4 期)一文中,系统梳理了建国后大陆影印出版的甘肃旧方志目录。马新建在《甘肃历代方志目录整理情况研究》(《甘肃史志》2015 年第 1 期)一文中,总结了甘肃历次方志目录整理情况,分析了方志目录整理的特点与不足。

(二)关于方志发展史的研究

牟实库《甘肃地方志述略》(《图书与情报》1982 年第 1 期)一文,主要探讨甘肃方志修撰的历史背景和源流,对甘肃省图书馆所存方志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周丕显编著《甘肃方志述略》(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1988 年版),该书是有关甘肃地方志的第一部论文集专著,收录有周丕显《甘肃方志略谈》、牟实库《甘肃方志简介》、张令瑄《三陇方志见知录》、赵世英和张季容《临洮地方志简介》、牟实库《陇西地方志浅议》等 12 篇论文。王丽娜《甘肃地方志源流述要》(《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6 期),主要对甘肃地方志的修撰源流进行简要叙述。王迎喜《例谈甘肃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张掖师专学报(综合版)》1991 年 1 期)以水利开发、矿藏开采、旅游业的发展、对外交往以及总结自然灾害的规律等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几个方面,以实际事例谈甘肃地方志的史料价值。邵国秀《甘肃省地方志考略》(《图书与情报》1994 年第 1、2 期),先后对甘肃地方志发展史作一简单梳理,主要对两汉至南北朝的地记及唐代地记与图经的存佚、作者、著录及时代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易雪梅、李淑芬《西北地区地方志概述》(《西北史地》1997 年第 1 期),主要对西北地方志的发展源流进行梳理,涉及对甘肃地方志的简要叙述。郝玉屏主编、高子贵、金钰铭副主编《甘肃方志通览》(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是一部介绍甘肃方志资料最丰富的专业书籍,内容上追溯至两汉,下止于 2005 年年底,全书上编为甘肃方志编修史略,按时序记述历代方志编修的情况以及成果和特点,下编为甘肃古今方志编修系年录,以 1949 年为界,分两章载录旧志编修和新编地方志工作要事。车安宁在《甘肃历史上的方志编修》(《甘肃日报》2013 年 6 月 24 日)一文中,系统梳

理了从汉魏至民国末甘肃历史上编修方志的概况。

(三)地方志的收藏与整理研究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 1990 版)重刊《秦安志》、《安定县志》、《通渭县志》、《平凉府志》、《甘镇志》、《朔方新志》等六部地方志。易雪梅《甘肃省图书馆藏古籍述略》(《图书与情报》2002 年第 2 期),对现存甘肃地区流传较少、文献价值较高的稀见方志做了介绍。屈直敏在《近百年来甘肃汉唐方志整理研究综述》(《中国地方志》2011 年第 7 期)中,总结分析了近百年国内外有关甘肃汉唐散佚方志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表现在存目稽考、佚志辑校、综合研究等方面。王立明在《台湾整理出版的甘肃旧方志简介》(《甘肃史志》2012 年第 2 期)一文中,介绍了台湾现存的甘肃旧方志及其整理出版情况。王立明、魏霁虹在《日本馆藏甘肃史志知多少》(《甘肃史志》2010 年第 3 期)一文中,介绍了日本藏存的甘肃古旧地方志 75 种。高启安在《谈谈地方志的整理和研究——以〈肃镇华夷志〉为中心》(《甘肃史志》2013 年第 4 期)一文中,以《肃镇华夷志》为中心论述了地方志的作用和价值,分析了目前地方志整理中的一些问题。

二、对甘肃地方志进行的微观性个案研究

目前学界对甘肃地方志进行的微观性个案研究,主要成果有:

(一)方志名家的研究

一是对张澍的研究。张澍,凉州府武威县(今武威市)人,清代方志学家,有《续黔书》、《蜀典》、《十三州志》等数十种著作传世。关于张澍及其方志学成就的研究主要有:崔云胜《试论张澍〈续敦煌实录〉的特点与价值》(《河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6 期)一文,认为《续敦煌实录》从体例上讲,具有章学诚所说“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特点,从内容上看,搜罗广泛、征引博洽,十分丰富。崔云胜《论张澍〈凉州府志备考〉的特点与价值》(《中国地方志》2009 年第 9 期)一文,认为《凉州府志备考》在编纂上具有内容丰富全面、引征广博、考证严谨等特点,对我们今天研究武威地区的历史、进行方志编纂以及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和贡

献。漆子扬《清代方志学家张澍五种方志著述论略》(《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2期)一文,对张澍著述的《续黔书》、《蜀典》、《大足县志》、《泸溪县志》、《凉州府志备考》五种方志做了论述,认为张澍方志著作长于考证,门类简明;注重掌故,引用材料必注出原书;收录人物注重行谊,标榜人师;反对滥收风花雪月之作,以侈卷篇的编纂方法;提倡严谨的治学态度。刘应禄《论张澍及其西北史地学成就》(《鸡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一文,论述了张澍在辑佚学、姓氏学、方志学、金石学、西夏学、敦煌学等领域的研究,重点论述了在西北史地学的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杜志强《古代陇人的史著与史学》(《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一文,对古代陇人独著、编撰、参撰的史学著作做了系统梳理,其中涉及张澍的方志著作及思想。张蕾蕾《张澍及其西南方志编纂考察》(《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一文,对张澍编撰的《续黔书》、《蜀典》、《大足县志》等三部地方志做了评述,认为这些志书保存了川黔地区大量稀见史料,同时也为后世西南地区的方志编修树立了典范。

二是对胡纘宗的研究。胡纘宗,秦州秦安(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人,明代方志学家,有《安庆府志》、《苏州府志》、《秦州志》等14部著作传世。关于胡纘宗及其方志学成就的研究主要有:刘雁翔《明代陇右学者胡纘宗生平事迹及方志著述考》(《中国地方志》1999年第5期)一文,对甘肃秦安籍方志学家胡纘宗的生平、著述、方志理论等综合研究。胡喜成《胡纘宗学术思想概论》(《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一文,对胡纘宗从学术思想、诗文艺术、方志与书法等方面全面论述,论及其方志学思想与成就。汪祚民《胡纘宗〈安庆府志〉卷数理惑》(《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期)一文,对胡纘宗编纂《安庆府志》的卷数做了分析。

三关于张维的研究。张维,甘肃临洮人,近当代方志学家,有《陇右方志录》、《仇池国志》、《甘肃青海土司志》等。关于张维及其方志学成就的研究主要有:王鐸《张维与〈陇右方志录〉》(《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一文,概述了

张维的生平事迹,对《陇右方志录》做了简要评介。王希隆《张维先生学术述略——〈还读我书楼文存〉序》(《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一文,其中分析了张维的史学造诣及其成就,重点论述了张维史识及对史料的重视。陈尚敏《张维〈陇右方志录〉学术思想分析》(《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9期)一文,对张维方志学术思想做系统论述。

(二)对甘肃下辖各地区方志研究

一是对酒泉地区旧志的研究。田建良、尚骅、谢继忠《敦煌地方志简介》(《张掖师专学报(综合版)》1994年第2期)一文,主要对敦煌地区的14种方志进行介绍。吴浩军《酒泉古旧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河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一文,主要对酒泉地区自东晋十六国时期至民国时期所编修的地方志及其他带有方志性质的文书约有30余种存佚及研究整理情况进行概述。

二是对张掖地区旧志的研究。田建良、尚华《张掖地方志浅议》(《张掖师专学报(综合版)》1988年第1期)一文,评述了对张掖方志自明代创修以来现存的四种方志,从编纂体例、体制、内容等。吴浩军《张掖古旧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图书与情报》2007年第6期)一文,主要对张掖地区自隋唐至民国时期编修的地方志及其他带有方志性质的史地杂志约有32种的存佚及研究整理情况进行简要概述。

三是对武威地区旧志的研究。李万禄《南京大学图书馆藏〈镇番县志〉小考》(《图书与情报》1983年第1期)一文,对南京大学图书馆藏《镇番县》相关问题做了考辩。李玉寿《镇番县志考略》(《图书与情报》1983年第04期)一文,对镇番县(今民勤县)现存的四种方志做了述评。栾晓丽《简评道光〈镇番县志〉》(《知识经济》2009年第12期)一文,简要评述了《镇番县志》的体例内容。田建良、尚华《武威地方志简介》(《张掖师专学报(综合版)》1989年第1期)一文,主要对武威地区的11种地方志进行简要介绍。吴浩军《武威古旧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一文,主要对武威地区自隋唐至民国所编修的地方志及其他带有方志性质的史地杂志40余种

就其存佚及研究整理情况进行考查并作概述。

四是对兰州地区旧志的研究。王干一《张国常和他的〈重修皋兰县志〉》(《兰州学刊》1983年第1期)一文,论述了张国常的生平事迹及其《重修皋兰县志》的编修情况。

五是对平凉地区旧志的研究。张令瑄《平凉三志综述》(《图书与情报》1986年4期、1987年1期),先后对明赵时春《嘉靖平凉府志》、清嘉庆《平凉府志》及近人郑浚《平凉县志》三部志书做了概括介绍。

七是对庆阳地区旧志的研究。穆长青《〈庆阳府志〉〈宁州志〉〈正宁县志〉》(《图书与情报》1984年Z1期)一文,对庆阳地区的《庆阳府志》等三部方志清代所修的方志做了介绍。刘治立《明清时期的几种〈庆阳府志〉》(《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嘉靖、顺治、乾隆等版本《庆阳府志》的性质、内容和写作特征。王立明《现存三种清乾隆〈新修庆阳府志〉版本考辨》(《甘肃史志》2013年第2期)一文,对现存乾隆年间编修的三种《新修庆阳府志》的版本进行考辨。

八是对定西地区旧志的研究。牟实库《陇西地方志浅议》(《图书与情报》1985年第1期)一文,系统梳理了陇西历史上历代编修方志情况,对重要方志做了概述。赵世英《临洮县地方志略说》(《图书与情报》1982年4期)一文,系统介绍了自明代到民国时期临洮县地方志的编修情况。赵世英、张令瑄《万历本〈临洮府志〉》(《图书与情报》1984年第4期)一文,分析了万历本《临洮府志》的编纂特点及其史料价值。

九是对天水地区旧志的研究。刘雁翔《天水稀见方志考录》(《天水师院学报(综合版)》2000年第3期)一文,对未被《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8部天水地区地方志书的作者、卷目、编修过程、体例优劣、史料价值等都做了详细的考述。

十是对陇南地区旧志的研究。赵逵夫《〈徽郡志〉序》(《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认为明代《徽郡志》有现成材料可资利用者叙述较详,新增部分较为简略。崔阶《从民国版〈新纂康县县志·叙〉看修志者的史志观念》(《甘肃高师学报》2008年第3期)一文,通过对民国版《新纂

康县县志》共有六篇叙(序)分析,认为其内容反映了当时修志者的史志观念是坚持为“为政者”服务,忠于历史事实、重视方志的认识作用,修志事关重大、既要集思广益、又要分工协作,坚持严谨的修志态度、讲求科学的修志方法。陈启生、冯晓燕《地方志记述的甘肃白龙江下游地区地质灾害》(《甘肃史志》2011年第3期)一文,以陇南地区的《阶州直隶州续志》、《文县志》等志书为中心,分析了白龙江下游地区的地质灾害。

十一是对临夏地区旧志的研究。张思温《临夏地方志提要》(《图书与情报》1982年第2期)一文,对临夏地区的现存古旧方志做了提要性介绍。

十二对其他旧志的研究。安维翰《安维峻及其总纂之〈甘肃新通志〉》(《图书与情报》1985年第Z1期),对安维峻及其总纂的《甘肃新通志》做了述评,认为该志编修态度严谨、秉笔庄重。吴振清《四种久佚史籍简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年第2期)一文,对(东晋)喻归《西河记》、(汉)侯瑾《汉皇德传》、(南朝梁)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和(刘宋)武敏之《三十国春秋》四种史籍进行简要介绍。

(三)对方志个案的研究

一是对《河州志》的研究。杨聪聪《〈河州志〉所见明代藏事辑考》(中央民族大学硕士,2007年)一文,以明吴祯《河州志》和清王全臣《河州志》为主,分析了明代河州与藏事相关的政治沿革、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番族风物等诸多历史事项,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明朝对藏区的治理措施。武沐、杨燕霞《嘉靖〈河州志〉考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一文,认为嘉靖《河州志》的特点在于难能可贵的原创性、不可或缺的边镇特色、其中包括对于屯田的关注,对于河州卫所规模、里甲、体制等特殊性的记载;鲜活的移民文化;不无遗憾的简约。李淮东《嘉靖〈河州志〉相关问题考述》(《黑龙江史志》2012年第9期)一文,对嘉靖《河州志》撰修的历史背景、撰修过程以及修志者的治史意识等方面的问题加以初步的探讨。李淮东《嘉靖〈河州志〉所见明代河州社会》(《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1期)一文,以《河州志》为中心,研究明代河州社会是一个以儒学教化为基础的,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地方社会,该社

会由多民族构成,经济以农业为主,辅以畜牧业、手工业等,是西北地区典型的移民社会、多元文化和经济多样化社会的融合体。

二是关于《凉州异物志》的研究。王晶波《凉州异物志佚文考辨》(《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异物志的编纂及其种类》(《社科纵横》1993年第4期)、《汉唐间已佚异物志考述》(《北京大学学报进修教师访问学者专刊》[2000年])三篇论文对《凉州异物志》的佚文、相关《异物志》的编纂、种类、辑佚等进行较为全面的考证。

三是关于刘昉《敦煌实录》的研究。刘隆有《实录究竟源起于何时》(《兰州学刊》1984年第2期)、汪受宽《五凉史家刘昉与实录史体》(《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及《实录史体起源于〈敦煌实录〉说》(《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岳纯之《说〈敦煌实录〉》(《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四篇论文则从实录体裁的角度对刘昉《敦煌实录》进行不同的探讨。此外,阎廷亮《五凉敦煌学者刘昉述论》(《张掖师专学报(综合版)》1992年第2期)及《敦煌学者刘昉述论》(《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伏俊琰《刘昉的生平和著述》(《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三篇论文对刘昉《敦煌实录》也略有述及。

四是关于《沙州记》的研究。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段国〈沙州记〉集注》(《游牧社会史探》第10册,1961年版)一文,主要以张澍所辑《沙州记》20条为蓝本,考证其佚文编排顺序,详注佚文的出处,对张氏辑文的讹误脱漏及混乱,佚文中的地名、水道等的今地今名进行校注,并指出张氏所辑佚文的第二条后半部分文字、第六条、第八条、第二十一条为误辑。屈直敏《南朝刘宋段国〈沙州记〉考略》(《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4期)一文,认为段国《沙州记》之沙州并非今甘肃敦煌之沙州,而是今青海贵南之沙州,两晋南北朝之际属吐谷浑疆域。

五是关于《阶州志》的研究。王干一《略论〈阶州直隶州续志〉》(《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一文,对光绪年间编修的《阶州直隶州续志》做了简要评论。

(四)地方志著作的述评

吴浩军《评〈肃镇华夷志校注〉》(《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一文,对《肃镇华夷志校注》一书进行评介,认为该书考辨了其名称和版本、校勘、笺注900余条,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王阳、王杰《〈肃镇华夷志校注〉述评》(《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一文,认为《肃镇华夷志校注》有慧眼识珠、价值再现,珍贵史料面世、研究有据可依,校勘精慎、注释详赡三个特点。来新夏《〈阶州志集校笺注〉序》(《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7期)一文,对《阶州志集校笺注》成书的缘起、校注特点、主要成就做了简要介绍。吴浩军《文献可徵 瑰宝重光——〈肃州新志校注〉的文献价值和校注成就》(《河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一文,认为《肃州新志校注》校勘精审,注释详尽,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雍际春《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评〈明清秦安旧志集注〉》(《甘肃日报》2012年11月14日)一文,认为《明清秦安旧志集注》态度严谨,方法科学;考镜源流,校注翔实;视野开阔,学术性强,作为秦安明清旧志不可替代的这种价值和功用,会愈益明显地凸现出来。何茂活《古志校注 危乎难哉——〈甘州府志校注〉得失论》(《新疆地方志》2012年第3期)一文,认为《甘州府志校注》是校注者倾力结撰而成的心血之作,具有校点精审、注解详明、释义确当、资料丰赡等特点。

三、甘肃古旧地方志的整理

古旧方志是地域文化未曾间断的历史见证,发挥了积累、传播知识,嬗递文化传统,保存精神财富的巨大作用。古旧方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古籍的整理利用,有利于推进文化建设。甘肃古旧志整理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旧志整理校点、校注出版及重印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旧志整理出版

一是正式出版整理校点的旧志。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叶恩沛修、吕震南纂,曾礼、樊执敬校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这是甘肃省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旧志整理校点本,并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目录。《拉卜楞寺志》,藏文,阿芒班智达著,毛兰木嘉措校订,甘肃民族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乾隆《甘州府志》,钟赓起

纂、张志纯等校点，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年 3 月出版。顺治《重刊甘镇志》，杨春茂纂、张志纯等校点，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6 年 2 月出版。康熙《静宁州志》，黄廷钰修；乾隆《静宁州志》，王垣修，魏柏树校点，合为一册，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4 月出版。嘉靖、乾隆《庆阳府志》，傅学礼、杨凤藻撰，张耀民校点，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出版。民国《创修临泽县志》，高季良总纂，张志纯等校点，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1 年 8 月出版。《高台县志辑校》，张志纯等校点，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出版。清《重修肃州新志·高台县》、民国徐家瑞《新纂高台县志》、民国冯周人《高台县要览》三志合一，张志纯等校点，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出版。

二是内部印行整理校点的旧志。民国《庆阳县志稿》，张精义编纂，庆阳县志编委会校点，1984 年印行。光绪《文县志》，长赉纂，政协文县委员会、文县县志编委会标点，1984 年铅印。道光《凉州府志备考》，张澍纂，杨常青等校点，武威地方志办公室 1986 年分上中下三册铅印。乾隆《清水县志》，朱超纂，崔岫、蒲维章校点，清水县志办公室 1986 年眷印。嘉靖《秦安志》，胡纘宗纂，刘绳祖等校点，秦安县志办公室 1987 年 3 月眷印。民国《临潭县志稿》，马志清修、陈考三纂，李宗宪校点，甘南州地方志办公室 1988 年 5 月油印。民国《甘肃人物志》，张维纂，赵茆、牛得权校点，1988 年 6 月《西北师范大学学报》以增刊名义内部铅印。《麦积山石窟志》，冯国瑞著，1941 年陇南丛书编印社石印，张鹏举校点，由作者亲属、天水市政协委员周贞吉 1989 年自费铅印。同治《崆峒山志》，张伯魁纂，嘉庆《柳湖书院志》，朱愉梅纂，仇非整理标点，平凉地方志办公室 1993 年 7 月内部铅印。道光《山丹县续志》，党行义纂，黄玉霞续纂，山丹县地方志办公室校点，1993 年铅印。顺治《灵台县志》，黄居中纂辑，郑行健校点，政协灵台县委员会 1997 年 9 月内部准印。清《伏羌县志》，巩建丰编纂，牛勃、狄宝正等校点，内部铅印。清《庄浪县志略》，邵陆编，庄浪县志办整理，2000 年内部准印。

(二)旧志校注

古旧方志保护与利用是一项具有重要性、长

期性和艰巨性的工作，近年来甘肃在旧志校注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是对单本志书的校注出版和对区域性类似志书的集校出版。

一是单本校注出版。《五凉全志校注》，张克复等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6 月出版。《肃镇华夷志校注》，李应魁撰，高启安、邵惠莉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6 年出版。《肃州新志校注》，吴生贵、王世雄等校注，中华书局出版 2006 年 12 月出版。《重修肃州新志校注》黄文炜、沈青崖纂，吴生贵、王世雄等校注，中华书局出版 2008 年 12 月出版。《甘州府志校注》，钟赓起纂，张志纯校注，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2008 年 6 月出版。《皋兰县红水分县采访事略校注》，2008 年，由高启安校注，附载于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之《景泰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一书。《中华民国安西县志》，李春斌校注，内部批准发行。

二是集校合订出版。《岷州志校注》，将康熙《岷州卫志》、康熙《岷州志》、光绪《岷州续志采访录》三志合一，王兆祥、梁凤德等校注，岷县志编委会办公室 1988 年铅印。《靖远会宁红水县志集校》，李金财、白天星总校注，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2 年 9 月出版。《东乐县志》、《创修民乐县志》校注合订本，刘汶、张志纯等校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 年出版。《明清秦安旧志集注》，将明清三部秦安旧志集中校注，杨维俊为总纂、张德友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4 月出版。《阶州志集校笺注》，将明万历《阶州志》、清康熙《阶州志》、乾隆《直隶阶州志》、嘉庆《武阶备志》和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五部阶州志结集校注，曾礼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4 月出版。

(三)旧志重印

民国《金塔县志》，金塔县人民委员会 1957 年油印。民国《鼎新县志草编》，金塔县人民委员会 1957 年油印。康熙《河州志》，临夏县图书馆油印。民国《新修张掖县志》，张掖县革委会 1957 年油印。乾隆《新修庆阳府志》，华池县志编写组 1979 年复印。乾隆《永昌县志》、嘉庆《永昌县志》、民国《续修永昌县志》，永昌县政府 1983 年合为一册铅印。乾隆《泾川志》，泾川县文化馆 1981 年影印。宣统《甘肃新通志》，兰州古籍书店 1986 年复印。民

国《甘肃人物志》，兰州古籍书店 1986 年复印。康熙《巩昌府志》，兰州古籍书店 1985 年复印。乾隆《狄道州志》、宣统《狄道州续志》，临洮县志办公室 1986 年重印。乾隆《皋兰县志》、道光《皋兰县续志》、民国《兰州古今注》，兰州古籍书店 1985 年复印。道光《敦煌县志》，甘肃中医学院 1985 年复印。另外，1990 年 10 月，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委会编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收录影印旧志 47 种（部），兰州古籍书店内部出版（学苑出版社 2012 年 3 月出版），重要者有：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升允、长庚修，丁喜翰、安维峻纂；民国《甘肃通志稿》，刘郁芬修，杨思、张维等纂；民国《甘肃省乡土志稿》，朱允明撰；民国《甘肃省志》，白眉著；明《安定县志》，恽应翼修，张嘉孚纂；明《通渭县志》，刘世纶修，自我心纂；清《皋兰县续志》，黄璟、秦维、岳原纂，陆芝田，张廷选续纂；民国《古浪县志》，李培清修，唐海云纂；民国《重修漳县志》，韩世英修；民国《鼎新县志》，张应麒，蔡廷孝纂；光绪《打拉池县丞志》，廖丙文修，陈希魁等纂，[民国]张维补辑；清《金县新志》，耿喻修、郭殿邦纂；清《靖远县志》，李一鹏等纂；清《宁远县志》，冯同宪修、李樟纂；清《宁远县志续略》，于缙周撰；清《正宁县志》，折遇兰修；清《文县志》，江景瑞纂修；清《玉门县志》，佚名；光绪《肃州新志稿》，吴人寿、何衍庆纂；光绪《洮州厅志》，包永昌纂；嘉庆《河州志》，吴楨纂；民国《和政县志》，马凯祥修。

结语

古旧地方志存在着诸多缺点，但总的来说，仍不失其史料价值。因为凡研究地方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物古迹、民族史、军事史等，无不重视或取材于地方志。地方志资料，不仅可补正史之不足，其资料价值也是其他历史文献不可替代的。纵观甘肃地方志研究现状，硕果累累，但其中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因此，应重视甘肃地方志的辑佚、校勘和考订，为科学研究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一，是甘肃地区方志研究的数量有限。与全国其他省份比较，学术界对该地区的研究

显得相对薄弱。在旧志研究方面，现有论文对方志文本的研究和解读也不如对其他文献的研究和解读广泛深入，成果数量相对较少。专著类成果则要么是对古旧方志进行校注汇编、或综合概览、或以方志为工具进行历史研究和其他社会研究。第二，利用方志史料跨学科研究不足。甘肃方志，既有信息资源丰富，又未经系统整序，如把甘肃方志看作一个整体，可以说其内容是无序的。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对旧志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几部志书的著者、成书时间、相互关系之间的考证，或是对其内容的简单介绍，缺乏运用方志史料的结合社会史、经济史、农业史等多学科交叉口、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第三，地方志资料数字化建设的速度相对较慢。方志数字化建设是促进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将丰富的地方志资料实现数字化、网络化，使潜在的资源变成活的信息，也是地方志发挥自身资料优势，不断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信息时代，要对修志理念进行重新整合和优化，加快地方志数字化建设。第四，方志学理论总结研究不足。很多论文在选题时没有充分参考学术史，内容无太多新见；论文的理论水平有待提高，学术分量不够。若以方志为对象进行研究，可以对之前的旧志和现阶段正在从事的新志编纂从更深层次挖掘其特点和价值，形成整体上更深刻的认识，这不仅有利于甘肃古旧方志得到更好的开发利用，也有利于积累经验、开拓创新，指导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因此，要加强方志系统研究者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的联系，切实推动甘肃方志领域的研究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 [1] 张维. 陇右方志录 [M]. 北平大北印书局, 1934.
- [2] 郝玉屏主编 高子贵、金钰铭副主编. 甘肃方志通览 [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7.
- [3] 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编.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陈云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历史文献

——陈云《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的意义

王 杰

[内容提要] 1962年2月8日,陈云出席参加“七千人大会”陕西省干部大会发表的《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讲话,明确经济决策重大失误直接原因在于党内民主阙失并运用“交换、比较、反复”方法矫正,事实上发端从思想方法层面拨乱反正。《认识》矗立破解经济危局方略坚强的哲学支撑,发端从马克思主义根本思想路线高度矫枉,铸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面拨乱反正成功的历史铺垫。

[主题词] 陈云 党内民主 思想路线 矫枉 意义

每当革命进程前途命运攸关的关键时刻,陈云以其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都清醒正确把握发展大势,郑重申述思想路线。1962年2月8日发表的《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以下简称《认识》)讲话,是标识陈云发端从思想路线层次矫正左倾错误的重要历史文献,对中共完成总体上拨乱反正和重构党内民主具有重大影响。但包括一些专门研究陈云的专家在内的各界,迄今对《认识》并未予以足够重视。涉及此文献的一些著述、媒体信息,就连《认识》发表的时间、场合等基本事实都发生讹误。[如王聿文《“七千人大会”五十周年的思考》一文断言:在“七千人大会”上,“这些中央领导人在会议讨论中言辞空前一致,陈云的话说的更直白:‘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炎黄春秋》2012年4期)若此编造“史实”之妄言,理所当然地受到严厉批评。](《炎黄春秋》2012年7期)再如丁俊萍教授和易

振龙博士的《陈云党史观的鲜明特色及其当代价值》,也发生混淆)。“1962年2月8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党的文献》2015年05期)将《认识》发表时间混淆为“七千人大会”期间,而且传播范围广泛的不少网站涉及此事的述论、消息,则更多混淆,讹误流散甚广。乃至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文集》,也将陈云1962年2月8日下午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前财政和人民生活几个问题》的讲话,题注“这是陈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陈云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卷,第399页]。史实如《陈云传》载:一九六二年二月七日,开了二十多天的七千人大会闭幕。二月八日上午,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举行会议,陈云出席会议并讲话。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粮食、财政、市场、精简、修改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会议传达等问题,陈云又在会上多次发言。这天上、下午的两个会上,陈云阐述了如何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并初步提出解决困难的若干办法。”[《陈云传》2015年版,第3卷第1303页]

“七千人大会”是建国后中共第一次大规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的大会,会议规模和社会影响当时就很大,且随着正负面影响日渐显露和研究深入,更成中共党史等多方面关注的热点。陈云《认识》讲话发表的时间为“七千人大会”结束次日,范围为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

西省全体干部会议,规模和层次都远逊于“七千人大会”,尤其《认识》的主题更是当时全党并不成熟的从思想路线层次切入的全局矫枉,加之此后不久,陈云即因于种种原因长时期赋闲,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从思想路线层次的全面拨乱反正,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才整体展开,——即现实对理论的诉求,长时期并达到炽烈渴求的程度。因种种原因致《认识》长时期未予宣传,势成月亮光辉被太阳遮隐状。但是,对于一个事关重大、发生时间并不久远,且史料保存完整,并不难廓清真相的问题竟在如此广博范围发生混淆。事实表明,包括学界在内,对《认识》的研究极为有限。《认识》发表于新中国史上决策重大失误既成严重后果并努力矫往、扭转危局之际,明晰其深刻内涵及独特的历史地位,对于廓清和深化新中国史上诸多重大史实的认识,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认识》明确的主旨

“七千人大会”大会的主旨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渡过难关。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所做的报告、讲话及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就一九五八年以来严重错误的检讨,从不同角度提及党的问题,主要是骄傲、自满、不谦虚、脱离群众、瞎指挥和一言堂等错误。周恩来强调:既往发生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是属于发生了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朱德发言主要讲: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三面红旗不仅是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而且是走向共产主义胜利的道路。林彪讲话认为: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毛病”。邓小平的讲话后被有关专家点赞为“厚道人的一篇务实报告”[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217页]。明确指出:这年是“党的问题”出了问题。但又转向集中批判分散主义。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更集中,但在实际上,分散主义的现象却是很严重的。另外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民主,但在实际上,命令主义、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却是十分严重的。……这几年,工作中的分散主义是

相当厉害的。……在五个统一(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方面,却不如过去了!这就是说,分散主义发展了。

“七千人大会”结束次日,陈云出席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并发表《认识》讲话。毛泽东评价陈云:“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2页。]《认识》对“七千人大会”表态性的总体评价:“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好就好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上下通气的必要条件”。“只有通气,才能团结;只有民主,才能集中。”“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此评语言朴实无华,“和平得很”,但指向非常明确,不同凡响的内涵极其深厚。陈云直指相当时期以来,压制、挾伐不同意见酿成严重后果的事实,“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惜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陈云文选》第3卷,第187页。]党内民主既是贯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史实证明,党内民主健全,则事业胜利,反之则遭受重大曲折甚至失败。党内民主遭破坏,压制、打击不同意见,“大家不说话”以致重大决策失误。党内民主阙失——重大决策失误和困局的直接原因。此乃《认识》的主旨之一。

主旨之二,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矫枉。陈云关于《认识》题目标题开宗明义:“七千人大会”所成关于既往经验教训的认识,需要“更正确些”,——即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路线,继续校准既已初成、而又不完全正确的认识。首要的是贯彻唯物史观,发扬民主,依靠广大干部,发现和正确认识错误。“光靠少数领导干部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错误,那

是很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只有根据大家的意见,切实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才能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真正把工作做好。”[《陈云文选》第3卷,第187-188页。]他直面“说了老实话、就拿帽子压”的实际,强调:“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不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所以,我们一定要虚心,多听不同的意见。还应该看到,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来。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总之,我们共产党员要加强修养,养成耐心听取不同意见的良好习惯”。[《陈云文选》第3卷,第187页。]

用什么方法矫正既成错误?陈云指向十分明确:践行“交换、比较、反复”以融会贯通唯物辩证法。

“交换。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用什么办法来弄清情况呢?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怎么办?我看可以作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这就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比较。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比较的时候,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国外的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

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反复。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陈云文选》第3卷,第188-189页。]

方法论是思想路线的具体化和集中体现。党内民主阙失此衍生决策失误,具有全盘迷失特征,实质上渊源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动摇。史实十分清楚,陈云早在一九六二年发表的《认识》,已明确提出从思想路线高度矫枉党内民主阙失。从贯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路线层次的根本上矫正党内民主阙失之枉,是中共党内民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创造。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陈云的独创。早在庐山会议期间,张闻天即已提出要从思想方法上总结经验。他说:“缺乏经验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但是,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脑子冷静地想一想,就可以取得经验,发现当时有些缺点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现在已经证明当时确实就有人坚持实事求是,挡住了‘共产风’。他们当时被当作白旗拔了,现在证明是红旗。所以,《记录》草稿讲到产生缺点的思想上的原因,说缺点部分地是由于主观主义、片面性所引起,这话是对的。从研究、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尤其应该着重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方面寻找原因,研究哪些缺点难以避免,哪些又可以避免。这样,今后就可以避免重犯这些错误。否则,都讲客观原因,就总结不出经验,接受不了教训。”[《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2-423页。]虽然张闻天当时在提出思想方法问题时,未明确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思想路线问题”。当然,陈云明确“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思想路线问题”提法公诸《人民日报》的时间,是在一九七七年。

二、坚定不移“只唯实”

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说，“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陈云缘何出席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笔者迄今未见有史料披露，但陈云在此会上发表《认识》，关于重大决策失误的直接原因是党内民主阙失及从思想路线高度，根本上矫正左倾错误的指向十分明确。如有评价陈云：“就坚持独立立场和见解，不看他人眼色，不见风使舵，不计较个人荣辱安危来看，陈云同志也许是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做得最好的，甚至在周恩来、邓小平之上。用则出山效力，不用则退避山舍，表现出了一种独立人格。”[张曙光：《评书论人和不同》，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很少改变他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大卫·M·贝奇曼：《陈云》，孙业礼等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从陈云恪守始终，独具既不说违心话，又顾全大局、维护中央的团结和权威的政治品格视角理解《认识》，虽然是一个角度，但从恪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坚定不移视角认识和探索《认识》的价值，则可更加深入发掘和廓清《认识》深刻蕴涵的重大意义。

中共历史上屡次发生的“左”倾错误路线，无论具体现象形态如何不同，本质上都是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痼疾所成政治意图的显现，都与“唯上、唯书”不“唯实”直接相关。有论者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云和毛泽东一样，都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王玉贵：《毛泽东与陈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页。]的观点，颇失精准。事实上，遵义会议之前，中共在隶属共产国际组织系统背景下，历次左倾路线错误发生时期，陈云“在总体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还没有认识清楚，这导致他在工作中仍执行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主张”。[《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卷，第80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前党内发生的三次左倾路线，贯彻“留人”政策——“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5页。]除点名批评事发当时党中央的主要代表的错误外，对其他重要

领导人未予直接批评。陈云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反思自我：从六届三中全会一直到七大，“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都举了手。这个错误能不能怪别人呢？不能怪别人，是因为我自己有‘左’倾观点。”[《陈云传》第1卷，第397页。当然，也因于组织原则规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形势“左”的判断，及对战略策略“左”的指示，通过组织系统贯彻，转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行为。陈云作为中共临时央政治局常委，对党中央贯彻共产国际政策和指示的方略、政策和指示，“都同意了，都举了手”。]在“左”倾错误路线旺季，陈云在党内的职务从基层领导擢升至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也证明，陈云若在“左”倾路线发作之初即行抵制，则其职务绝无可能快速提升。毛泽东从左倾路线开始发作即行抵制，受到“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6页。]

“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8页。]“江苏省委积极执行‘左’倾冒险计划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几年来艰苦积聚起来的那点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据全国互济会调查，从一九三〇年四月到九月的半年中，江苏省被杀害的动员和群众达三千一百三十人，被捕四千四百八十人。全省县委组织也从六十九个减少到二十二个”。《陈云传》第1卷，第91页。]陈云受命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周边地带淞浦等地领导建立农民革命军，多次发动武装暴动均遭失败，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吴志喜、陆龙飞遭杀害。[参见《陈云年谱》上卷，第43-51页。]亲历左倾路线切肤之痛，陈云深刻认识左倾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唯上”、“唯书”，自觉“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陈云文选》第1卷，第346页。]形成坚定的“唯实”观，在认识彻底转变过程中凝聚深厚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积淀，造就他决绝左倾错误的坚决和“只唯实”恒定。延安时期，他在枣园治疗休养期间，有得益于毛泽东要学点哲学的点化，学习毛泽东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及其处理问题的方法，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

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因此,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我在延安从枣园出来后到财办工作,如果要我明天作报告,当天晚上还忙于搜集材料,以了解情况。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陈云文选》第1卷,第342页]陈云在“唯实”观发展、升华的关键之机,因神会毛泽东实事求是精神催化,一举突破,实现了从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的第一个飞跃,“唯实”观已成转化为稳定规范自我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评价:“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践行了一生,依靠调查研究作决策是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在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6月12日。]

陈云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恒定,融汇于其党的民主制度建设思想。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高度重视党内民主建设,强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应从领导做起,检查自己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错误。先检查自己,批评自己,不能只说下面不好。如果工作出了毛病,作为领导者,自己应首先承担责任,不能上推下卸,诿过于人。”[《陈云文选》第1卷,第183页。]而且警示:“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陈云文选》第1卷,第221页。]他在中共七大会上的发言中,直面随着党的事业发展壮大日渐滋长的骄傲之气,提出著名的功劳观,明确所以建立功劳,一是人民,二是党,最后才是个人。即人民革命需要党,个人在共产党组织里才做出了成绩,一个人离开党,则一事无成。告诫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戒骄戒躁。对于党内日益渐烈的个人崇拜,他早有警示,明确指出:把实现党内团结系于“毛主席万岁”,“有毛主席在,我们党内就可以不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是否可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呢?

也靠不住。我看,只能出得少一些,出得慢一些。有些露了头以后,因为毛主席在,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不出。“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陈云文选》第2卷第232页。]对党内民主破坏、打击不同意见,陈云愤然以对。在彭德怀获“反党集团”罪名的1960年6月,“在上海瑞金宾馆会见彭德怀并合影留念”。[《陈云年谱》(增订本)下卷,第39页。]

三、《认识》的意义

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没有发言,但对当时面临经济严重困难的根源、成因早有深刻认识,对扭转危局方略统筹谋划业已成竹在胸,“七千人大会”后仅14天,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上的发中言,系统剖析经济困难、提出度过难关的措置。根据刘少奇的安排,于2月26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国务院扩大会议上作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面临五个方面的困难:近几年农业有很大的减产;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不相适应;钞票发得太多,导致通货膨胀;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城市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相应提出克服困难的六条主要措置,一是把1963—1972十年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二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是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是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是交换机广东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资产国民经济调整的方法论基础。后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并毛泽东主席同意,党中央发出《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先传达到各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员干部,后又扩大传达范围到地市级。正因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

干办法》彻底“只唯实”，以“交换、比较、反复”具体贯彻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付诸决策，即显现出强大威力。薛暮桥回忆：陈云的讲话“使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和财经部门的全体同志从‘超英赶美’和‘十年规划’的框框中摆脱出来，对集中精力搞好调整，起了极大的作用。”[《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陈云同志讣告》评价：“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陈云同志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道，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在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努力下，使国民经济以农业增产为先导，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有效地得到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日报》1994年4月12日。]此《认识》的意义之一。

之二，从马克思主义根本思想路线高度拨乱反正的历史铺垫。因《认识》矗立哲学支撑的《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转化成为决策，但从马克思主义根本思想路线高度拨乱反正并未形成全党的共识。

新中国建国以来发生的左倾路线，是长期累积的全局性错误，既往有所认识并多次从各个不同角度切入矫正，终因方不对症均收效甚微，甚至走向反面（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愈烈反右，造成严重后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从思想路线层次切入拨乱反正，所以一反常态，势如破竹，固然由于长时期惨痛血的教训的千锤百炼，全党认识深化、形成的合力。但反思陈云的《认识》讲话，从思想路线层次拨乱反正的超前谋划，虽然没有转化成为决策，但先驱深邃思想的光辉并没有随着

时间流逝黯淡，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升华。1977年9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重申服从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高度拨乱反正，明确提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行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末，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陈云文集》第3卷。]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了。历史进程的脉络十分清晰，《认识》首先是陈云思想认识论发展史上，发端从思想路线高度根本矫正左倾错误标识，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展的从思想路线层次拨乱反正的先期实验，是一次伟大历史转折巨大成功的历史铺垫。

[作者简介]研究员，甘肃省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理事、《甘肃老龄》执行主编。



浅谈二轮县志初审评审组织

陈平军

【摘要】二轮县志初审组织大致包含将撰写好的初稿返回各单位部门审查,汇总反馈意见,统一修改,组织召开初审会,初审后修改等几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把具体工作做到实处,方能使初审不走过场。

【关键词】二轮县志 初审 组织

二轮县志初稿撰写成功以后,接下来就要进入审查环节,大部分省份对于县志的审查均采用三级审查制度,分别是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初审,市级地方志办公室复审,省级地方志办公室终审,只有分别通过三审的志稿才能交付出版社出版。一般来讲,各级审查的主要任务和侧重点不同,初审注重审查史实是否准确、完整,有无遗漏,有无违背各项法律法规的叙述,复审主要审查体例是否合规、部类划分是否合理,内容有无交叉重复等,终审则是全盘通审,从内容到体例进行最后的把关,是志书出版前的最后一道关口。陕西省对于县级志书一直都是采用的三级审查制度,也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对于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有很大帮助。

笔者参与编修的《紫阳县志 1986-2010》目前已完成初审工作,已经进入二审环节,在初审过程中有一些做法和体会,认为是可以值得借鉴的,也能为其他正在进行二轮县志初审组织环节的县志办提供蓝本,特撰文陈述,供志界同仁参考。

一、将撰写好的初稿返回各单位部门审查

志稿总纂完成以后,接下来就要交由县志编纂委员会初审,初审阶段一般采用召开评稿会的方式进行,首先是县志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内部评稿会。由责任编辑对总纂的评议稿逐编的评议,群策群力,修改出一个比较成熟的推出去的评议稿。在逐编细磨的时候,还需由各分纂编辑将每编志

稿给该编承编单位领导、专家、业务人员、撰稿员再修改一次。

《紫阳县志 1986-2010》在初稿完成以后就组织了两次编辑部人员的内审,交叉看稿,交叉审稿,分别从内容、文法、交叉等方面进行修改,再汇总意见修改。形成一个较为成型的初稿后分别送县级领导、县内文化专家、统计、宗教、保密等专业人士进行初审并提出修改意见,把各部门的行业志稿分册返回各单位再审定修改,重点审查本行业、本单位志稿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和保密、档案等法律、法规以及民族、宗教、涉外、统一战线等方面的规定,是否全面、客观地反映本县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历史事件是否真实、全面、客观准确、有无遗漏。所使用的数据是否准确。主要撰写人员将本单位的补充意见撰写完成后,交由主要领导审阅签字后加盖本单位公章,上报县志编辑部存档备查。这样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史实错误、史实遗漏、数据错误等硬伤。

二、汇总反馈意见,统一修改

将下发到各县志编纂委员会主要领导和部门反馈意见进行收集整理归类,每一个类别、编章的具体意见分类整合,相同意见合并,将一些有实际意义、可供操作的意见撰写成书面意见。意见整理好以后,县志办要专门召开意见建议分析会,将所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分给每个责任编辑,责任到人,对修改提出统一要求。然后,修改人员进入实质性修改工作。修改完成以后主编进行统一核查,看还有无遗漏,能改而未改的,对于难度较大的修改任务,可以采用集体讨论的方式统一认识后定稿。

《紫阳县志 1986-2010》经过扎实有效的征求意见的过程,征求范围包括县级领导及编委会成员和各单位,共收到反馈意见 55 条,相关部门有 54 个单位反馈了具有可供操作性的修改意见

1170条。县志办在初审会前都专门对这些意见进行了专题研究,落实给具体编纂人员对这些意见进行消化处理,整体修改。最终形成初审稿,供初审会专题审查。

三、组织召开初审会

初审稿修改完成以后,就要进入筹备召开初审会的实际操作阶段,一般来讲,初审会要邀请本县领导、专家参加评议会。请县委、县政府历任书记、县长进行座谈、评稿,帮助志办把好史实关、资料关和质量关,保证不出政治问题,不出史实争议。评审会还要邀请方志界、历史界、统计界、法律界和经济、政治、文化类专家参与审稿。本地领导和志办编辑评议志稿,毕竟视角有限,一般只能解决内容缺项、交叉重复、史实差错、文字粗疏等基本问题。省、市方志专家往往能高屋建瓴地把住方志体例、内容、纲目关,能从出高质量的精品良志角度提出修改意见。经济、政治、文化类专家则能从本专业的较高角度提出各分志专业方面的错误和内容、特点上记述的不足意见。这样多层次的评议、指点,才能使志书质量更上一层楼,从而出精品佳志。确定好参加初审会的人员以后,才能考虑会议组织,包括会场选择、会议程序制定、会议所需材料撰写准备、生活接待准备等具体事务的准备,各方面都要考虑周全,以确保初审会圆满完成实际性的审查任务。

《紫阳县志 1986-2010》初审会定于2014年11月11日在紫阳县政府四楼会议室按期举行,会前做好了充分准备,邀请了二轮县志的顾问、首轮县志主编、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陕西省文史馆员、财政局局长、民政局局长、统计局局长、县人大法工委主任和县志主编、副主编参加。会前县志办副主编专门撰写了主编关于二轮县志编修情况的汇报发言、县政府常务副县长的专题发言、初审意见,制作了会议指南、会议程序等相关会议材料。由于准备充分,会议按照既定程序如期进行,没有走过场,初审会上,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又提出了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会议开得紧凑而务实,会议一致原则通过初审,建议在充分吸收初审意见的前提

下,修改完善报复审。会议圆满完成了初审任务。

四、初审后修改

初审会上,主要编纂者要做好评议意见的搜集整理,首先要做好笔记,有些专家在原文上面修改的要综合整理在一本统改的志书上,以便下一步修改。如果会前已经对了各领导、各部门对志稿的意见建议进行搜集整理并进行了修改,那么初审会议上意见和建议就不会太多。但不是没有,这些意见仍然要充分重视,但是要选择可操作性的意见,择善而从,有些意见由于没有可操作性,也就没有价值,有些意见虽然有操作性,但是与提升志书的质量、弥补史实不足无多大关联也可以不采用。

《紫阳县志 1986-2010》在初审环节中,十分重视各个方面反馈的意见。初审会后,又专门安排人员,对全志进行再一次统改,充分吸收初审意见。根据初审会上各位领导和省方志办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对事物分类、章节命名、编章结构、叙述语言在原稿的基础上进行从头至尾修改补充。为弥补断层、漏项内容,查阅县委、县政府25年工作总结和向上级汇报材料,以及大量的统计资料、媒体报道,对城市建设、特色产业、地域文化、社会生活等进行充实和升格处理,着力体现第二轮《紫阳县志》的时代特征、地域特征、经济特色、文化特色、社会变革和紫阳县的新面貌、新变化。2014年12月至2015年8月期间顺利完成初审后修改,最后形成25编104章344节75万字的复审稿。2015年10月,报送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复审。

回首《紫阳县志 1986-2010》的初审历程,笔者充分感受到初审的重要性。因为这是弥补资料缺实、史实断层、判断事实是否准确的最佳方式,所以,我认为初审环节十分重要,不可走过场,要在初审这一关上面确实有效的解决史实关。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志书的基本质量,也是出精品佳志的有效途径,应当引起党委、政府以及修志者的足够重视。

(作者单位:陕西省紫阳县档案史志局)

以前志为鉴试论二轮省志人物志的编纂

毛珏珺

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这是我国地方志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多次就地方志工作做出重要批示和重要讲话的背景下出台的重要文件,标志着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此走上“规划先行”、以科学规划引领发展的道路。按照《规划纲要》要求,“到2020年,完成第二轮地方志书规划任务,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全部出版。”现在离2020年还有不到4年的时间,虽然一些省区已经编纂出版部分二轮省志丛书,但据笔者所知,大部分二轮省志《人物志》编纂工作滞后,有些省《人物志》编纂工作才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

人物志历来是方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来方志半人物”,明代方志人物传表部分占到全书卷数的三成到五成之间,分量相当大。清代更加重视志书人物部分撰写。正如雍正皇帝曾在上谕中朱批:“朕维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慎重采录,至公至当,使伟迹懿行逾久弥光,乃称不朽盛事。”历史是人物活动的历史,人物的活动、业绩是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面貌最好的体现,编好志书“人物”部分,不仅有利于志书存史、资政功能的发挥,其中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更有利于增强志书的可读性,便于志书的传播利用和实现其教育功能。在首轮省志编纂中,各省人物志都单独立卷,大都完整收录本省有史以来至当代的各类著名人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人物志》编纂向来是志书各部类中最繁难的部分,入志人物的选择、资料的收集到客观公正、生动准确的描写人物,都容易产生各式各样的问题,“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难度可想而知。在二轮省志人物志编纂之际,回顾首轮省志人物志编纂得失,以为殷

鉴,不失为一个少走弯路的办法。

与首轮省志编纂不同,二轮省志大多是断代志,不是通志,入志人物除少量补遗人物外,没有古代人物,多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现当代人物。入志人物活动时间距离修志时间较短,有利于资料的收集整理,正所谓“事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再加上二轮志书编纂的时代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不仅印刷早已告别铅与火,进入光与电,世界也因互联网的无处不在而已成为地球村,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都可以是记者、媒体人,网络上有海量信息随时随地供人们搜索选用。因此二轮省志人物志在编写体制、资料收集方式、范围和入志人物的选择标准、行文内容风格方面与首轮人物志相比都应该有不同的要求,以适应“互联网+”发展需要。

一、二轮省志《人物志》的编写体制

首轮省志人物志的编写体制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外包给社科院校的专家学者进行编纂,后由修志机构统稿,进行编辑加工;第二种是主要由修志机构负责,面向全社会收集资料,组织人员编纂稿件并统稿;第三种是修志机构与学者分工合作,分别完成不同部分人物的编纂工作,再由修志机构统一编辑加工。首轮人物志因为涉及到大量古代入志人物,如历代科举鼎甲表、职官表的编制,学术性较强,难度较大。加之是第一轮修志,政府和全社会都当成是一项文化盛事,挑选精兵强将,倾全力支持,因此大多省志人物志的编纂采取第一种和第三种编写体制。专家学者长期从事有关人物的专门研究,由专家修志好处是资料详实准确,能够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编纂的志稿富于著述性。而且大多成书时间短,效率高。缺点是可能不符志体要求,主观色彩过浓,语言不够平实,行文风格与修志机构人员差异过大。主要由修志机构负责人物志的编纂,优点是内容全面,文风容易统一,比较符合志体要求。缺点是选择志书编纂

过程易受外界干扰,众手成志,志稿质量堪忧,且花费时间长,效率低。二轮人物志编纂时的情况已与首轮不同,全国各地基本建成省、市、县三级地方志机构,机构健全完善;基本完成二轮市、县志编纂任务,并普遍开展了年鉴编辑工作,这些都为二轮省志人物志的编纂做好充分的资料准备。二轮省志人物志的时间断限大都为几十年,基本没有古代人物,甚至入志人物许多健在,由熟悉当地情况的修志机构负责组织编纂二轮省志《人物志》,无论是在资料收集、人员安排还是写作上都有专家学者无法比拟的优势。再加上“互联网+”的时代,专家学者已无法垄断信息来源,普通人也可通过网络方便的掌握最前沿的资讯,因此笔者认为,二轮省志人物志的编纂还是由省级修志机构独立负责、组织编纂较好。

二、关于《人物志》的体裁

人物志的体裁有传、简介、表、名表、录、事略、传略等名目,实际常见的省志人物志体裁有传、简介、表、事略四种。人物传是人物志的主体,为记述人物一生生平事迹的传记,一般“生不立传”。根据传主人数又分为独传、合传、附传三种类型;人物简介又称人物录,是用来记述可以入志但不够立传条件的人物,或是本应立传但资料缺乏的人物等。表,指表格,有的也称名表、名录,用寥寥数语记录人物的姓名、籍贯、职务、事迹等主要信息。如职官表、革命烈士表、知名人士表、劳动模范表等;传略,或称事略,记人或记事的一种文体,用来记述人物事的大略。与人物传相比,传略不具备人物生平记述的完整性,可以只记人物经历的片段,也可以记几件事,可以突破籍贯和“生不立传”限制。首轮省志人物志中诸种体裁都有出现,较好的完成全面搜集保存当地人物资料,“记述人物准确、客观、公允”^①的任务。无庸讳言,在一些人物志中也普遍存在体例混乱、入志人物归类不当的问题。表现最为明显就是人物传与人物简介没有合理的分工。

在首轮省志人物志中,因为记载的人物纵贯二、三千年,数量众多,有些省志人物志于是只选用人物传和人物表两种体裁记载人物,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只记载下限内已去世人物;又“秉志书‘详今略古’之原则,本志注重收录民国以

来各类人物,尤其是中共及其他政党、团体创始人、重要骨干、革命根据地领导者与军队领导人。当代人物,政治方面以省(军)级、文教科卫方面以教授级以上为收录入传或表录标准。名商、劳模、名艺人收录本志中。”^②这容易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放宽了人物入传标准,凡是去世人物基本都收入人物传,收录近现代入传人物过多,近100年入传人物数量几与2000多年古代人物数量相当,会使人产生当地古代人文不昌,文化落后的错误印象。二是因为没有设置人物简介,一些在当地已产生重大影响的在世人物未能收入此轮人物志,不利于真实反映特定历史阶段的真实面貌和文化特征。另有一些省志人物志虽同时采用传、简介、表、录等多种体裁,但人物传与人物简介写法雷同,都是人物生平事迹的全面介绍,区别只在篇幅长短,甚至有些简介字数超过传记!唯一的区别是传主在世与否,有些传主影响、贡献虽不够入传条件,因已去世,便也写人物传部分。首轮《江苏省志·人物志》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人物志部分共分四册,分别是第一册《人物志·古代》、第二册《人物志·近代》、第三册《人物志·人物简介》、第四册《人物志·人物表》。第一册和第二册的古代人物与近代人物采用人物传的体裁,记录江苏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古代、近代人物,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近代人物适当多收录,并详写。第三册人物简介部分,既收录符合入传条件的在世人物,也收录资料较少的古代人物,各种人物志体裁分工明确,体例明晰,既起到保存史料的作用,又能和志书其他部分相结合,较深刻的反映本地社会历史的整体面貌。二轮省志人物志的撰写应该吸收首轮省志人物志的成功经验,在《人物志》中设立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表等篇章,按照入志人物的不同情况选择不同体裁分类撰写人物,搞好不同体裁之间配合,以提高和保证志书质量。

三、关于入志人物的撰写

前文已述,人物志有传、简介、表、名表、录、事略、传略等不同体裁,按既定标准入志的人物根据不同类型选择不同体裁记述,其撰写要求、方面也相应的有所不同。2008年9月颁布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规定“立传人物为在本行政区域有重大影响者,以及本籍人物在外地有重大影响者”,“生

不立传。在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表以外记述人物,以事系人,人随事出。记述人物准确、客观、公允”。这些规定为人志人物的撰写划定了总体原则,在这些总体原则下,不同体裁撰写入志人物也有细微区分。

人物传是人物志中的主体部分,司马迁《史记》由于其中一百余篇人物传记中的人物大都描写得栩栩如生,性格鲜明,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还开启我国史传文学先河,被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志书人物传也由史传演化而来,在“准确、客观、公允”的记述人物前提之下,也应适当注意人物的形象性,否则,就难以发挥《人物志》“记一方人物、激千秋之爱憎”,发挥志书弘扬正气、激浊扬清的教育作用。首轮省志人物传不乏成功的先例,但也有许多悼词式、流水帐式、判决书式的不成功写法,许多类似人物简历,空洞乏味,千人一面。要写好志书人物传,首先是要规范传主的主要要素,叙述时不能遗漏。这些主要要素有姓名(包括别名、字号、堂室)性别、籍贯、民族、年龄、生卒年月、政治面貌、学历、工作职务、职称、生平事迹、主要著述(含发明创造)、获得奖项等。其次要在概述传主生平主要事迹基础上,注意搜集、重点叙写能反映传主性格特征和主要贡献的典型事迹,不要求面面俱到。三是能通过描写传主的语言、动作等细节揭示人物的个性和形象。如《河南省志·张建亭传》描写张建亭烈士在被日伪军抓住之后当众受刑的场景:“16日上午,敌人在两门集西门外广场附近布置了刑场,将上万名群众驱赶来。张建亭大声疾呼:‘同胞们!不要悲哀,要坚强起来,牢记血债,跟鬼子斗!跟汉奸斗!’他飞起一脚,踢翻了日本军官面前的桌子,并举起沉重的手铐朝一日兵砸去:‘狗强盗!你们终有一天会完蛋的!’”有语言描写和动作描写,烈士视死如归、嫉恶如仇的光辉形象历历在目。四是要寓褒贬于充分的叙事当中,不空发议论。首轮《江苏省志》与《广东省志》人物志中都为汪精卫这一反面人物立传,因汪精卫是广东番禺(今三水)人,所以《广东省志》中详叙他的生平事迹,尤其重点叙述他为一己私利,叛国投敌经过,虽无一字评论,但读者见后自然得出汪是大汉奸的结论。《江苏省志》中只截取他在南京活动的主要事迹进行略叙,

虽然在开篇第一段最后一句就定调说汪是“大汉奸”,不熟悉那段历史的人读之却会感到说服力不强,有“穿靴戴帽”之嫌。

人物简介是人物传的有力补充,同时可以为国史和下轮志书撰写保存资料。因此人物简介篇幅不宜过长,也不受“生不立传”的限制,但应适当与人物传区分功能。人物简介描写人物不要求概述生平,在人物主体要素,如姓名、年龄、性别、籍贯、民族、职务职称、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齐全的前提下,只要述写出主要事迹和贡献,不需要写出人物个性特点,就是成功的人物简介。人物简介严禁评论。

人物表的制作关键是确定人表事项,内容单纯。史志皆有表,因此首轮省志人物表类型多样,收录人物广泛,资料价值和实用价值都很高,是人物志的有力补充,大多质量较好。各省结合本省实际设计制作了不同的表,江西有《江西历代进士名表》《江西历代宰辅表》《江西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名录》;江苏有《皇帝表》《状元表》;广西有《太平天国人物表》等,都能很好的体现志书的地域性和资料性,值得二轮省志编纂借鉴。

总之,人物是志书的灵魂,历史是人物活动的历史,在旧志中,“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新修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唯物的历史观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人物志》编纂仍然是志书包括二轮省志编纂的重中之重。人物志的编纂还有很多方面内容,如入志人物的选择标准、人物志小序的撰写、人物志照片的选用、人物索引的编制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展开。试以前志为例,略试二轮省志人物志编纂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注释:

①《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②《江西省人物志》,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作者系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指导处副处长,江西省方志馆副馆长,江西省地方志学会秘书长)

关于县级综合年鉴编辑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李春斌

编辑出版政府综合年鉴是《地方志工作条例》赋予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一项重要职责,是第二轮修志中的一项崭新工作。本人作为一名从事修志编鉴多年的地方史志工作者,在主编完成《瓜州县志》1986—2005之后,紧接着主编《瓜州年鉴》。在三年多的年鉴编辑出版亲身实践中既积极学习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省、市及兄弟县(市区)年鉴,又不断探索总结,深思熟虑,既有感性认识又有理性认识,从中领悟出一些关于年鉴编辑工作的见解,现不妨与同仁们相互交流。

一、年鉴名称卷号要与上级年鉴相一致。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2009年6月印发的《甘肃省地方综合年鉴管理办法(试行)》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2012年7月印发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试行)》两个规范性文件中都没有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名称、编号作出规定。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县(市区)年鉴,大多数冠名为XX年鉴,且编号与国家、省、市年鉴一致,个别的冠名为XX综合年鉴,有的编号与国家、省、市年鉴不一致。当初我们启动编辑年鉴时,对冠名没有含糊,认为就以行政区域名称冠名,不应带“综合”二字,而对编号则认为应该与事物发生年份相一致,不应该以编辑出版年份编号。当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甘肃年鉴》《酒泉年鉴》都是以编辑出版年份编号,于是也就打消了自己的念头,与上级年鉴统一了起来。在此,笔者建议目前正在启动和今后启动编辑的年鉴,一定要学习上级的年鉴,照着上级年鉴做,把名称和编号统一起来。

二、领导机构要统一。志书和年鉴都是在编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志书编纂的领导机构是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省级年鉴设立的则是编辑委员会。所以我们也应照着上级年鉴做,成立同级年鉴编辑委员会,并在年鉴的

书名页和版权页之后署名年鉴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

三、编辑体例以三级条目体为好。前面提到的中指组和省志办两个关于地方综合年鉴规范性文件,同样对年鉴编辑体例没有作任何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于1981年就开始编辑出版,其编辑体例为条目体。省级及其以下年鉴编辑出版时间都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从目前我们见到的省、市、县三级年鉴都是采用条目体,一定是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的编辑体例。由于县(市区)级年鉴篇幅普遍较小,一般都在40万字左右,所以最多设三级条目就足够区分层次,完全不必设更多层次。

四、要设置本行政区地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和省市年鉴都设置同级行政区地图,一些省级年鉴还设置地形图、交通图。县(市区)年鉴至少应该有一幅本级行政区地图,而且是出版志书年鉴的专用地图,即地图大小与志书年鉴同样开本,或者比志书年鉴开本大一倍对折。只需清晰反映本行政区的下一级行政区划及名称,地图所示地理名称一目了然。我们出版县志时用一年多时间制作了这样一幅专用地图,笔者深知制作与志书年鉴同样开本的地图有一定难度,但20年修编一次志书,难度再大也应该作,况且这样的地图出版年鉴每年都要用到。出版志书和年鉴如果将大地图缩小为小地图用到书中,密密麻麻分不清下级地域看不清地名名称,就没有实际效果。

五、要配置彩页。年鉴和志书一样,要在前面配置一些反映年度重要工作、重大事件、重要成就等有重要影响有价值的事物照片。图片下方应缀以简明准确的文字注释,反映事物发生的时间、地点、事件、人物等。有领导人参加活动的照片,应注明领导人的身份和位置。照片和文字都要大气大

方,受读者喜爱。配置的照片要体现政治性、影响性、史料性,切忌崇拜性、商业性、广告性。配置彩页也不能过多,一般以1~2个书版即8个或16个页面为宜。从现阶段各地编辑出版的综合年鉴看,鉴赏性、可读性、史料性都不是很突出,读者对其喜爱程度远不比志书。如果不配置一些具有鉴赏性彩页供读者领略,就更失去年鉴的地位和读者的兴趣爱好。

六、大事记要按照志书体例加以修删。地方综合年鉴记载的大事记是由同级档案局按月编辑的地方大事记全部内容,由同级档案局提供,但这部分资料普遍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有的用第一人称,有的语句不精炼,有的“的”字句、“了”字句、“共”字句、“已”字句、“对”字句满篇,用“多”、“余”、“约”等表示约数,还有的记述不能正确反映事件的本意等等。这些都不符合志书年鉴体例。需要年鉴主编按照志书体例逐字逐句认真加以整理修缮,达到体例正确、语句简练、彰显本意、通顺流畅。在此过程中,同时将跨月份补记的大事纳入事发当月,发现还有遗漏的大事内容予以补充。

七、内容要一事一条目。条目是年鉴的基本单元和直接信息载体。根据本部门、本行业、本单位所承担的工作类别和取得的工作成就,按照先主要后次要,先重点后一般的顺序拟定编辑条目,记述某一具体事物、事件。如一个产业、一项工作、一次活动、一项工程、一个现象、一个会议、一个产品、一个成果等。其内容要素包括:事主、时间、地点、事情经过、原因和结果。内容包括量化指标,各种数据,消息、事实、政策、措施、新鲜经验,新风俗风尚,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发生的大事、新事、要事以及有存史价值的史料。特别要记载本级党委、政府年度重大决策、重大工作部署、重要政治活动暨贯彻落实、完成、开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果。

八、要收录集体个人年度荣誉。集体个人受表彰奖励情况备受单位和个人关注,全面收录这部分内容可极大提高读者对综合年鉴的关注度。由于这些年来,各级表彰奖励的项目越来越少,因此,县级综合年鉴应将县级及其以上机关表彰奖励的集体个人荣誉、科技进步奖、产品成果奖、地理标志产品等全部收录进来。县级机关表彰奖励

决定可收录原文,上级机关的分级别由高到低列表录入。

九、要收录当年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因此收录文学艺术作品是各级综合年鉴不可或缺的内容。由于文学艺术作品种类繁多,各地文化氛围有差异,可根据本地实际有重点分层次收录一些代表性作品。一般收录本地人员创作的诗词、歌曲、小品、小剧目原文,出版的书籍以及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散文、长篇通讯简介,获奖的美术、摄影、书法、舞蹈、手工作品等。

十、要辑录本级领导机关重要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甘肃年鉴》都设有附录,县级综合年鉴也应设附录。辑录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县委县政府重要意见,县人大重要决议、决定,县政府重要通知、通告、规划,县政协重要提案等。

以上这些方面,我们在编辑出版综合年鉴中基本做到了,但我们编辑出版的年鉴自己都不是很满意,总认为政治性、工作性、总结性太强,可读性、趣味性、存史性不足。有些熟悉的同志当面都说年鉴没看头。一方面是因为年鉴本身属性决定就没有志书那样信息量大,更没有志书层次高,整个编辑过程没有志书精细。另一方面编辑出版年鉴一年一鉴,当年出版,时间紧、节奏快,没有充足时间让供稿单位加工提高所提供的资料,有些单位的资料只要能收上来就不错了。编辑过程也只是在收集到的资料基础上按照志书体例加以修理,而不是像修志那样以资料为基础另写出来。所以人们对年鉴的爱好比不上志书不足为奇。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省市年鉴以及兄弟县市区年鉴一些好的做法和条目,始终以“恪尽职责、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修志人精神,尽力开拓视野、创新思维、超常发挥、逐步提高,不遗余力追求年鉴编辑出版的质量,也就问心无愧了。

(作者系瓜州县地方志志办公室主任)

对地方综合年鉴中几个具体条目的探讨

王文生

前言：条目是年鉴内容的基本单元和主要表现形式，条目名称定义是否准确，编写内容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年鉴的质量。对于地方综合年鉴来说，因其记述内容的综合性、信息量的庞大性，条目的设置、定义、编写就更为重要。志书编纂的目标是要编纂“精志、佳志、美志”，地方综合年鉴同样要努力编写出一部“精鉴、佳鉴、美鉴”。如果说篇目大纲是骨架，那么条目就是血肉。骨架决定身材高矮，血肉关系容貌美丑。同样，判断一部地方综合年鉴是否“精”、“佳”、“美”，除看篇目大纲设计是否合理外，同样重要的就是看条目的设置是否合理、记述内容是否准确详实。为促进年鉴条目的编写水平，进一步提高各供稿人的供稿质量，笔者根据在编辑《甘肃年鉴》过程中的一些体会，结合各市州、县区的供稿人为《甘肃年鉴》提供的稿件内容，将在地方综合年鉴条目编写，以及在以后需要逐步改进调整的方向等诸多方面，逐步与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和研究。

本篇将就如何准确定义与记述几个具体条目，避免条目名称混乱、记述内容不准确等问题，与大家展开相关探讨。

一、商业贸易与商贸流通

关于商业情况的记述，条目应是“商业贸易”还是“商贸流通”，从各市州、县区为《甘肃年鉴》的供稿来看，在准确区分两者的定义和应记述的内容方面，较为混乱，存在概念模糊、记述内容与条目名称相分离的现象。不妨举例：

【商业贸易】2013年，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6.21亿元，增长12.3%。其中，批发业实现销售额52.66亿元，增长5.22%；零售业实现销售额50.65亿元，增长21.5%；住宿业实现营业额4.32亿元，增长7.98%；餐饮业实现营业额15.82

亿元，增长21.72%。

【商贸流通】2014年，全县投资2245万元的某某综合楼续建项目投入使用，某某农产品批发市场完成升级改造。全县新发展私营企业84户、个体工商户674户，新增从业人员1154人，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5.6亿元，增长24.5%。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170111万元，增长12.5%。全年外贸进出口额完成756万美元，增长20%。

商业贸易的定义：商业贸易是指专门从事商品收购、调运、储存和销售等经济活动的部门。在我国，一般对内称商业，对外称贸易。商业贸易是商品交换的表现形式，是联系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桥梁。其基本释义是通过买卖方式的经济活动；性质为社会活动形式；涵盖范围为内称商业，对外称贸易。

商贸流通业的定义：商贸流通是指商品流通和为商品流通提供服务的产业，主要包括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饮业、仓储业，并涉及交通运输业等。商贸流通业及商品市场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是工农、城乡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环节，是决定经济运行速度效益的引导性力量，是反映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窗口，是衡量综合国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的反映。其基本释义是为商品流通提供服务的产业和相关情况；主要包括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中间环节是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从上述概念的定义和解释中不难看出，以上所举的两个案例，均存在对本条目的定义认识模糊不清、条目名称与记述内容之间相分离的问题。第一个案例中，记述的内容为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具体情况，条目应改为“商贸流通”；而第二个

案例中记述的内容,既有关于流通的一部分,又有关于贸易的一部分,属于内容杂糅。

如果遇到像第二个案例的情况,大家在为《甘肃年鉴》供稿时,可以把条目名称定为“商贸流通与贸易”;或者将关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等相关内容集中后,设为一个条目“商贸流通”。将关于“贸易”的内容集中后,设为一个条目“商业贸易”。比如:

【商贸流通】2014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53亿元,比上年增长12.7%。全年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实现零售额22.4亿元,比上年增长8.8%。其中,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6.78亿元,下降10.1%;汽车类零售额8.25亿元,增长25.6%;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零售额3.72亿元,增长8.2%;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零售额0.15亿元,下降5.8%;中西药品类零售额0.28亿元,增长0.3%。

【商业贸易】2014年,全市完成外贸进出口总值为32762万美元,比上年下降61%。其中,出口总值为5969万美元,增长3.54倍;进口总值为26793万美元,下降67%。

如果收集的资料中,关于“贸易”方面的内容较为单薄,不足以支撑一个条目时,可以采取内容分开调整的办法,将关于贸易的数据剔除出来,调整到“综述”有关国民经济的板块之中。或者直接吧条目设定为“商贸流通与贸易”。比如:

2014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7.86亿元,增长3.7%;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1.77亿元,增长21.3%;公共财政收入完成2.65亿元,下降6.6%;财政支出达到9.3亿元,增长12.1%;全县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29.3亿元和17.2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6.24亿元,增长12.2%;全年外贸进出口额完成756万美元,增长20%。

二、交通建设、交通运输与交通邮电

其实,仅从“交通建设”和“交通运输”这两个名词的字面意思来看,就不难看出“交通建设”应记述一个地方的交通建设和状况,而“交通运输”重点在“运输”二字,应记述本地方的关于公路、铁路、航空或者海运、河运等方面的具体运输情况。

交通是指从事旅客和货物运输及语言和图文传递的行业,包括运输和邮电两个方面,在国民经济中属于第三产业;运输有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和空间六种方式;邮电包括邮政和电信两方面内容。

根据以上定义与划分来,在地方综合年鉴中,要记述的内容应该是包括“交通”与“邮电”两个方面。对此,各供稿人在编辑供稿内容时尤其要注意区分。举例来说:

【交通运输】2013年,全县投资2.87亿元,完成通乡油路62条,新铺油263千米;投资2.22亿元的某某二级公路建设基本完工;截至年底,全县基本实现乡乡通油路。

【交通运输】2013年,全县有乡村个体联户交通运输企业26户,从业人员3100人,实现运输业现价产值1.1亿元,增加值0.2亿元。全年完成公路客运量15.12万人(次),公路客运周转量5885人/千米;公路货运量109.12万吨,公路货运周转量5393.4吨/千米。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收入113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8%。邮政业务收入61.02万元,下降1.1%;电信业务总量完成1076万元,比上年增长22.3%。

以上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中,虽然条目名称是“交通运输”,但记述的全部为“交通建设”的情况,条目名称与记述内容相去甚远;第二个案例中,虽然条目名称与记述内容相吻合,但在内容上又存在缺失,缺少了关于“邮电”方面的记述。

再看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2014年为《甘肃年鉴》的供稿:

【交通邮电】2013年,全县公路货物运输量7.6万吨,与上年增长41.5个百分点;公路货物周转量938.9万吨千米,增长47.7%,公路客运量5.4万人,比上年上升31.7个百分点,客运周转量784万人千米,同比上升37个百分点。全年共实施农村公路建设计划类项目4项,计划外项目7项,建设总里程188千米,计划总投资12481万元,目前完成投资10091万元。

对于第三个案例,通过上述案例的对照与比

较,优点就比较突出:条目名称设置准确,记述内容完整详实。另外,关于“交通邮电”与“交通通信”,这两个条目名称哪一个更为准确、合理,笔者认为二者均可,仅是表述习惯不同。对此,大家可以继续共同探讨。

三、第二产业、工业经济、工业与建筑业

探讨这个问题,首先举三个案例,再明确两个概念,通过彼此对照、区分后,就可以去疑义、解误区,科学判定相关条目及内容。

【第二产业】2013年,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11.33亿元,比上年增长15.8%;工业增加值1.33亿元,比上年增长26%;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4家,实现增加值0.77亿元,比上年增长34.7%,实现产品销售收入3.8亿元。

【工业经济】2012年,全区工业实现增加值140.79亿元,增长17.65%。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增加值139.6亿元,增长20.61%。地方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16.6亿元,增长20.32%。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营业收入1632.22亿元,比上年增长21.7%;实现利税总额22.55亿元,下降52.93%。

【工业与建筑业】2012年,全县工业累计实现增加值6.83亿元,增长21.5%。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84亿元,增长23%;实现利润2.34亿元,增长27.7%。股份制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41212万元,增长25.7%。国有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2729万元,增长352.9%。全年共实现产品销售收入13868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52%。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2347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7.37%。

全年建筑业总产值达10612万元,增长79.9%。房屋建筑施工面积达26874平方米,比上年同期下降7.5%。全年工程结算收入达到790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9%,工程结算成本510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9%,实现利润总额60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0.2%。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中的规定,第二产业范围是这样表述和划分的: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工业是指采集原料,并把它们加工成产品的工作和过程。工业是第二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两大类。工业经济,又叫资源经济,即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其包涵的要素有劳动者(个人)收入、国家税收(含规费)、企业的利润和折旧等,通过三者的总和来核算有关数据。

第一个案例中,条目名称为“第二产业”,条目名称过大,记述内容缺项较多,属于“帽子大身子小”;第二个案例中,条目名称为“工业经济”,名称准确,记述内容中数据详实,但对于本地区很重要的一个行业“建筑业”,没有去进行记述与体现,属于“衣服光鲜丢了一个扣子”;如此看来,既要反映本地的“工业”情况,又不能少了“建筑业”,供稿人在组稿此类内容时要记述就是“工业与建筑业”。

四、商贸旅游、文化旅游、文化产业与旅游业

前些年,许多省市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时,往往把“商贸”与“旅游”两个板块捏合到一起进行记述,《甘肃年鉴》在编辑过程中,也沿用了这一传统模式。但是,在以后的编辑过程中,经过实践和学习,笔者逐渐发现把“商贸”与“旅游”合二为一,作为一个条目去进行记述,显得生硬、牵强,甚至不伦不类。2014年,笔者开始对原来《甘肃年鉴》中一直沿用的“商贸旅游”这个条目,进行了明确区别和分离(包括商贸流通、商业贸易),开始采取分开记述的方法,使得条目划分、内容记述方面进一步科学合理。举例如下:

【商贸旅游】2012年,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5.91亿元,增长18.2%,其中城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48.23亿元,占总额的86.3%,增长19.0%;乡村实现消费品零售额7.68亿元,占总额的13.7%,增长3.8%。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实现消费品零售额41.67亿元,占总额的74.5%,增长22.0%,住宿和餐饮业实现消费品零售额14.24亿元,占总额的25.5%,增长3.1%。分规模看,限额以上单位实现零售额26.91亿元,占总额的48.1%,增长33.8%,限额以下单位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29亿元,占总额的51.9%,增长3.4%。

2012年,全区共接待境内外游客602.7万人次,增长23.1%。全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7.1亿元,增长24.2%。

【文化旅游】2014,全区文化产业增加值完成2.4亿元,增长33.7%;全区共接待游客500.85万人(次),增长26.01%。全年共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5.3亿元,增长26.06%。

【文化产业与旅游业】2014年,全市共有文化产业法人单位325家,增长45.09%;从业人员4647人,增长20.33%;资产总计16.15亿元,增长15.11%;全年实施文化旅游项目35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22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通过文化部评审公示。2014年,全市完成文化产业增加值8亿元,增长65.67%。

2014年末,全市共拥有宾馆饭店191家,建成农家院100家,农家客栈107家。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06.78万人次,增长26.06%;全年旅游总收入48.05亿元,增长28.82%。

随着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我省“建

设文化大省”战略方针的提出,各市州县区对文化建设的重视空前提高,各地在文化建设方面出现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并逐步形成产业化。与此同时,旅游业的开发拉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繁荣促进了旅游业的兴旺,由此带来文化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开始进一步紧密结合。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市州县区开始在供稿中把“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出现“文化旅游”这个条目,这是一种编辑观念上的巨大变化,非常值得肯定。但是从语言表述上来说,“文化旅游”这个条目准确与否还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关于这块内容的记述,把条目名称定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要更为科学、合理。

以上论述和观点,仅供参考。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的条目编写,笔者期待和欢迎与大家共同探讨。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志志办公室年鉴工作处副处长)

《民勤县志》(1986—2005)

目录

概述

大事记

第一编 行政建置

第一章 区位沿革区划

第一节 位置区域

第二节 建置沿革

第三节 行政区划

第二章 乡镇概况

第一节 昌宁乡

第二节 蔡旗乡

第三节 重兴乡

第四节 薛百乡

第五节 大坝乡

第六节 三雷镇

第七节 苏武乡

第八节 夹河乡

第九节 东坝镇

第十节 大滩乡

第十一节 双茨科乡

第十二节 泉山镇

- 第十三节 红沙梁乡
- 第十四节 西渠镇
- 第十五节 收成乡
- 第十六节 东湖镇
- 第十七节 南湖乡
- 第十八节 红沙岗镇

第二编 自然

第一章 地质 地貌

- 第一节 地质
- 第二节 地貌

第二章 气候

- 第一节 气候概况
- 第二节 物候
- 第三节 气象要素

第三章 自然灾害

- 第一节 地质灾害
- 第二节 气象灾害

第三编 资源

第一章 国土资源

- 第一节 国土资源概况
- 第二节 国土资源利用
- 第三节 国土资源管理
- 第四节 矿产资源利用与管理

第二章 生物资源

- 第一节 植物资源
- 第二节 野生鸟兽资源
- 第三节 害虫 益虫

第三章 水资源

- 第一节 地表水资源
- 第二节 地下水资源

第四编 环境保护

第一章 林业与防风治沙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防风治沙理念
- 第三节 防风治沙工作
- 第四节 林木病虫害防治
- 第五节 外来生态援助

第二章 水利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灌区建设
- 第三节 水利工程建设
- 第四节 水利管理
- 第五节 水利科研

第三章 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

- 第一节 石羊河流域生态问题的由来
- 第二节 中央、省、市的关怀和支持
- 第三节 《甘肃省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摘要
- 第四节 阶段性治理行动

第四章 人居环境保护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环境演化
- 第三节 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
- 第四节 红崖山水库水体污染专项治理

第五章 气象观测与服务

- 第一节 气象观测
- 第二节 气象服务

第六章 地震预防

- 第一节 地震监测
- 第二节 防震减灾

第五编 农业 畜牧业

第一章 农业

- 第一节 耕地
- 第二节 农作物种植
- 第三节 农业耕作制度
- 第四节 肥料 农膜 农药
- 第五节 农业科技
- 第六节 管理服务机构
- 第七节 农业执法管理

第二章 农业机械化

- 第一节 农牧机械
- 第二节 农机经营与加工
- 第三节 农机管理与服务
- 第三章 畜牧业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畜禽养殖
 - 第三节 畜禽疫病防治
 - 第四节 草原
- 第四章 扶贫开发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主要工作

第六编 城乡建设

- 第一章 城市建设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县城建设
 - 第三节 城市管理与经营
- 第二章 乡村建设
 - 第一节 农村民居建设
 - 第二节 小城镇建设

第七编 电力 交通

- 第一章 电力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电源与电网
 - 第三节 供电与用电
- 第二章 交通
 - 第一节 公路与桥梁
 - 第二节 道路养护
 - 第三节 交通运输业
 - 第四节 交通运输管理

第八编 信息传媒

- 第一章 文化传媒
 - 第一节 广播电影电视机构
 - 第二节 广播电影电视事业

- 第三节 互联网
- 第二章 邮政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邮政建设
 - 第三节 邮政业务
- 第三章 通讯
 - 第一节 电信
 - 第二节 移动
 - 第三节 联通

第九编 财税 金融

- 第一章 财政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财政管理体制
 - 第三节 行政事业财务管理
 - 第四节 预算外资金管理
 - 第五节 经济建设财务管理
 - 第六节 会计管理
 - 第七节 农村财务管理
 - 第八节 农业税收
 - 第九节 国有资产管理

- 第二章 税务
 - 第一节 国家税务
 - 第二节 地方税务

- 第三章 金融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民勤县支行
 - 第二节 政策性银行
 - 第三节 商业银行
 - 第四节 非银行金融机构
 - 第五节 保险业

第十编 工商贸易

- 第一章 国有企业
 - 第一节 粮油企业
 - 第二节 其他国有企业
- 第二章 集体企业
 - 第一节 供销社

- 第二节 其他集体企业
- 第三节 乡镇企业
- 第三章 民营企业
 - 第一节 民营企业的发展
 - 第二节 行业分布

第十一编 经济监管

- 第一章 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国民经济计划与社会发展
 - 第三节 项目建设与管理
 - 第四节 企业改革
- 第二章 工商行政管理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市场建设
 - 第三节 企业登记管理
 - 第四节 市场管理
 - 第五节 合同商标广告管理
- 第三章 审计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国家审计
 - 第三节 内部审计与社会审计
- 第四章 统计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经常性统计
 - 第三节 大型专项普查
 - 第四节 统计资料汇总及开发利用
- 第五章 物价管理
 - 第一节 物价演变
 - 第二节 管理工作
- 第六章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计量管理
 - 第三节 标准化管理
 - 第四节 特种设备管理
- 第七章 专卖管理
 - 第一节 烟草专卖
 - 第二节 盐业专卖

- 第三节 石油专卖
- 第八章 安全生产
 - 第一节 安全生产状况
 - 第二节 安全生产管理

第十二编 党政群团

- 第一章 中共民勤县地方组织
 - 第一节 民勤县委
 - 第二节 党员代表大会
 - 第三节 组织工作
 - 第四节 宣传工作
 - 第五节 纪检监察工作
 - 第六节 统战工作
 - 第七节 政法工作
 - 第八节 信访工作
 - 第九节 老干部工作
 - 第十节 政研工作
 - 第十一节 党校工作
- 第二章 民勤县人民代表大会
 - 第一节 历届人民代表大会
 - 第二节 人大工作
- 第三章 民勤县人民政府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政府重点工作
 - 第三节 法制与行政复议
- 第四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民勤县委员会
 - 第一节 历届政协委员会
 - 第二节 政协工作
- 第五章 群众团体
 - 第一节 工会
 - 第二节 共青团
 - 第三节 妇联
 - 第四节 工商联
 - 第五节 科协
 - 第六节 残联

第十三编 公安 司法 军事

第一章 公安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治安保卫
- 第三节 治安行政管理

第二章 检察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检察工作

第三章 法院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刑事民商事行政审判
- 第三节 审判监督与执行

第四章 司法行政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司法工作
- 第三节 普法工作

第五章 军事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兵役与国防后备力量
- 第三节 国防建设

第十四编 教育

第一章 基础教育

- 第一节 幼儿教育
- 第二节 小学教育
- 第三节 普通中学教育
- 第四节 考试
- 第五节 教研教改

第二章 职业教育

- 第一节 全日制职业教育
- 第二节 成人教育

第三章 教育管理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教师管理
- 第三节 经费管理

第十五编 医药卫生

第一章 医疗卫生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队伍
- 第三节 设施设备
- 第四节 疾病防控
- 第五节 爱国卫生运动
- 第六节 妇幼保健
- 第七节 医疗保障制度

第二章 药品食品

- 第一节 中药材生产
- 第二节 药品经营
- 第三节 监督管理

第十六编 文化 科技 体育

第一章 文化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地名文化
- 第三节 民俗文化
- 第四节 节日文化
- 第五节 称谓文化
- 第六节 饮食文化
- 第七节 住宅文化
- 第八节 文学艺术
- 第九节 文化建设与市场管理
- 第十节 旅游
- 第十一节 科技

第二章 图书编纂出版发行

- 第一节 地方史志
- 第二节 图书发行与销售

第三章 文物古迹

- 第一节 古迹
- 第二节 文物
- 第三节 文物发掘与保护

第四章 档案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管理与保护

- 第三节 开发利用
- 第五章 体育
 - 第一节 传统体育
 - 第二节 当代体育
 - 第三节 体育竞赛
- 第十七编 劳动 人事 民政

第一章 劳动和社会保障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企业职工队伍
- 第三节 劳动保护
- 第四节 就业服务
- 第五节 劳务开发
- 第六节 社会保障

第二章 人事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干部队伍
- 第三节 编制

第三章 民政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赈荒救灾
- 第三节 优抚安置
- 第四节 行政区划管理
- 第五节 基层政权建设
- 第六节 事务管理

第十八编 社会生活

第一章 人口

- 第一节 人口迁移与人口密度
- 第二节 人口构成
- 第三节 居民生活

第二章 计划生育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人口控制
- 第三节 计生管理与服务
- 第四节 优生优育

第三章 宗教

- 第一节 道教
- 第二节 佛教

第四章 方言

- 第一节 语音
- 第二节 语汇
- 第三节 谚语
- 第四节 歇后语
- 第五节 语法
- 第六节 修辞

第十九编 人物

第一章 人物传记

- 第一节 政界人士
- 第二节 知识分子与知名人士

第二章 人物简介

- 第一节 政界人士
- 第二节 知识分子与知名人士

第三章 人物列表

- 第一节 革命烈士及立功受奖人员
- 第二节 副县(团)级以上政界人物
- 第三节 副高级以上职称知识分子
- 第四节 获省(部)级以上表彰的先进人物

第二十编 艺文

第一章 新闻作品

- 第一节 报刊文章
- 第二节 影视作品

第二章 文学作品

- 第一节 诗歌
- 第二节 散文 小说

后记

索引

平凉籍学人与《四库全书》

朱克雄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纂,3800多人抄写,费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我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溯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同前苏联关系恶化,为了确保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安全,1966年10月在周总理亲自批示下,文化部决定将沈阳故宫文溯阁的《四库全书》拨交甘肃保存。20世纪90年代,辽宁省有关方面向甘肃省表示希望文溯阁《四库全书》回迁辽宁,甘肃没有答应。50年来,这部《四库全书》已经成为甘肃人的荣耀,更是甘肃的一张文化名片。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多年间,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二次补抄。1914年在杭州图书馆第一任馆长钱恂的支持下,由徐锡麟二弟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福洗自费补抄,历时7年,史称“乙卯补抄”。1923年,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得知徐仲荪、堵福洗的义举后,十分感动,但他知道“修补”量相当浩大,单靠几个人很难

完成,必须由政府牵头。在他的重视下,补抄人员增加到百余人,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荪任总校,堵福洗任监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解放初,由于徐仲荪和堵福洗修补《四库全书》有功,他们俩的画像曾被悬挂在杭州文澜阁,以志纪念。目前《四库全书》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如今《四库全书》只存三部半,其中文溯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于1950年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半部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据统计,《四库全书》的正本(著录书)中共收录了甘肃作者14人,著作18种182卷,存目中有16人,共计30人;其中平凉作者达16人(正本9人、存目7人),占到全甘肃的一半以上。甘肃学人的著作尽管在数量上不能同江浙等地的相比,但甘肃学人特别是平凉学人的著作在《四库全书》中分量和对华夏文化的贡献丝毫不容忽视。

王嘉《拾遗记》10卷被《四库全书》收录。王嘉(?-390),字子年,陇西安阳(今静宁东南)人。是当时的一个方士,滑稽好语笑。王嘉初隐居于东阳谷(今秦安县兴国古城、兴丰乡),凿崖穴居,有徒弟数百人。石季龙之末(348),由于战乱,王嘉丢下徒弟到长安,潜于终南山,结庵庐而止。他的徒弟寻着他的遗迹也到达终南山,他又迁隐于倒兽山(今陕西临潼新丰镇南)。苻坚屡次征召他出山做官,他都没有答应。后被逼无奈,于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冬入长安,居于宫中外殿。王嘉“能言未然之

事,辞如讖记”,所以公侯以下,都到王嘉处参拜,询问世事。太元十一年(386),姚萇入长安,仿效苻坚的做法,在礼节和待遇上都超过了苻坚对王嘉,并逼迫王嘉随从他,每件事情都要向王嘉询问。当归姚萇和苻登相持战争,姚萇问王嘉:“吾得杀苻登定天下不?”王嘉回答说:“略得之。”姚萇愤怒地说:“得当云得,何略之有?”于是一气之下便杀了王嘉。但后来姚萇死后,事实上确实是他的儿子姚兴杀掉苻登的。遗憾的是姚萇不曾听懂王嘉的话,怒气之下杀了不该杀的人。

前秦王嘉的志怪小说《拾遗记》(一名《王子年拾遗记》)。《拾遗记》原书19卷、220篇,由于苻秦之际的战乱,典章散失。南朝梁代的萧绮缀拾成文,合为一部,改编为10卷,今行于世。《拾遗记》中的一些篇段故事情节、人物描写等方面都较为完善,初具短篇小说规模。王嘉可谓中国短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

李世民的《帝范》4卷被《四库全书》收录。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年1月28日〈一说599年1月23日〉-公元649年7月10日),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是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

《帝范》书成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共十二篇: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诚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为文虽短,但文辞有力而优美,展现出一代英主对人生和世界的体悟;也是一个马上争天下、马下治天下的开国君主一生经验的总结。其充满哲理性的语言,或一言中的,或一语道破天机。不但闪露着看问题的高瞻远瞩,也隐含着论理的深邃透彻。《帝范》一书是李世民一生执政经验的高度浓缩。他曾经这样告诉太子:“飭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可见,他对《帝范》的高度自信。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帝范》中,他对为政者的个人修养,选任和统御下属的学问,乃至经济民生、教育军事等家国事务都做出了非常有见地的解答。毛泽东曾说“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即李世民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每早视

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议,出言周密;罢朝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讨论是非;晚上同人高谈经典文事。对这位古代领袖俊杰的为政能力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李隆基《孝经正义》3卷被《四库全书》收录。唐玄宗李隆基(685年9月8日-762年5月3日),亦称唐明皇,公元685年出生在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712年至756年在位。前期注意拨乱反正,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励精图治,他的开元盛世是唐朝的极盛之世,在位后期宠爱杨贵妃,怠慢朝政,宠信奸臣李林甫、杨国忠等,加上政策失误和重用安禄山等佞臣,导致了后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为唐朝中衰埋下伏笔。756年李亨即位,尊其为太上皇。762年病逝。

唐开元七年(719),玄宗亲自为《孝经》作注,至天宝二年(743),玄宗又重注《孝经》,为开元注作了增补及修订。《孝经注疏序》称,“唐明皇遂于先儒注中采摭菁英,芟去烦乱,撮其义理允当者,用为注解。至天宝二年(743)注成,颁行天下”。玄宗注参用孔、郑及韦昭、王肃、虞翻、刘劭、刘炫、陆澄等家之注并举出六家注本之异同,分别列于经文后。而“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又义阙。今存于疏,用广发挥”(《御注序》)。《孝经》今古文之争的论战,由玄宗注而肯定了今文。至天宝三年(744年),“诏天下家藏《孝经》,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申劝课焉”(《唐会要》卷七十五)。天宝四年(745年),玄宗更亲以八分书写《孝经》并刻石于太学,谓“石台《孝经》”,对后世影响很大。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诏令邢昺为《孝经正义》作疏。今存《十三经注疏》之中,为后代流行之注疏本。

李贺5卷著作被《四库全书》收录。李贺(790-816),字长吉,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阳)人,郡望陇西(今甘肃静宁西南),家居福昌之昌谷,后人因称“李昌谷”。唐代诗人,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

李贺《昌谷集》4卷,《外集》1卷,所写的诗大

多是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留下了“黑云压城城欲摧”“雄鸡一声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千古佳句。

李白《李太白文集》30卷被《四库全书》收录。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著名诗人,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生于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成长于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青莲乡,二十五岁起“辞亲远游”,仗剑出蜀。天宝初供奉翰林,因遭权贵谗毁,仅一年余即离开长安。安史之乱中,曾为永王璘幕僚,因璘败系浔阳狱,远谪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晚年投奔其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后卒于当涂,葬龙山。唐元和十二年(817),宣歙池观察使范传正根据李白生前“志在青山”的遗愿,将其墓迁至青山。今存990多首诗歌,有《李太白文集》三十卷被《四库全书》收录。李白在唐代已经享有盛名。他的诗作“集无定卷,家家有之”,为中华诗坛第一人。

李绹《李相国论事集》6卷被《四库全书》收录。李绹(764—830)字深之,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宰邑臣李刚之孙,襄州录事参军李元善之子,大唐王朝官员。擢进士、博学宏辞,授秘书省校书郎,补渭南尉。德宗皇帝贞元末年(805),拜监察御史,以本官充翰林学士。宪宗皇帝元和初年(806),改尚书主客员外郎,未几,转司勋员外郎。元和五年(810),迁本司郎中、知制诰。继历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帝数赐对三殿,甚敬惮之。每有询访,随事补益,累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爵高邑县男。言愈切直,与李吉甫等不协,以足疾求免,罢为礼部尚书。寻改检校户部尚书,出为华州刺史。复入任兵部尚书、检校吏部尚书。旋出任河南观察使。穆宗皇帝长庆元年(821),改御史大夫、吏部尚书,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判东都尚书省事,充东都留守、检校司空。敬宗皇帝宝历初年(825),拜尚书左仆射。李绹以直道进退,望冠一时,屡为谗邪所伤。被李逢吉累贬太子少师,分司东都。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大

和初年(827),征拜太常卿,加银青光禄大夫,兼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位至上柱国,封爵赵郡公。后为乱兵所害,赠司徒,谥号曰“贞”。

《李相国论事集》是一部记载中唐宰相李绹奏议之文和论谏之事的文集。由于涉及的领域广泛,该文集成为后人研究中唐政治、经济、藩镇、宦官、民生的重要文献之一,同时也是今人研究李绹生平、思想、精神、品格的重要著作。

李翱22卷著作被《四库全书》收录。李翱(772—841),字习之,唐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人。是西凉王李暠的后代。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李翱是唐德宗贞元年间进士,曾历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考功员外郎、礼部郎中、中书舍人、桂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他曾从韩愈学古文,协助韩愈推进古文运动,两人关系在师友之间。李翱一生崇儒排佛,认为孔子是“圣人之大者也”(《李文公集·帝王所尚问》)。主张人们的言行都应以儒家的“中道”为标准。

《论语笔解》2卷作为韩愈、李翱二人合著的一部解经之作,以“对话体”的形式进行解经,并以“己意解经”,突出了他们尖利大胆、直白达意、相互推崇补充的一面。这些足以说明了《论语笔解》是一本有特色的解经之作,在中国思想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卓异记》1卷,记唐室功业殊异者,二十七类。

《李文公集》18卷,李翱是韩愈的追随者,是宣扬孔孟传统思想的唐代代表人物之一,《李文公集》中《复性书》一篇,就是作者崇尚孔孟思想的代表著作。李翱同韩愈一样,也反对佛教,但其思想,却有一定程度的不彻底性。在《复性书》中,他的主要理论根据是《中庸》。《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并提出“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的说法,把“诚”看作是世界的本体,其唯心主义思想较《大学》更为明显。李翱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说,并为性善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所谓“复性”的“性”是指人先天就具有的封建伦理纲常这种本性,这种本性天生就是善的,“情由性而生”,

则有善有不善，“情既昏，性斯匿矣”；所以，他提出用“正思”的方法，消灭邪恶的“情”，这才是到达“圣人”的基础。才能够“复性”为“圣人”；有些人失去这种本性（善性），既然是由于“情”，也即受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干扰的结果，那么，也只有彻底消灭人情感欲，本性（善性）才能复归。由于作者受佛学影响较深，反佛思想不彻底，故《复性书》中亦夹杂了一些佛教思想。李翱在此书中推崇的《中庸》及其师韩愈所推崇的《大学》，到了南宋与《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成为封建学者必读的经典，所以，李翱与韩愈同开宋明理学的先河。除《李文公集》外，《习之先生全集》亦载收，前者主要以《四部丛刊》，后者主要以《唐宋十大家集》本行世。

《五木经》1卷，有“樗蒲五木，玄白判。樗蒲古戏，其投有五，故白呼为五木。以木为之，因谓之木。今则以牙角尚节也。判，半也，合其五投，并上玄下白，故曰玄白判。”

牛僧孺《幽怪录》1卷被《四库全书》收录。牛僧孺，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卒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在牛李党争中是牛党的领袖，唐穆宗、唐文宗时宰相。他既是政界的贵胄，又是文坛的名士。

牛僧孺作《玄怪录》，杨用修修改为《幽怪录》。因世庙时重玄字，用修不敢不避。它是古代汉族传奇小说集。原为十卷，或作十一卷，今存三十一篇。《幽怪录》一卷，《续幽怪录》一卷（两淮地政采进本）《幽怪录》。所作多怪异之事，是较早的传奇小说专集，为唐代文言小说精品，对后世影响较大。

李复言5卷著作被《四库全书》收录。李复言（775-833），名谅，字复言，唐小说家。陇西（今甘肃静宁）人。顺宗时，王叔文曾荐其为谏官，推许甚至，元和时任彭城令，后历任苏州刺史、汝州刺史、泗州刺史等职。大和间尚在世。与白居易友善，有诗倡和。应举时，缴纳“省卷”中有小说《纂异》一部，被斥为“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因此罢举。

李复言《续幽怪录》1卷和《续玄怪录》4卷为唐代传奇小说集，因续牛僧孺《玄怪录》和杨川修《幽怪录》而得名，写的都是流传较广的故事。

李廌《续世说》10卷被《四库全书》收录。李廌，1179年，李焘次子，字仲信，唐代陇西（今甘肃静宁西南）人，乾道五年（1169），李廌得吏部尚书汪应辰荐，试贤良方正科，果中。擢为秘书省正字，旋迁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编修官，与父李焘共典国事，同为南宋史家重臣，明显于缙绅达官之间。李廌性刚直，忠言极谏，多次上策奏议国家大事，后人评价很高。

李廌撰《续世说》10卷，谓“其书惟取李延寿南北二史所载碎事，依《世说》门目编之”，通过分门别类的编述，“发史氏之英华”，寄托作者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抱负，同时也有一定的史学、文学价值，对于研究当时社会的变化特点、文人的生活习俗、人格典范等具有参考价值。

洪璚《空同词》1卷被《四库全书》收录。南宋词人洪璚字叔琦，号空同词客，平凉人。空同有二义：一指道之境界，《关尹子·九药》有“昔之论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二为山名，又称空桐、空峒、崆峒，在今甘肃平凉西，险峻雄伟，山上道观极盛。《庄子·在宥》：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如此，洪璚或逍遥江湖，并未入仕。

《空同词》1卷此集仅词十六首。据毛晋跋语，乃全自黄升《绝妙词选》中摘出别行，非完帙也。卷末咏渔父《清平乐》一阙，据《花庵词选》本连久道词，且载其本事甚明。因二人之词相连，遂误入之璚词中，实止十五首耳。

赵时春46卷著作被《四库全书》收录。在《四库全书》这一中国文化事业的巨献中，能收录赵时春的《平凉府志》《赵浚谷集》《别本赵浚谷集》共计46卷，确实是很不简单。

赵时春（1509-1566），字景仁，甘肃平凉城南浚谷村（今纸房沟）人。一生著述颇多，是《明史》立传的甘肃籍人物之一，明朝中叶著名文学家。14岁中乡试，嘉靖五年（1526）18岁时荣中会试榜首，是被人们称之为“宋有欧苏，明有王赵”的嘉靖八才子之一。他一生仕途坎坷，曾三起三落。两次因秉直上疏，被削职为民。二十九年（1550）五月，京师被

寇，鞑靼进犯。经兵部左侍郎王邦瑞推荐，同年九月再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协理京营军务。因反对大将军仇鸾向蒙古开设马市的倡议，为仇所忌恨。次年，调任山东按察司统民兵佾事、佾都御史，为正五品。三十一年(1552)为四品按察使司副使。三十二年(1553)春，任都察院右佾都御史，巡抚山西，统领雁门三关防务，为正四品，全面负责山西御戎事务。是年九月，鞑靼进犯神池(今山西境北)等内长城，遂率兵急趋御敌，行至广武(今山西雁门关一带)，遭敌伏击，兵败，解职归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赵时春被免官后，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平凉故里以《史记》为范本，遍访乡野，寻觅古迹，查阅史料，广采博录，直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历时5年，才完成的10册13卷29万字的《平凉府志》，是平凉有史以来首部府志，因取舍精详，记事赅确，成书后，名重一时。在明代平凉府辖3州7县，该志前3卷为府志，此后各卷为州县志，依次为平凉县、涇州、灵台县、静宁州、庄浪县、固原州、镇原县、华亭县、崇信县、隆德县。《平凉府志》以平凉为西北要地，旧未有志，因创修之。分十七门：建革、山川、户口、田赋、物产、坛祠、藩封、官师、兵制、学校、人物、孝节、风俗、河渠、寇戎、寺观、祥异。其考证叙述，具有史法，在关中诸志之内最为有名。

《平凉府志》成书早，刻印较迟。民国23年(1934年)，甘肃方志学家张维在北平图书馆见之“漫灭虽多，大体尚可缮录”，归过平凉，告时任专员范朴斋，函平抄录一本。10年后，张维又亲抄录并“正其文字”，使此志大略可读。《平凉府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其主要特点有四：一是考证有据，记述准确；二是“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体例简而有序，自有创新；三是关注民生疾苦，对当时王府亦敢抨击；四是不设“艺文”，避免滥收诗文，颇见自知之明。

李应奇《崆峒山志》3卷被《四库全书》收录。李应奇，字鹤崖，明代平凉人。官延州、庆州知州，开封教授。

《崆峒山志》3卷，是书成于万历十三年(1585)，凡分七门，曰《分野》，曰《建革》，曰《疆

域》，曰《形胜》，曰《田赋》，曰《仙迹》，曰《题咏》。然一山之志，即不应及分野、建革，而中间兼记及瓦亭关、会盟坛之类，又殊似府志之体例，殊丛杂无限断也。

皇甫谧11卷著作被《四库全书》收录。《针灸甲乙经》八卷和《高士传》三卷被《四库全书》收录。皇甫谧，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人。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卒于西晋太康三年(282)，享年68岁。作为一位自学成才的布衣学者，皇甫谧在文学、史学、历法学、医学方面均有贡献。他所编撰的《针灸甲乙经》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理论系统、临床内容丰富的针灸专科典籍，对我国针灸学，特别是针灸文献的发展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深远影响。《针灸甲乙经》八卷，全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黄帝针灸经》《针灸经》《甲乙经》(以下简称《甲乙经》)，主要由《素问》《九卷》《明堂》三部古医经类集而成。据现行本自序，该书系皇甫谧编集，成书于魏·甘露(256-259)年间。宋·林亿校本《甲乙经》自北宋刊行后，南宋、金、元均未见重刊，现存最早刊本为明·万历吴勉学校刊《医学六经》本。此本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收入吴勉学校刊《医统正脉》丛中，现存此书多系清代书坊重修本，断版缺字较多，并可见较多的补版。又有明代蓝格抄本，出自宋校本，但与“六经本”非出自同一底本，可校补前者脱误之处颇多。此本非精抄本，前后体例不一，错乱、残缺之处也不少。《四库全书》本与余云岫所引之所谓“嘉靖本”相吻合，也有一定参考价值。故校勘《甲乙经》一书，当以“六经本”为底本，以“明抄本”作主校本，以“四库本”作参校本。至于所谓“抄正统本”者，问题很多，作伪充古之迹显然，不宜再作为校勘《甲乙经》的依据。

传世本《甲乙经》至少有四重构成，即：皇甫谧所编之原集；宋以前医家补注之文；宋代林亿校注；宋以后注文。其中标有“素问曰”“九卷曰”等文字及注有“解曰”之类注解性文字系原书旧文，非唐宋间人所增补。“六经本”中双行小字注文绝大多数系宋人注文。

现行本卷首所载“序例”一篇系原书旧有，非

林亿新增。宋以前医书所引《甲乙经》之文体例多与此“序例”相吻合；宋本《甲乙经》仍与“序例”基本相符，而传世本颇与此“序例”不同者，系后人特别是宋以后人所删改。

现存的《高士传》分上、中、下三卷，采尧、舜、夏、商、周、秦、汉、魏八代之士，立91传，其中《长沮桀溺》、《鲁二徵士》一传记2人，《四皓》一传记4人，共记96人。立传的标准，用皇甫谧自己的话说是“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皇甫谧·高士传序》）。按照这个标准，被孔子、司马迁称颂过的伯夷、叔齐，被班固表彰过的“两龚”即龚胜、龚舍，也不在立传之列。伯夷、叔齐宁肯饿死，耻食周粟，执节很高，但毕竟有过“叩马而谏”的自屈行为；两龚断然拒绝出仕新莽，晚节很好，但早年总是出过仕的。因此，皇甫谧《高士传》记载的96名高士全是经过旁推毖纬、钩探九流、水中澄金而得到的没有出过仕的“高让之士”（《高士传序》）。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及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甚至于一个侧面的社会历史。

李学孔《皇王史订》4卷被《四库全书》收录。清渭州（今平凉）人李学孔撰《皇王史订》4卷是“编以刘恕《外纪》义类未确，端绪难明，因订正其

文。上自盘古氏，下迄周幽王。东迁而后，春秋既作，则不复录焉。大抵摭拾罗泌《路史》之说，加以臆断耳。”

张晋《张康侯诗草》11卷被《四库全书》收录。清朝张晋字康侯，陇西狄道（今静宁西南）人。顺治壬辰进士，官丹徒县知县。其诗颇学李白，兼及李贺之体。

《张康侯诗草》11卷第一卷为《黍谷吟》，第二卷为《秋舫一啸》，第三卷为《蓟门篇》，第四卷为《劳劳篇》，第五卷为《石芝山房草》，第六卷、七卷为《雍草》，第八卷为《税云草》，而以诗馀附焉，第九卷为《律陶》，集陶诗为五言律也；第十卷为《集杜》；第十一卷为《集唐》，亦皆五言律。据《后跋》云，尚有七律集句，未经编入云。

按照《四库全书》著录书作者的分类，平凉籍作者涉及政治、哲学、宗教、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从著录书和存目书综合情况来看，平凉籍人在清朝以前被《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具有陇右文化的鲜明特色，这些人是清朝以前平凉文化界的典型代表，更是古今平凉人民的骄傲。

（作者系平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书 讯

近日，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省政府参事车安宁科普新作《人类与水》一书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正式出版，并由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销售网点发行。

该书科学与文化并举，知识与趣味交织，以水为主题展开对于相关知识的全面介绍和论述。作者以宏观视野论及人类与水的关系，从多个视角，不同的层面向读者展示了水知识、水文化、水科学的魅力。论述范围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

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文学、政治、文化、民俗、地质、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灾害、水利、生态等诸多学科，不仅从现代科学角度讲述水的形成、分布与分类，也大量引用古代典籍和典故，讲述传统的水文化及其演变，并延伸至今天的水利建设和节水环保等方面。同时，书中也涉及对当前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评论和建议，是作者对当代新型科普读物在创作方面的一次有益尝试。

马廷秀在西和的几件事

魏泽民

马廷秀(1900—1994),字紫石,回族,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人,祖籍甘肃康乐县。清同治年间,祖父移居兰州南滩街(今城关区互助巷)。八岁入学,后随母亲辗转河州(临夏回族自治县)、兰州读书。先后毕业于兰州清真小学、兰州一中。1920年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读书,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并于1922年在上海邂逅张宗海。

张宗海,字瀚清,甘肃兰州人,清末考入甘肃陆军小学,后来被保送到湖北陆军学校就读,在那里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湖广总督瑞澂被迫打破督署后墙,坐船从长江逃走。第二天,张宗海在黄鹤楼上升起了第一面起义大旗。此后,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全国各省民众也积极响应武昌起义。11月,湖北军政府成立,通电全国各省派代表参加典礼,由于甘肃路途遥远,张宗海在武昌就以甘肃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军政府成立典礼。

1914年,袁世凯阴谋复辟,成立筹安会,张宗海秘密潜回兰州,在兰州联络甘肃议员王鑫润等开展倒袁活动时,引起了袁世凯的心腹、时任甘肃督军张广建的注意,张宗海被迫东渡日本。1917年,张宗海从日本回国,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从事护法运动失败后,张宗海一度流落上海,生活陷入困境之中。为帮助张宗海,孙中山先生甚至曾把自己的衣物拿出来交给张宗海变卖,以解眼下的困局,还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格言相勉励。后来,张宗海又因反对蒋介石,在上海遭到特务暗杀。

马廷秀与张宗海1922年在上海的邂逅,以及张宗海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到底的人生追求,给当时还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读书求学的马廷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4年,马廷秀在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后,进入马福祥的绥远都统府任书记官。1925年,马福祥离开绥远蛰居天津后,马廷秀又回到兰州,主办甘肃回教促进会。1930年,马福祥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廷秀又一次担任马福祥的秘书。此后,马廷秀先后任甘肃省民政厅科长及古浪、甘谷、西和等县县长。下面介绍马廷秀先生在西和任县长期间的一些情况。

一、红军过境西和,力避武装冲突

1936年3月,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任命马廷秀担任西和县县长,马廷秀即卸任甘谷县县长,赶往西和县就职。当年9月,红二方面军长征过境陇南西和。当时,国民党中央军第三军王钧部旅长马琨带两个营的兵力驻防西和,目的是堵截参加成徽两康战役的红二方面军。红军从岷县到礼县将至西和时,马廷秀县长就找马琨旅长私下商量对策,马琨说红军的罗炳辉军长与我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他已写信联络过了,约定在红军过境西和时互不动武,绝对不会发生战争。马廷秀也私下对西和县政府民政科长乔芝繁等说,我已同马旅长商量好了,在红军过境时,采取和平手段,我们也不打红军,红军也不会打我们。红军只是借道过境,决不会攻打西和县城,请大家安心工作,并向百姓宣传,不要自相惊扰。马县长与马旅长达成了默契,决定采取两不相扰的办法让红军过境西和。但为了搪塞上司,他们一方面积极备战,加强城防力量,在皇城修筑营垒,开挖战壕,做出堵截红军

的姿态；另一方面派人去岷县、礼县打探红军的消息。

9月14日，由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二军四师和三十二军组成的中路纵队，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带领下，从礼县江口渡过西汉水，进入西和县姜席乡的曹沟、彭寺、四图、周庄一带宿营。15日从姜席出发，四师十二团沿晚家峡（今晚霞湖）冯坪梁直插皇城，掩护主力部队取道强郑、板桥子，向姚家河、二郎坝一带开拔。

红军经过西和县皇城时，马琨部队在皇城摆出了堵截红军的架势，子弹上膛，瞄准过境红军，完全进入战备状态，但并没有向红军开枪。而一名红军战士发现中央军正在瞄准他们，觉得情况不妙，首先向驻军开了一枪，国军一名下士被击毙，于是双方展开了短时间的对射，在对射过程中红军迅速通过皇城，但西和驻军并未追击。当晚，红军在漾源乡（今十里乡）十里铺、板桥子、姚家河、何家沟、避风湾、二郎坝一带宿营。9月16日，红军向礼县石峡、成县小川方向继续前进。当晚，红军在甘肃省第四区（天水）保安司令部直属中队长马尚智控制区的石峡一带宿营，17日经成县小川，进入成县境内。

红军过境西和后，驻防西和县的国民党第三军马琨所部开始清乡，因患疾病和伤残而掉队、流落西和乡村的十多名红军战士，在清乡过程中被西和县政府县长马廷秀和民政科长乔芝繁等收留后，暂时安排在县城北关关帝庙内休息养病。马县长派人在关帝庙的地面上铺了草席和芦苇，还解决了伤病员的食宿问题，并请西和县大水街天主堂的西医为他们诊治疾病，后来又把部分恢复了伤病的红军战士转交给驻防天水的国民党中央军第三军军长王钧部。

二、保境安民，消灭土匪

地瘠民贫的西和县境内，土匪猖獗，民不聊生。地方势力趁机聚众起事，各地舵把子又纷纷效仿，自立山头，抢夺地盘，啸聚山林，占山为王，劫掠民户和客商。其中邵青莲投靠了康县的阎俊山，被委以营长，以八峰崖为据点，控制了石峡、西高山一带；马尚智、马尚仁盘踞大桥铁山媳妇溜燕儿

洞；太石河的王好善也招兵买马，准备攻打西和城。“神团”马思才在太石河一带训练团丁，大南路的齐海、杨齐变等啸聚阴阳山、北沟堡子；小南路的林得仓、云中雁、李巨巨等盘据云雾山为匪。下寨子、刘家河坝的刘玉莲、刘琪等组织了“英雄会”，茨莓子湾的毛娃子组织了“大刀会”。康县闫俊山的喽啰时常流窜到县南的纸坊镇一带骚扰，扇子会则在县北盐官镇一带活动，虎彦山和苏焕祥匪帮在通往天水的要道四道岭和坡儿上抢劫。这些舵把子大多参加了帮会组织，他们互相勾结，结成团伙，聚众为寇。各股土匪抢占地势险要的山头城堡作为据点，啸聚一方，占山为王。经过吉鸿昌、梁应奎、蒋云台等多次清剿，小股土匪大多数被消灭了，但几股势力较大的土匪仍然存在。红二方面军过境西和后，土匪问题又成了马廷秀最纠结的事：南乡有大桥的马尚智亦官亦匪，不好对付；北乡盐官镇一带又出现了个虎老五一伙土匪，有长短枪几十支。这种态势，令马廷秀十分为难。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团结抗日的主张，主张全民族的抗战，实现了国共合作。在团结一切力量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马廷秀从全局着眼，为了团结各种力量，减少内部摩擦，实现全民族抗战，他与中央军第三军驻军马琨旅长协商后，决定对啸聚大桥大小河地区、屡剿不验的马尚智，由原先的“围剿”改为“安抚”和“联合”，决定对马尚智暂时采取羁縻措施，继续任命他担任铁桥、庙山二保的联保主任，先笼络住他，以后再图解决。马尚智、马尚仁一伙在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为了获得喘息的机会，也接受了甘肃省第四区（天水）保安司令部的招抚，马尚智被委任为甘肃省第四区（天水）保安直属中队队长，马尚智从此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亦官亦匪的马尚智也积极拥护抗日，愿意为抗战出力。还在大桥修建小学，修通了西汉水上被洪水冲毁了的铁索桥。

南乡的马尚智暂时被羁縻住了，但北乡又出现了白关乡坡而上的土匪虎老五、苏焕祥一伙。他们在西和、礼县、天水、徽县四县交界地带——四道岭子一带杀人越货，抢劫客商，神出鬼没，飘忽

不定。虎彦山(俗名虎老五)和苏焕祥在民间被传得神乎其神,据说都有飞檐走壁的本领。

为了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活动,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马廷秀一方面筹备成立三青团西和分队,准备吸收优秀青年参加。1938年7月三青团西和分队成立,马廷秀兼任分队长,县党部干事何文德兼任分队副。但当时三青团西和分队既无办公地址,又无办公经费,只能作些抗日宣传工作,没有吸收三青团员,也没有发展三青团组织。另一方面,鉴于西和匪患连年,为了绥靖地方,马廷秀决定成立西和县保安大队。他积极斡旋,通过关系派人去康县阳坝买了20多支枪,与原有枪械凑成了六十支枪,招募本县壮丁,组建了两个保安中队。

西和县保安中队成立之后,除了打击县城周边的小股土匪外,对盘踞在西和县北部盐官四道岭子上的坡儿上的虎老五一伙也采取了应对措施。但要用县保安队的那点武力解决虎老五一伙显然力不从心,马廷秀从大局着眼,决定招抚虎老五一伙,而实力有限的虎老五和苏焕祥等也觉得不能跟南乡的马尚智相比,也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愿意接受政府的招抚和收编。

马廷秀招抚虎老五一伙后,正式成立西和县保安大队。就在马廷秀县长全力以赴筹备组建西和县保安大队的时候,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37年冬天,虎彦山(虎老五)和苏焕祥声称要进攻西和县北部商贸重镇盐官城。盐官是西和县的北部重镇,商贸中心,当地绅士康海、魏启元等向西和县长马廷秀告急,要求县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城防力量,保卫盐官城。马廷秀县长一方面采取措施加强盐官的城防力量,另一方面利用他回民的身份,以同族之谊派人北上与虎彦山、苏焕祥会谈,规劝他们放下武器,归顺政府,不要把事情闹大,更不能把事情做绝,以免自断其路。虎老五和苏焕祥也知道自己的实力太弱,跟“两史”作战已经损兵折将,吃了大亏,手下有百十号人,要跟西和县政府作对,当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最好的出路还是归顺政府。但是,他俩又认为,如果乖乖地向西和县政府投诚,那么,他俩将来在

县政府保安队中的位置就不好说了。为了增加与西和县政府谈判的筹码,他俩决定在马县长的谈判代表尚未到达之前,来个先下手为强,让西和县政府也知道他们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地方武装。为此,他俩决定利用腊月上旬的一个逢集天在盐官城里搞一次突袭行动,结果,那一天他们乔装打扮成进城赶集,断断续续混进盐官城,然后在盐官城里以鸣枪为号,开始放纵抢掠,他们不仅抢劫了盐官城里的店铺和盐民,还洗劫了盐官税务所,在盐官城里大捞了一把,城内的商人和盐民惶恐万分。虎老五一伙的这一行动,令马廷秀县长着实为难,因为这就几乎堵死了收编他们的路。令马廷秀县长更为恼火的是,收编虎老五一伙土匪之事遭到曾被虎老五抢掠的盐官税务所收税员定西人杨雨亭的坚决反对,杨雨亭还向省政府诬告马廷秀县长“与虎老五私下勾结,沆瀣一气,收受好处,收编匪类,共谋不轨”。

马廷秀将成立西和县保安大队的详细情况呈报甘肃省保安司令部和第四区(天水)保安司令部,要求甘肃省保安司令部和第四区(天水)保安司令部同意他收编虎老五一伙土匪,将其降众暂编为县保安大队直属中队,由虎老五任中队长,苏焕祥任中队副,与县保安大队部同驻西和县城,并对即将成立的县保安大队及其将要招降改编的虎老五直属中队予以备案。

西和县保安大队按团级编制,所以民间也叫西和县保安团。县保安大队设上校大队长1名,由县长马廷秀亲自兼任,少校大队副1名,上尉中队长2名,中尉副官1名,少尉书记、军需官各1名,少尉分队长6名,准尉特务长2名,上士司书2名,士兵188名,预算每年支出薪饷、服装费共计需要大洋4万多元。就这样,马廷秀县长在西和县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武装,人心为之稳定,地方人士颇感平安。

但省政府认为马廷秀作为一县之长,不可能与土匪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于是给西和县政府发了一封回电,并写有“马县长亲译”字样。马廷秀亲译了电文,电文如下:“呈文已收。既已将土匪调入城中,即应相机解决。”省政府密令马廷秀将主犯

虎彦山、苏焕祥予以就地解决，胁从匪众就地遣散。省政府的这一密令使马县长左右犯难，因为虎彦山和苏焕祥都是回民，自己又事先答应他们，收编之后既往不咎，现在又要他出尔反尔，相机解决，真的有些于心不忍，但省政府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收编虎彦山、苏焕祥一伙成了一颗烫手的山芋。马县长踌躇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执行省府密令，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办法，这样于心也好受一点。于是，马廷秀就邀请时任西和县军训教官、上校团副张廷哲和县保安大队副赵寿珊密商，定下行动方案，然后各自行动。

1938年3月的一天，马廷秀县长以个人名义，在西和县保安大队部宴请县上的头面人物和地方绅士，并邀请刚刚编入县保安大队直属中队的虎彦山和苏焕祥二人赴宴，还请张廷哲和赵寿珊等人作陪。

张廷哲按照马廷秀县长的安排，授意保安队少尉分队队长刘兆明，带领保安大队和新收编的虎彦山、苏焕祥直属中队全体队员到东河坝操场操练枪法、练习架枪取枪，然后练习徒手拳，并派一个可靠的保安队分队在操场外持枪警戒。虎老五和苏焕祥不知是计，毫无心理准备，按时到保安大队大队部赴宴。当虎彦山、苏焕祥赶到县保安大队大队部时，在门口站岗的哨兵立即向虎彦山、苏焕祥“立正”、“敬礼”，二人觉得很威风，一左一右大摇大摆向大队部走去。当他俩一脚跨进保安大队部门槛时，事先埋伏在大队部左边的大队副传令兵谢有才就打了一梭子弹，直接结果了虎彦山的性命，而埋伏在大队部右边的武都籍伏击手王发财，因高度慌乱而致手枪走火，反倒打伤了自己的脚，眼明手快的苏焕祥乘混乱之机窜进了保安大队的厕所，从窗户逃出后翻越几座房顶，经县政府的马厩里逃出，爬上西城城墙跑掉了。

那天西和城正好逢集，四乡进城赶集的络绎不绝，街道上人来人往，不便开枪追击，苏焕祥侥幸脱逃。

当虎彦山和苏焕祥赴马廷秀所设的鸿门宴之际，在东河坝操场上的保安队和那些被收编了的土匪，把枪架起来，正在练徒手拳。刘照明听到城

内响起的枪声，当即下令持枪警戒的保安队士兵上前收了枪，马上集合。这时马廷秀也赶到东河坝操场，给他们传达了省政府的命令，并训话，要他们改邪归正，回家务农，还发了遣散费。

但此后苏焕祥仍然匪性不改，在逃离西和后又改名换姓，在天水、兰州、静远等地继续作恶，多次被捕又多次越狱潜逃。后来终于在兰州落网，被执行了枪决。

解决虎彦山、苏焕祥一伙的问题之后，马廷秀受到甘肃省政府的记功嘉奖：“击毙屡扰屡叛的惯匪，给予记功一次”。朱绍良主席还单独召见了马廷秀县长，亲切地称他为“老州县”。

1939年（民国28年）8月，马廷秀调任成县县长，何文德也前往成县任科长，张廷哲也跟随前往，三青团西和分队分队长改由继任县长李桓兼任，三青团西和分队分队副由县督学刘工烈兼任。但在马廷秀前往成县就职之前，民团团总何文德已经起身先往成县，在成县抢了不少人，因为此事，有人把马廷秀县长告到了省政府，说马县长还未上任，就先抢人，这样，马廷秀就没法子到成县赴任了，只得弃笔从戎，投奔宁夏马鸿逵，在其麾下干文职。

宁夏解放时，马廷秀任宁夏省政府秘书长，积极主动配合宁夏解放，与宁夏省政府五位主要领导人在宁夏和平解放书上签了字，宁夏百姓避免了一场战争，马廷秀等也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功臣。

三、发展电讯，修堤种树

马廷秀在西和县县长任上，因抗战的需要，觉得（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播报的消息非常重要，就派西和县政府第三科科长巫剑霞专程去上海购置了一套收音机设备，包括总机、两个接音喇叭，还有一些零部件回西和，聘请了一名收音员，在县政府设置收音机总机，在县党部设置了喇叭，安排来西和从事抗日宣传的抗日中小学教师服务团的人员逐日收录，不论是中央的抗战政策，还是各省战况播报、国际时讯等各项新闻消息，逐条按日期编成墙报，贴在墙壁上。

其实，此前，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在1924年1

月23日也派人携带收音机到西和,在朝阳观山头上设置无线电收音机,但后来又觉得在西和设置收音机用处不大,又把收音机带回了天水。

蒋云台旅长驻防西礼期间,于1933年曾架设了从西和城到礼县蒲王村(今苏合乡明星村)的电话线路30里,从蒲王村到礼县城的30里由礼县负责架设。但到1934年8月,蒋云台部换防后,这段电话线也就废除了。1936年,马廷秀县长在蒋云台架设的电话线路的基础上又开始架设由西和北通天水,西通礼县,南通纸坊镇的长途电话线。到1940年,李桓任西和县长时,又与成县县长协商,架通了从西和纸坊镇通往成县城的电话线路。

西和旧县城濒临漾水河,南门又是河水急拐弯处,河堤被冲刷得很厉害,一遇暴雨,就有决堤毁城的危险。马廷秀与西和绅士商量后,利用农闲时间,征用民工,用竹木笼装上砂子、石头等,在河水冲刷最厉害的地方修了一道一华里多长的河堤,还栽上了护堤树,上面广种草木犀和树木,以保持水土,解决了长期困扰西和县城安全的水患问题,百姓也得以安居乐业。马县长调成县县长后,西和人民为他立碑纪念,称他负责修建的那道河堤为“紫公堤”。

到1942年3月12日植树节动员大会上,新任西和县长王汉杰还说:“东河坝堤高坚固,树木茂盛,这都是前任马公廷秀之功。我们植树造林,一定要保栽保活,做到树活人活,要和马公一样,留下自己的足迹。”王汉杰即兴赋诗一首《西和植树节试做》:

西和绿化气象新,堤修河浚改乾坤。
万能果见在双手,谁信上帝是真神。
百万树木百万军,树木本与树人同,
山沟河畔遍利用,莫把时机稍放松。

在马廷秀和王汉杰等几位县长的大力倡导下,几年之后,西和县城周边林荫遮道,郁郁森森,鸟在枝头唱,人在树下行,人居环境大为改善。

四、关心穆斯林,捐修清真寺

民国时期的西和,县城穆斯林的生活极端贫困,无法供养阿訇,清真寺也无人主持礼拜活动,清真寺长时间关闭,正在修建的清真寺大殿也不

得不停工。马廷秀和夫人张淑静女士以普通穆斯林的身份,尽其所能,积极捐款,修缮清真寺,给西和北关清真寺大殿做了门窗,整了地板,还题写了“开天古教”四个大字的匾牌,让人挂在大殿上(匾牌今已失传),为穆斯林礼拜活动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场地。在调离西和前夕,马廷秀县长又资助西和县北关清真寺修建了四间北房,其中一间供阿訇居住,三间当了水房(遗憾的是1958年西和漾水河河水决堤,清真寺被大水冲毁了)。

五、恪恭守事,屡屡犯难

1936年11月12日,在西和县东河坝体育场(东校场)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七十周年纪念会上,马廷秀县长讲完话后,邀请西和县演讲所所长赵子贤(殿举)演讲。赵先生讲了纪念意义、总理遗训和“民治、民有、民享”之后,就讲到了西和县第一区区长刘直臣(安徽人,家住天水)的事。他说,刘直臣受马廷秀县长的器重,但为非作歹、掠夺民财、压制民主,完全违背了总理遗训。刘直臣不仅向百姓加款派税,还公开抢占民妻民物,比如谁家有一匹好马,他就牵走,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白雀乡第九保保长姜珍、第十保保长胡秉乾,忍受不了刘直臣的侮辱和压榨,联名向马县长状告刘直臣。但马县长不但不惩处刘直臣,反将姜珍训斥一顿,还要把姜珍关押判刑,最后,姜珍托人说情才得以脱免。“这样作风恶劣,道德败坏,敲诈勒索民财之徒,为何能当区长?作为一县首长之马县长,不理下情,不问曲直,为虎作伥,于心何忍!反把反映民苦的姜珍无理训斥大骂,偏刀子斧头剁呢!这中间官官吏吏有没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应当查一查其财务!”当时参加大会的人掌声雷动,一片喝彩:“讲得有理,骂得痛快!”

散会不久,马县长显得非常沮丧,觉得自己并没有庇护贪官污吏,更不曾“为虎作伥”,赵殿举还是我马廷秀请来做演讲的,可他竟然在群众集会上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向我,照这样下去,我这个县长还怎么当?他坐卧不宁,郁结之气难消,就派他的副官周则天和另一名持手枪的人将赵子贤先生带到县衙来,想要当面澄清此事,但可以想象,赵子贤先生是宁折不屈,不会认输的。到下午,就有

人说，赵子贤先生被关进监狱了，并且戴上了镣铐。两个月以后，赵先生才被释放回家。……

经历了复杂社会政治环境中的长期历练，马廷秀先生洞明了世事，做人做事更加练达，心胸也更加开阔。1957年反右开始后，马廷秀老先生也被打成了“右派”，被遣送到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改，而当时西和县中学教师张梦冀、潘惠明等也被打成“右派”，被押送到夹边沟劳教。他俩都见过曾任西和县长的马廷秀先生，但张梦冀、潘惠明二人最终因饥饿、疾病和郁闷而命丧夹边沟。马廷秀先生却能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度过了劫波。他在后来写的《百年见闻录》中写道：“我在夹边沟农场的时候，每月仅有12元生活费，每天半斤原粮，维持重体力劳动是有困难的。我的老伴张淑静，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了我渡过难关的勇气和决心。那时我的大的子女也下放劳动，二儿孚远在武威黄羊农场，每月工资56元，他除留25元生活费外，其余30元并‘节余’的2斤粮票，准时寄回家中，一家四口就靠这点钱过活。而且每月无论如何也要给我寄1斤炒面。这一点炒面，在当时的份量，不是现在可能想象的，对我太重要了，是救命

炒面。淑静听说河西冬天太冷，便以3元钱的价格买了一张皮子，动手给我做了一顶皮帽、一个背心。皮帽使我免受冻耳之苦，背心抵御刺骨寒风，晚上还能做皮褥用。这些，如今道来，似乎都属烦琐小事，在当时，都是性命交关的天大的事情。没有这些许炒面和衣着冷暖上的关爱，我是不能活着回到兰州的。如今，我活下来了，我的家人，特别是二儿子孚远做出的牺牲，却是无法弥补的。”

[参考资料]

- 1、姜锐《赵子贤先生轶事》，《西和文史资料》（第三辑）2006.6
- 2、王希杰、鱼爱泉《国民党西和县长马廷秀》，《西和文史资料》（第三辑）2006.6
- 3、张廷哲口述、黄睿整理的《处理土匪虎老五苏焕祥的经过》，《西和文史资料》（第二辑）1996年10月
- 4、李谋红《王汉杰逸诗二首》

（作者单位：甘肃省陇南市西和一中）

（接52页）

起，抱至炕上，盖上被子。军人到来，问任廷杰：“炕上盖的什么东西？”任廷杰答：“家里人病了，蒙头发汗着哩。”军人揭开被子查看，驴也。遂解其缚，拉了去。西门外的邢福元，闻军人将至，将毛驴牵至屋内，用绳绊倒，盖上柴草，锁上房门。军人到来，砸坏门锁牵驴而去。百姓可怜如此！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故百姓给石玉修送了一个雅号：“石驴儿客”。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东北军于学忠部东调过境，占据民房，杂役极重。当地衙役为他拉了许多车辆、骡马、牛驴。因数量过多，车马店中容纳不下，就赶至监狱内圈下。军队多日不给水草，饿死大半，军队走后，所剩骡马被县长悉数变卖。民国三十四年冬，中央军十七军高桂滋率部北上，县

政府预备车辆骡马汇集县城，因多日不给草料，骡马互相啃毛充饥，饿死多匹，至为凄惨。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在繁重的徭役和连绵的兵祸之下，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其情其景，正如一位诗人的描述：“鼓角声凄夜未休，昏昏杀气满城头。青山呜咽猿啼急，白骨纵横鬼哭啾。草木苍茫皆可畏，风云变幻总生愁。不逢盛世逢离乱，历尽艰危尚杞忧。”难怪邑人夏羊先生在那样的沉沉暗夜中发出了这样愤怒的呐喊：“要我们戴着镣铐弯腰吗？我们怎肯这样活着！挺起带血的胸膛，倒下去又爬起来，让高举的火把，播下腥红的榴花！”（夏羊：《致战死者》1948年）

（作者单位：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宣传部）

民国时期定西的差徭

张慧

国民党统治时期,赋税之重,甚于历朝。及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地方政府更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贫困无立锥之地。国都南京小工商贩的捐税,计有 1756 种之多。陕西的田赋,比民国初期提高了 25 倍。四川更是别出心裁,竟然预征了 50 年以后的田赋。四川军阀杨森主政成都期间,忽发奇想,不唯向妓女征“花捐”,并且对粪水也发生了兴趣,竟然出台征收“粪捐”的“新政”。因此有人撰联讽刺:“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四川文人刘师亮更是气愤不过,看到一些官僚门口贴着“民国万岁,天下太平”的对联,于是在家门口贴出一副对联:“民国万税,天下太贫”。真是绝妙之讽刺!

地处贫瘠之地的定西亦不例外。民国十五年(1926 年)之前,政府向人们摊征的差徭,计有民夫、杂款、车马、草束等项,均由堡总分摊征用。民国十五年后,当局设立兵站、财务局、粮秣代办处、补给站等,专事各项捐税的征收,层层分摊至区、镇、乡、保。征用的民夫,一般用以兴修城池、道路、桥梁、营房、运送粮草、抬送伤兵等。杂款包括支应委员费、军队粮饷草料费、军队开拔费、驻军床板费、油灯费、锅碗费、蒸笼费、麻鞋费、锨镢费、犒赏费等(以上大多用于供应军队),另外还有壮丁服装费、警察服装费、保安队及自卫队服装费等。

种种杂费虽然经区、镇、乡、保层层冒浮加码,尚有一定数目,还可承受,而“车马”一项就没有“哈数”(定西方言,即“定数”)了。民国时期的定西,兵连祸结,战事不断,大军开到,即向地方索粮要款。往往是当局派出衙役深入乡间强征乱拉,拉足以后勒索贿赂后又放掉,复又强征乱拉。拉足又贿放,复乱拉。如是往复,无有止境。老百姓不堪其苦,为躲避拉差,往往牵拉牲口潜逃远处,致使农

事失时,田地荒芜。

有时军队亲往拉差,危害就更甚了。民国十五年(1926 年),国民军梁冠英、戴靖宇部与陇东军刘滔生、韩有禄部交战于定西,先是国民军向民间征索车马、粮款和柴草,搞得城乡不宁。后来陇东军攻下定西城,复又向民间征索车马、粮款和柴草,民不聊生。是年 5 月,国民军总司令刘郁芬派师长孙良臣率大军会同梁冠英反攻陇东军,陇东军韩有禄等部败走,国民军再次向民间征索车马、粮款和柴草,庐舍为墟。如是轮番征索,盘剥搜刮,导致民国十八年灾荒,民生凋敝,生灵涂炭,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民国十九年正月,国民军八大处向东开进,临走时强拉马车 200 余辆,骡马牛驴 1000 余头,车马及牲畜的主人大多随征。有的行至静宁、平凉、泾川放回,有的行至陕西永寿、乾县放回,有的车坏途中,有的畜死半路,有的主人被殴而遗弃车马逃回,有的牲口死亡而将马车弃于半途,有的因无盘费回家将车辆牲口变卖,还有一些车辆牲畜充公、主人被逼顶兵打仗……兵匪之害,真是令人发指!

据郭杰三先生著《重修定西县志》记载:民国十九年六月,新一军石玉修部从定西城开拔,拉完骡马尚嫌不足,就遍搜各处毛驴充差。百姓情急之下将毛驴藏在山间洞窟中,为防驴叫被军队发觉,用绳索扎住驴嘴和尾巴,使其噤声。定西城东关有一位姓邵的木匠,听到石玉修的部下在城中搜驴,遂将一头驴用白布围起来,照停灵的式样搭成一座“灵堂”,又命其子穿上白色孝衣立于门旁“守灵”。军人骤至,还是发现了其中隐秘,牵驴而去。又有东门外叫任廷杰的一位农民,家中仅养了一头小驴,为防军队牵走,将小驴四肢绑(转 51 页)

杨土司与中央红军的一段往事

银开源

今年到迭部县支教，有幸随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参拜了许多当年留下的一些遗迹，听到了一些当年藏家儿女支持红军的故事。下面是卓尼杨土司与红军的一段逸闻，写下来供大家素食。

1935年9月12日，红军长征经过山高谷深的俄界（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住在阿如家的毛主席提议并主持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这次会议对确定红军北上进入甘肃的战略方针，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斗争，胜利完成长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些大家都知道，无需多赘言。我讲的是杨土司救济红军的事情。

杨土司（杨积庆）是卓尼第19代土司，从小“聪明过人，幼习汉书，汉文汉语，皆甚通畅”。（范长江对杨土司的评价）。1935年8月和1936年9月，红军长征经过其辖区，蒋介石集团三令五申，要杨积庆“坚壁清野”、“筑碉扼守”，并以重金悬赏擒毙毛泽东等人为诱惑，以“失地纵匪论罪”相威胁，要求拒红军于境外，灭红军于境内。但在红军长征经过甘南藏区时，杨积庆假意受命，实则备粮借道并与红军联手抗日。可以说，红军在长征路上遇到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中，就政治眼光、个人素质与思想倾向而言，杨土司这样的优秀人物可谓凤毛麟角。

红军在9月12日突入甘南迭部地区，踏入杨土司的领地，并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确定了红军应坚持向北进军的战略。而进入藏区的红军此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实际上许多红军战士久经鏖战，备受煎熬，衣食无着，已经饥疲欲倒。杨土司对红军态度如何决断，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红军北上行动的成败。

1935年8月底，林彪和聂荣臻率红一军团进入甘肃境内的达拉沟之后，蒋介石似乎就发现了

红军北上的意图，他一会儿坐镇成都，一会儿飞抵西安，倾其西南、西北之兵力，分南、中、北三路，“包剿”朱德、张国焘率领的从草地南下的四方同军；“封堵”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红一、三兵团和中央纵队；“追剿”徐海东、程子华的红二十五军，尤其是当他们发现红一、三军团出川北上之后，火速调集二十万大军，从南北两路同时向甘川边境地区推进，企图将我北上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消灭在达拉沟至腊子口以南的汉藏结合部地区。

早在中共举行俄界会议之前，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就奉蒋介石之命，将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和唐淮源第十二师调到夏河、洮岷地区，对红军实施“严密警戒”“并相机截击。”随后，他又命鲁大昌重兵死守腊子口，同时，他还命令卓尼土司兼国民党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将所属二万地方武装，部署于迭部沟（即达拉沟至腊子口）和洮岷一线，全力配合鲁大昌的十四师，共同“相机截击、歼灭”北上红军。

而此时的军阀鲁大昌却仗自己的势力，骄横霸道，在甘南这片自古就是卓尼土司的封地上，对主人杨积庆发号施令。要杨积庆拆除沿途栈道，实行坚壁清野，分兵各处袭扰并从后路堵截红军。这自然引起了杨积庆的极大不满，而鲁大昌也是洮岷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军阀，早就对土司杨积庆处处摆“主人”谱的样子心怀不满。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因此，两人早就貌合神离。在对待红军的问题上，态度更是不同。当鲁大昌驻防岷县，重兵防守腊子口，准备利用杨积庆遍布甘南各地，特别是迭部沟的藏兵，沿途反复袭扰、疲惫、迟滞红军，进而将缺衣少粮，人困马乏的北上红军，最后一举消灭在腊子口的深山峡谷之中，以绝后患。杨积庆知道红军是“不压迫番民的红汉人”，也听说红军进入达拉沟后，正逢秋雨连绵，当地天气

阴沉,道路泥泞难行,加之,达拉沟沟深谷狭,桥深栈道残损不堪,大队人马很难迅速通过,因此杨积庆对红军处境深表同情。但是,他也迫于国民党政府和朱绍良的压力,为了在夹缝中保存实力,求得生存,他一方面响应命令,调兵遣将,掩人耳目;一面又冒着很大的风险,暗中派心腹人物与红军取得联系,表示愿将手下的二万藏兵分散各处,不与红军为敌,并愿意帮助红军,“尽快走出自己的领地”,随后,他命令下迭部仓官杨景华等人“沿途不要堵击红军;不向红军放冷枪;不抢劫红军队伍;不坚壁清野转移粮食。”还指令尼傲总管尽快把遭雨水破坏的达拉沟栈道、尼傲狭木桥修好,让红军尽快通过甘南藏区。

杨景华等人很快按土司命令,召集迭部各旗总管、头人,按土司命令分散武装,抽调部众,抢修达拉沟、尼傲峡栈道、桥梁。随后,他又命杨景华秘密到崔谷仓与红军接头,在红军过境时开仓放粮,当时正好毛泽东正率领队伍从旺藏经过白龙江仙人桥,翻越卡拉尼巴等两座大山,向腊子口方向开进。

9月16日,红军路经崔谷仓。杨景华即遵照土司的命令为红军开仓放粮,给每个过路红军提供十斤小麦,在崔谷仓囤积30万斤的小麦全部开仓放完,他们又打开另外一仓,放出半仓,让过路红军全部装上了粮食,解决了红军北上粮草不足。同时,宰杀一百头牛,数百只羊来招待红军战士,使红军战士美美地过了一把肉瘾,体能得到了极大的恢复,还给每位红军战士配备了御寒的衣物。

为此,红军总政治部过路人员,怀着感激的心情在粮仓的仓板上写下了:“此仓内粮是杨土司庄稼粮,希望各单位节约用粮”的告示,并在仓内留下苏维埃纸币两捆,作为粮款。

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出川北上,蒋介石闻讯以后,又命令朱绍良以鲁大昌的新编14师和杨积庆的地方藏军,在岷县、洮州(今临潭)和西固(今舟曲)严加防范,同时急调胡宗南部进入陕甘、调川军兵将进入甘南地区,围堵红军。

8月5日,红二、四方面军进入杨积庆所辖迭部沟一带。杨积庆土司再次给红军让路济粮,支援红军通过藏区。他还主动撤除所辖迭部的防卫,秘

密派人给红军带路,让红军沿着红一方面军北上路线向前进发。仅红军从达麻寺到鹦哥花园,一路上就得到了土司几百石粮食的接济。使红四方面军顺利再克腊子口,在临潭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当红军离开藏区后,杨积庆土司又命令所属和中部落收留、安置失散在藏区的红军伤病员200多人。

然而,杨积庆土司所做的一切,被视杨积庆为心腹大患的鲁大昌等人视国“私通红军。”1937年8月25日,鲁大昌串通国民党特务进行密谋策划,利用土司内部矛盾,派其心腹营长率队潜入杨土司住地博峪,策动杨积庆土司手下团长姬从周、方秉义发动叛变,将杨积庆土司一家包围官宅之内。杨积庆土司等人当即进行武装抗击,但是终是寡不敌众,与长子杨琨、长媳、孙女等人,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

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就这样倒在了史称“博峪事变”的枪声中。

1950年2月,杨积庆次子杨复兴与阿拉善蒙古亲王达理扎雅之女达芝芬,在阿拉善成婚。婚后,他们乘坐汽车返回甘肃途中,在西安,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副总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元帅的热情接见。席间,彭总谈起当年红军北上途经甘南时,曾得到过杨积庆土司的大力支持,并对杨积庆土司的牺牲,表示沉痛哀悼。同时还希望杨复兴继承先父遗志,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多做贡献。

同年10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致信杨复兴先生,对当年杨土司让道济粮表示感谢。1994年,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杨积庆为革命烈士,杨成武将军亲笔为杨积庆《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对当时卓尼的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先生的描述:

“……虽身居僻壤,未迈出卓尼一步,但每天都看全国各地大小报纸,及时掌握国内外形势,他在上海、天津等地设有商行,常有书信往来。他的思想激进,易于接受新事物,推广先进技术和文化,时逢国难当头,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他很关心政治时局,忧国忧民感慨激愤……”

(作者单位:高台县南华镇中心小学)

鞠躬尽瘁的老县长贺遐志

高自厚 贺红梅

贺遐志，裕固族，本名遐布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生于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区水关乡西岔河村的一个普通牧民家中。兄弟姐妹9人，他排行第三。本是宗教职业者，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后，历任高台县农会副主席、高台县抗美援朝捐献委员会副主席、高台县各族各界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高台县副县长。1954年以后，历任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筹委会副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副主席和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长。1975年去世，终年70岁。

一、牧民儿郎入佛门

在贺遐志的家乡，一个家庭如有两个以上的男孩子，要有一人入寺当班弟（小和尚）。贺遐志家境困难，8岁时（1913年）即入水关寺当班弟，拜丹德加措为师。开始了他的佛学生涯。实际上他只是靠做苦力生活，长年给师傅放牛放马，手脚常冻烂，吃不饱，穿不暖。民国十一年（1922年），贺遐志17岁，赴马蹄寺深造。他勤学不倦，苦读6年，在藏文、藏经方面学有所成。民国十七年（1928年），贺遐志23岁，回到水关寺，成为顾嘉堪布七世罗桑青利嘉木措的得力助手。他跟随顾嘉堪布参与过文殊寺的筹建和祁连山北麓创办小学等工作，先后担任水关寺的提经、僧官，成为一名宗教职业者。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顾嘉堪布圆寂后，他被推举为水关寺和顾嘉堪布在文殊寺、水关寺两处衙门的管家，长年主持水关寺宗教事务。

水关寺又名“慈云寺”，是裕固族贺朗格部落正头目辖区的牧民供奉香火、举行佛事法会的寺院，又是祁连山北麓久负盛名的高僧顾嘉堪布七世的驻锡地。贺遐志与顾嘉堪布本是同乡邻里，素

有交往。顾嘉堪布身兼文殊寺、水关寺、红湾寺、莲花寺住持，又忙于兴办世俗教育，水关寺的宗教事务多落在贺遐志的身上。顾嘉堪布已经把奋斗目标从深奥的佛教天国转向人世，把佛学哲理的“普度众生”、“觉世济人”运用于唤起民众、兴办教育、发展经济、抗战救国，而贺遐志则具备务实精神，二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顾嘉堪布在文殊寺召开抗战救国宣传大会，以藏、汉、裕固三种语言宣讲“觉世济人”与抗战救国、促进社会发展的关系。贺遐志本对顾嘉堪布十分敬重，聆听他弘扬佛法、救国济民的真知灼见，深为折服，顿觉豁然开朗。感到虽佛法无边，而无处不在；佛理深奥，而近在眼前。自步入佛国以来，他第一次感到无比兴奋，竟彻夜难眠，顾嘉堪布粗犷浑厚的声音总在他耳边回响；“觉世济人”的宏旨，总在他眼前晃动。他忽然觉得这就是佛经讲的“佛性”、“觉性”。他早就学过“觉”有三义：自觉、他觉、觉行圆满。他是“自觉”，还是顾嘉堪布“他觉”？他没有多想，只觉得顾嘉堪布讲的“觉世济人”就是“他觉”。他下定决心，以“觉世济人”为基点，坚持不渝，追求“觉行圆满”的胜果。

此后，贺遐志更加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把“觉世济人”的佛学宗旨贯彻于一切言行之中，大至佛学最高追求，小至待人接物、一言一行，无不带有“觉世济人”的烙印。就连他的姓名，也有“觉世济人”的色彩。他的裕固名本为遐布智，后取大名贺遐志，其中的“贺”是部落名称“贺朗格”的首音节，是姓氏。“遐志”本是“遐布智”的简译，略去“布”字，而且不用原来的“智”，另选“志”，恰好从汉字中体现出“遐志”的美意，当时，“遐志”就是

“觉世济人”，在以后又表达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情操。巧译藏文经典中的佛名，使其表达终生追求的目标，现实与理想融于一体，其妙无穷。

二、从“觉世济人”到为人民服务

1949年秋，广大牧民迎来了新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剿匪肃特，稳定社会治安，发放救济粮款，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亲眼目睹国民党中央军、马家军到处抢劫牧民。新旧对比，更觉得共产党是裕固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切使贺遐志感慨无限，共产党人并不信佛，为什么“觉世济人”比佛家更彻底、更有效？难道人间真有了救世主？对这些问题，他一时还想不清楚，只觉得眼前的一切十分亲切，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决心投身到新型的“觉世济人”的洪流中去。他以宗教上层人士的身份，在各地召开多种形式的僧俗民众会议，宣传动员，为牧区正在开展的各项工作助阵叫好。1950年，当时贺遐志的家乡尚属高台县，县委书记、县长等领导干部多次来贺遐志的家乡开展群众工作，贺遐志大力协助，召集群众会议，顺利建立了以贺朗格部落为基础的乡、村人民政权，这就是今日大河区水关乡的初始。贺遐志也在此时参加了革命工作，由宗教职业者转为革命干部。1952年，他以自己的特殊贡献和影响，被推举参加了甘肃省第一批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北京、内蒙、东北等地参观访问。在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成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裕固族中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第一人。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使他总感觉好像在佛国天堂漫游。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他们时，人民领袖的光辉形象和佛祖菩萨的慈祥音容，同时在他眼前交替闪动。这时他已47岁，年近半百，可是总觉得增添了无穷活力，好像年轻了许多。回到县上，他向各族群众传达参观访问心得。他很明确，自己已是革命干部，不是宗教职业者，应当用革命干部的眼光和语言来传达自己的感受，但是却感到力不从心，一时说不清楚，只剩下简单的几句新中国好、民族政策好、各民族要团结。他决心以苦学佛经的精神，学习革命理论和各项方针政

策。此后，他担任了高台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高台县副县长等职。1953年秋，开始筹建肃南裕固族自治区（县级），贺遐志的家乡、原高台县第六区（今大河区）划入肃南裕固族自治区，贺遐志被推荐为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1954年2月，肃南裕固族自治区召开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建立肃南裕固族自治区，贺遐志被选为自治区副主席、政协副主席。1955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改肃南裕固族自治区为自治县，贺遐志任自治县副县长。工作任务加重了，手头的文件增多了。这些文件是他开展各项工作的依据，也是他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最好课本。由于他从小学藏文、念藏经，藏文程度不错，而汉文程度较差。他就让秘书天天给他读汉文的文件、报纸，自己用藏文做笔记。他自创了用藏文字母拼写汉字语音的办法，不仅提高了做笔记的速度，也加深了记忆。每遇开大会、听报告，他都做笔记。几年的时间，笔记写下了一大摞。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他年已半百时，终于攻克了汉文关，掌握了革命理论，提高了阶级觉悟。他曾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谈到：“我在旧社会是一个穷和尚。那时，今天来马家兵，明天来土匪，经常过着东躲西藏、提心吊胆的日子。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参加革命工作后，我心底是坦然的，思想是开阔的，生活是幸福的。有社会主义大目标，觉得干事情有意义、有活力。体会到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什么是社会主义，感受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知天命之年得到的思想收获，说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为“觉世济人”走过了前半生，在后半生，则要坚定地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全心全意为肃南各族群众服务。他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县委书记乔生义看到贺遐志的入党申请书后，非常高兴。自筹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以来，乔生义一直负责党的工作，是深受各民族人民拥戴的汉族干部。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贺遐志是他看准的领导

干部培养人选之一。乔生义主动与贺遐志恳切交谈,希望他按自己认准的目标前进。贺遐志表示要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1956年7月,年过半百的贺遐志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贺遐志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里程碑。

三、危难之际受重任

1960年2月,贺遐志被任命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长。后在1961年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1963年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1965年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县长。从1953年开始任副县长以来,尤其从1960年开始任县长至“文化大革命”中期,是贺遐志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是继第一任县长安·贯布什嘉之后,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任县长(此前,经上级任命,郎天荣任县长约一年)。

安·贯布什嘉任县长期间,正是我国稳定发展时期,民族地区一派兴旺景象,各项工作比较顺利。贺遐志则出任于危难之际。那时国家正处于灾难时期,在肃南县,由于1959年反封建斗争扩大化和甘、青两省调整边界而造成的裕固族“千里大搬家”,局势混乱、损失严重。提出的“牧业下山,农业上山,牧民粮食自给”的错误口号,又使草原被毁,牧区口粮停止供应,饥饿威胁着群众,问题堆积如山,千头万绪,天时地利似乎都在考验贺遐志。既然入党时已经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就决不后退一步。既然人民群众对他寄有厚望,他就决不辜负人民群众的厚爱。正是他在任县长期间的贡献,为他在群众中赢得了“我们的老县长”的亲切称谓。

1959年—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老县长很少待在机关,他经常深入到生活最困难、问题最严重的明花及皇城等区、乡,解决迫在眉睫的群众生活问题。当时,肃南县各区乡多不通公路,县上也没有小车,都是骑马下乡。老县长在明花区下乡时,把带去的马饲料都救济了在饥饿线下挣扎的老人、儿童,马日益瘦弱,不仅不能骑,竟无力回到县城,只好留在当地。在皇城区下乡时,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把一匹马留在了当地。皇城区是1959年甘、青调整边界时新划入肃南的牧地,牧民是从

黑河源头的八字墩草原搬迁而来的。搬迁时正值隆冬,牧民千里迢迢,赶着牛羊,驮着帐篷,扶老携幼,跋山涉水,异常艰辛,损失也十分惨重。群众饥寒交迫,病疫滋生,危在旦夕,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根据县委决定,老县长带领工作组到皇城救灾。在摸清灾情的基础上,顶着“右倾”、“反对三面红旗”等政治帽子的压力,同区、乡干部一道,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全力以赴救援受灾群众的措施:给牧民供应口粮,先供粮、后结账,先报人数、后核实名单;划小食堂规模,加强食堂管理;允许老弱病残人员自己起灶;适当宰杀一批牲畜,重点抢救因饥饿造成浮肿的群众;解散物质条件尚不具备的托儿所、敬老院。由于措施得力,很快控制了饥荒,稳定了民心。

初战告捷之后,新的问题接踵而来。武威的灾民大量流入皇城,上级又在皇城安置了400多名河南支边青年,加重了皇城区的灾情。老县长迅速率领工作组和区乡基层干部,切实安置灾民和支边青年,动员仍很困难的牧民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支援灾民,同甘共苦。老县长反复向牧民讲:“我们牧民祖祖辈辈都吃的是农民种的粮食,现在农民没粮食吃,饥饿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我们目前还能过得去,就理应帮助他们度过饥荒。”在他的动员下,牧民伸出援助之手,拿出本来就不多的粮食、衣服帮助灾民。老县长鼓励大家:“要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政府会想办法的。”与此同时,他决定在皇城区的铧尖、北滩增加两个收容站,配备专人收留农区来的灾民,并向县委报告,提出向本县其他社队转移灾民的意见。县委很快同意并派汽车分散灾民。由于老县长舍己为人,忘我工作,先后安置灾民八千三百多人,得到省、地两级政府的赞扬。更重要的是,鼓舞了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战胜灾荒的信心。

随着形势的好转,武威地区派工作组来肃南慰问被救的灾民,动员群众返乡,重建家园。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不忘老县长的救命之恩,执意留在肃南。皇城区的马营、泱翔、北滩及全县各地共安置不返乡的农民四千多人。他们后来对肃南的农业发展、调整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发挥了重要

作用。

在老县长领导牧民群众战胜灾荒的同时,干部和城镇居民的生活也十分困难。老县长经常去学校、幼儿园、各单位食堂了解伙食情况,到粮食局和商业局了解粮食和副食品的进货和供应情况,到地区和省上联系粮食和百货的调运。对一些浮肿人员和老人、儿童,除保证定量供应的数额外,还适当批给一些粮食和牛羊肉,对少数特别困难的干部,给予力所能及的照顾,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天祝籍的藏族干部郝永基,1958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肃南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家属子女仍在天祝农村,生活十分困难。一天晚饭后,老县长来到郝永基的单身宿舍谈心,当了解到郝永基的实际困难后,立即特批了一丈多布票,为他解决了家属农转非的户口,并批准他回家,让其家属来肃南定居,老县长的关怀感动了这位异乡人,近四十年来,他把肃南视为第二故乡,为建设肃南勤勤恳恳、鞠躬尽瘁。像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老县长关心疾苦的仁爱之心,换来了广大干部励精图治的报国之志。

四、实际行动胜过豪言壮语

老县长在全力以赴解决群众疾苦的同时,自己始终以身作则、公而忘私,过着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生活。当时,老县长的家属已离开牧区,成为城市居民,子女6人中有5人正在上学,正是“半桩子、饭仓子”,能吃能喝的时候,按标准供应的口粮根本不够吃。一日三餐,只能顿顿喝稀饭,很长时间才能吃到一顿面条,老伴经常挖野菜充饥。但是由于大家都在饥饿中,挖野菜的人多,基本挖不到。子女们放假后,老伴带上子女们挖野菜,希望靠人多手稠,能够多挖一些,让孩子们吃顿饱饭。他们穿的衣服补了又补,大人穿过后再精心改做,让小孩子穿。当时,老县长分管全县的财政、商贸等工作,掌握着粮油肉和棉布等奇缺物资,不知给多少困难户特批补助了粮食、油、肉和棉布,要给自己家中批一点粮油布料,不过是举手之劳。但是他从来没给家中批过1斤粮、1尺布,没有多买过1包烟、1盒火柴。就连给几位县领导特供的喝奶茶的少量牛奶,他也给了有小孩子的职

工。他给家中规定:不许以他的名义向有关单位要标准以外的东西。老县长没有留下惊人的豪言壮语,也没有赴汤蹈火的英烈事迹,但是至今人民群众非常怀念他。他以身作则、与群众同甘苦的高尚品德超过了千万句豪言壮语,足以与赴汤蹈火的英雄相媲美!

1961年,城镇居民口粮供应紧张,国家动员干部家属到农村去,就地解决口粮,以缓解城镇供应的压力,待形势好转后再返回城镇。老县长带头报名,把全家搬到西岔河落户,参加农牧业生产。后来,返乡的大部分居民重新回到城镇,而老县长一家始终在牧区,直至今日。老县长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他常对子女们说:“一切靠自己,不要认为我是国家干部,你们就讲特殊。”老县长说到做到。他的大女儿安兰芳(随母姓),于1956年参加工作,是县畜牧局干部。1962年,老县长动员她回乡参加生产劳动。三子贺明,初中毕业后已参加工作,老县长动员他全家回到生产第一线,直至老县长离世后的20世纪80年代末,被当地群众推举选任乡长,才再次参加工作。贺明之妻安兰英,结婚前就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工作,老县长仍动员她随贺明一起回乡参加牧业生产,至今仍是牧民。幼子贺琦、幼女贺玲一直在家劳动。老县长离世后,贺琦开拖拉机、汽车,后在县运输公司工作。贺玲考到张掖师范,毕业后当小学教师,后调入县党校工作。没有回乡的几个子女都曾在艰苦的基层工作。

当时的城乡差别,使人们不断向城市流动,往职工队伍里挤。由于国家有一定困难,没有力量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不得不花大力气动员城市人口返乡,充实生产第一线。老县长以国家利益为重,舍己为公,把已经进入城市、成为国家职工的子女动员回乡,此情此景,感人肺腑。

公大于私,公重于私。一个“公”字,支配着老县长的一切行动。他公而忘私,有时连亲属的丧事都无暇顾及。1961年秋天,在西北民族学院学习的长子贺勇利用寒假回家探亲。这期间老县长恰好没有下乡,看到儿子老在家中,非常奇怪:儿子非常依恋外奶奶(即姥姥),往日回家,很快就去探

望年迈的外奶奶了,今年为啥不去?老县长叫来儿子问道:“怎么不去看外奶奶?”他这一问,全家人都十分震惊,原来外奶奶已于1959年大搬家后,在马营病逝。当时,老县长忙于处理大搬家后的善后工作,压力很大,来去匆匆,家人不愿增加他的精神负担,怕影响工作,就没有告诉他。至今已三年了,他还不知道老人已去世。当老县长得知实情后,为未能给老岳母尽孝送终而十分内疚。

五、特殊年代的老县长

老县长步入花甲之年,中国大地发生了十年动乱。那时,不分青红皂白把领导干部诬蔑为“走资派”,任意揪斗,老县长也不例外,被诬为“封建主”、“封建魔王”,几乎天天被揪斗,戴高帽子游行。老县长有高血压病,由于经常批斗,无法治疗,一天早上,他突然晕倒,不省人事,被医院诊断为脑中风。在医院治疗三天后,又被拉去批斗、游街。使老县长最痛心的是,他们把他忠心奋斗的事业诬蔑为“资本主义”,把他隔离起来,不能工作,这种精神折磨比皮肉痛苦更加难熬。

老县长在磨难中度过漫漫十年劫难。他青年时期习佛,有过“坐禅”的修炼,可以静坐下来排斥一切杂念,默默地想他的最高追求,减轻许多痛苦。中年时期形成的共产主义信念,更能使他鼓足勇气,以超人的毅力战胜困难。老县长具备的这两种本领,成为他度过十年灾难的“法宝”。他静坐下来默默思考,忘记了痛苦,觉得眼前的一切也是为实现自己的最高理想而难以避免的考验。他向子女们交底:“我的历史自己清楚,我的工作 and 为人,组织上和群众都了解。我相信党是不会亏人的,总有一天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他还说:“解放后我参加了工作,入了党,当上了领导干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老县长隔三差五地被游斗,虽然时闻“打倒”之类的口号,但多次看到群众中投来同情的目光,有人冒着风险给老县长送饭,有人暗中保护老县长及送饭人,这一切,使老县长深为感动。作为“公仆”,能得到“主人”的同情、支持,已是莫大的荣幸了。天有阴雨时,阴雨过后就是晴天,阳光会更加明媚。人有挫折时,度过挫折,就是胜利,是更加美

好的未来。在最艰苦的时候,他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

十年动乱后,老县长年过花甲,双目失明,又有高血压病缠身,但他毅然挺了过来。

1973年,老县长得以平反昭雪,补发了全部被扣的工资。平白无故地受了那么多冤屈,落得个双目失明,差一点送了命,连子女们都想不通,可是,老县长很坦然,说“这一切是可以理解的”。他不计较个人恩怨,做的第一件事是补交了6年的党费。第二件事是拿出1000元,寄给肃南县最贫困的马蹄区大泉沟乡政府,为特困户解决燃眉之急。第三件事是谅解曾揪斗过他的年轻人,说“他们也是受害者,没有那种错误思潮,他们不会斗我、整我”。老县长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表现了一个成熟的革命领导干部的高风亮节。

六、风范长存肃南大地

1975年,老县长走完了他不断追求真理的人生道路,告别了他衷心热爱的故乡,告别他终身为之服务的各族人民,与世长辞了。人们悲痛欲绝,自发地以各种方式悼念老县长,表达对老县长的哀思。

在三年困难时期得到老县长救济、安置的灾民,称他是“救命恩人”。受过老县长关怀、照顾、帮助的职工群众,称他是“模范的领导干部”,愿老县长的作风长存于肃南草原。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称他是“德高望重、爱民如子”的先辈,愿以老县长为榜样,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全县各族人民永远怀念他公而忘私的“公仆”精神。

时至今日,肃南县干部群众谈起老县长,都记得他的两大特点:一是平易近人,慈善和蔼,关心群众疾苦,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二是不图虚名,没有豪言壮语,有的只是务实精神。是的,老县长言行一致,用实际行动带领群众,用模范行动感召群众。这是老县长特有的工作方式,是一个革命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优良作风。

(作者:高自厚系西北民院副教授,已故。贺红梅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市县志指导处处长)

清代陇上二澍——张澍邢澍简介

清代中叶，甘肃武威和武都各有一位名叫“澍”的才子，他们就是人们称之为陇上“二澍”的张澍和邢澍。

方志学家、西夏学的开创者——张澍

张澍(1776—1847)字百谿，又字寿谷、时霖，号介侯，又号鸿名、介白。甘肃武威人。清代著名学者。父应举，为秀才。母张氏，为元朝附马高昌王后裔。童年丧母。自幼聪明过人，勤奋好学。10岁入乡里私塾。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六年散馆，派任贵州玉屏知县，后以广顺州知州，代理遵义知县。

嘉庆九年(1804)正月，卸任后因生活困难，接受汉南书院讲席之聘。嘉庆十年(1805)由武威到北京，两年内历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江西等地。后在安徽治水有功，补任四川省屏山县知县，接着代理兴文、大足、铜梁、南溪知县。道光五年(1825)任江西永新知县。翌年代理临江通判时，因前任欠公款事被牵连革职。道光八年再补授泸溪知县。道光十年引疾辞职，从此结束仕宦生涯。此后，游历了江西、安徽、江苏、湖北等地，会见当时的名流宋翔凤、郑廷桢、陶澍、钱泳、俞正燮等。57岁时回到西安和乐巷整理刊印自己的著作。不久，患眼疾，双目失明。道光二十七年(1847)五月初八日，卒于西安寓所。

张澍一生，断断续续担任过一些地方官，全部时间加起来不到14年，一直在偏远地方担任县令，而且经常是代理县令。他出任贵州玉屏县令后，又代理了贵州遵义县知县、于顺州知州，这个

知州的官职是他一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后来又曾担任过四川屏山县知县，先后担任或代理兴文、大足、铜果、南溪等地知县。道光五年(1825年)后，又担任了江西永亲县知县、泸溪县知县，也曾代理过临江府通判。

尽管志向是成为一个良吏，但他内心深处仍然难割舍对学术的研究。为官期间，他编著多部县志，使得方志学成为他学术中最为出色的成就之一。他到贵州玉屏县担任知县不久，就收集了不少资料，写了一部书名叫《黔中纪闻》，后来知道别人曾写过《黔书》，就把《黔中纪闻》改名为《续黔书》。这是张澍学术生涯中方志方面的开山之作，后来他还写了《蜀典》、《大足县志》、《泸溪县志》、《凉州府志备考》等方志。

张澍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与他严谨的学习作风密切相关。他一生中不仅在贵州、四川、江西担任过知县，而且在辞官后游历了大江南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中国文人长期恪守这一古训，然而由于经济、交通等条件的制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行万里路。千里为官给了他一个行万里路的大好机会。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要了解风俗、民情，查阅有关方志资料，然后有重点地选择一些地方游览。山川、古迹、风土人情、石刻、古董都走进了他的视野，再加上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因而，他写下了大量的游记，这些游记成为他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原始素材。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大量的考据性文章，如他写的《九丘考》、《若水考》、《三江考》、《片羊柯江考》、《栈道考》等文章，成为后人研究各地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丰富的阅历，深厚的学术功底，再加上每到一地收集资料的良好习惯，注定他要在学术上让人们刮目相看。张澍一生

写了大量的著作，除了在方志学方面以外，在金石、姓氏学方面、编辑整理古籍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

在金石方面，他是西夏碑即《重修护国寺感应寺塔碑》的发现者之一，也被人们称之为西夏学的开创者。他收集了各地碑记刻，编写整理了《金石续编》、《西陲石刻录》、《语石》等著作。他在四川大足县担任知县的时候，发现了《唐昌州刺史韦君靖碑》，他立即进行了考释，不仅纠正了地方志书的一些错误，而且也解开了唐昌州的方位、区划、建制等方面的情况。在姓氏学方面，张澍写了《姓氏五书》、《姓韵》、《辽金元三史姓氏录》、《姓氏寻源》、《姓氏考辩》及《西夏姓氏录》，《清史·文苑列传》中对《姓氏五书》评价非常高，认为《姓氏五书》是一门绝学。《姓韵》是一部有关姓氏的词典，收录了从远古黄帝到当时的所有姓氏，不分贵贱，不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全部予以收录，共收集达 5129 个。同时，张澍还大量收集整理了关于地方史志的资料，在道光元年编著成《二酉堂丛书》，其中有《凉州记》、《凉州异物志》、《三秦记》等，是一部珍贵的地方史料总集。

张澍一生著述甚丰，清张之洞称其“才气无双，一时惊为异人”。生前已刊行的著作有《姓氏寻源》45 卷、《姓氏辨误》30 卷、《西夏姓氏录》5 卷、《续黔书》8 卷、《蜀典》12 卷、《大足县志》8 卷、《养素堂文集》35 卷、《养素堂诗集》26 卷、《二酉堂丛书》21 种 27 卷、《诸葛忠武侯文集》4 卷、《附录》2 卷、《诸葛故事》5 卷。未刊著作多种，其中大部分遗稿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被法国人伯希和以低价收买，带到法国，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少部分于 1963 年由陕西省博物馆收藏。

清代著名历史学家——邢澍

邢澍（1759—1823）字雨民，号全山。阶州（今武都）人。清代著名学者，与武威张澍齐名，时称

“二澍”。

邢澍天资聪颖，年少成孤，21 岁时考中举人，32 岁时考中进士。邢澍家境也非常贫寒，连到西安考试的路费都无法筹集，最后在一位商人的资助下才得以成行。邢澍和张澍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物，只不过邢澍比张澍要大 17 岁。他考中进士不久，就被派往浙江省永康县担任知县。

嘉庆元年，他被调到浙江省长兴县任知县达 10 年之久。在长兴县邢澍干了许多得益于百姓的好事，而且捐出自己的俸禄兴建了同善堂，重建了平政桥、丰乐桥等工程。邢澍为官清正，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拥戴，被人们称之为邢青天。后来被调到江西省饶州府任知府，不久又调到江西南安府任知府，后来因疾辞职到秀水（浙江嘉兴）休养。他 62 岁从浙江秀水回到了老家阶州（今甘肃武都），以著书自娱。

邢澍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关右经籍考》、《金石文学辨异》、《金石礼记》等著作都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他在江南期间和钱大昕、钱大昭、阮元、孙星衍、洪亮吉、章学诚、张澍等人都是好朋友，尤其是钱大昕、洪亮吉等是清代中叶学术界的中坚人物。在学术中他对舆地之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说，“非多阅古今书不能也，间书多矣，非履其地，参互考验，”他的意思是书本上的知识和实际中的知识相互对照，即书本要和石刻上的内容相对照，他的这一观点，后来被王国维发展为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相互印证，成为金石学转变为考古学的一个必然途径。

邢澍不仅学问好，而且诗也写得非常好，著名学者钱大昕曾给他写过一首诗，其中说：“才兼八斗方成富，业可千秋不自尊，”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823 年在家中病逝。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市县志指导处副处长）

王基永湖南失踪之谜

魏泽民

王基永(1903-1930),号季培,1903年12月29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今湘乡市)莲花桥。父亲王蔚屏,是教蒙馆的塾师。他从小由父亲课读,并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1920年考入湘乡驻省中学。1921年转入长沙妙高峰中学。这期间,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组织“新人学会”,创办刊物《新声》,提出“社会幸福人造就,解放人群我担当”的主张。

王基永是20世纪20年代湖南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共早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1922年,协助湖南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主持干事部事务。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基永在湖南神秘失踪,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寻找党组织无望,军阀追捕又急的情况下,为了隐蔽身份,躲避国民党反动军阀的追杀,在朋友的帮助下,改名为王鸣真,流落甘肃天水、礼县一带。

作为中共湖南地区的重要领导人,国民党反动军阀通缉的重要人物,王基永突然之间在湖南神秘失踪了,这在当时的社会上引发了多种猜测,出现了多种传闻:《武汉日报》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原青年部长王基永和他的爱人龙亦飞在“马日事变”清党屠杀中惨遭许克祥部杀害;国民党左派骨干、后来中共领导人王稼祥的岳父朱剑帆则说:王基永很可能已遇害;而曾与王基永一同在湘西常德地区领导农民运动的胡允恭,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在上海听说王基永并未死于“马日事变”,而是在这场大屠杀发生后突然从长沙失踪了,后来逃往甘肃礼县山乡,隐姓埋名,不久在一位老乡帮助下,进入县政府任文书云云。王基永在此后的存殁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实际上,“四一二”政变和“马日事变”后,东南各省都陷入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中,大批共产党人惨遭反动军阀的杀害,少数幸存者被迫转入地下。而占据西北各省的冯玉祥,虽然也声明反共,但因为与蒋介石政见不同,局势相对较为缓和。为了摆脱敌人的悬赏追捕,王基永就选择了远走西北。到天水后,先在水天暂住,后经朋友介绍和推荐,在礼县法院、礼县县政府任职,再到后来就在礼县县长马绍棠身边作了政府录事兼民政科长。直至1930年闰6月,马廷贤大军礼县屠城时,王基永因协助马绍棠组织军民抗击军阀马廷贤军,最后战败被俘,押赴天水被杀,客死他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从1928年至1930年6月,王基永在礼县工作了3年多,先后辅佐礼县法院院长和礼县县长马绍棠理政,多有善政,颇得人心。解放后,湖南省民政厅、国家民政部追认王基永同志为革命烈士。1950年5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给王基永的遗孀龙亦飞女士的信中痛心地说:“王基永同志殉难,极为痛惜”。1965年,谢觉哉在和龙亦飞女士的诗中也写道:“四十年前夏与王,心有千秋笔有光,革命待成身早死,遗孀含泪问穹苍。”

一、从小就有远大抱负

王基永在少年时代,就读于废除科举后兴办的一所新式学校——湘乡东山小学,此校校风比较开明,有进步人士在校任教,学习用功的王基永在东山小学受到了一些进步思潮的熏陶,看清了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政客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痛苦的严酷现实,逐渐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进而萌发了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1921年,王基永转入长沙妙高峰中学读书,期间较多地接受了俄国十

月革命的影响,喜欢阅读《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等进步书刊,开始信仰并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革命,提出了“社会幸福人造就,解放人群我担当”的响亮口号,对改造旧世界有了一种自觉的担当意识,这在当时的中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赢得了广大学生的拥戴,并于1922年起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负责人。

1923年,王基永领导湖南学联和湖南省工会等进步团体举行了“收回旅顺、大连,反对‘二十一条’”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强烈不满。驻守湘江的日本水兵公然开枪,杀害了2名游行人员,制造了“六·一惨案”。身为游行抗议活动的组织者,王基永义愤填膺,立即组织学生开展声势更大的抗日宣传攻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组织民众抵制日货,号召民众“莫当亡国奴、莫买日货”,参与并组织了湖南工农商学各界为“六·一惨案”死难者举行的追悼大会,因此,王基永被湖南军阀赵恒惕看成了危险分子,列入了通缉名单。

1923年夏天,王基永和龚际飞在湖南学联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学联代表,代表湖南学联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联代表大会暨反日爱国动员大会,王基永还在此次全国学联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学联总会执行委员,并经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王基永就留在全国学联上海总部工作,主办全国学联的机关刊物。

王基永在全国学联总部努力工作的同时,刻苦求学,并通过蔡和森等中共领导人的关系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主编蔡和森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聘请为教授,王基永在蔡和森等共产党人的关心和帮助下,全面而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经蔡和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1日,又以上海大学党员代表资格出席了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1923年,王基永按照党的指示,作为全国学联的代表,由上海前往广州,晋谒孙中山,陈述政见。归途中,正值他20岁生日,望着自己乘坐“绥阳”号船在大海中乘风破浪地前进,他不禁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回想自己亦如一

只在大海中航行的小船几番追求,几番探索,马克思主义犹如引路的灯塔,使他的人生航船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他不禁情涌笔端,洋洋洒洒写下了《二十周年纪念自述》一文,叙述自己求学和参加革命的经过,并表达了今后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从事社会革命”的坚强决心。

二、青年时期投身革命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日益感受到革命的威胁,于是加紧反共分裂活动。6月18日,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不仅上书孙中山,指控中国共产党,而且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诬控共产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希即从速严重处分”。“弹劾共产党案”提出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跟着效仿,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

1924年8月1日,在叶楚伦的策划下,一些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这一议题一提出,马上就遭到左派的激烈反对,结果双方造成武斗。第二日,右派分子不服气,又闯入上海执行部,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带头,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沈泽民、韩觉民、王基永、杨之华、李成、刘伯伦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伦“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此后,毛泽东与叶楚伦的斗争公开化。由于叶楚伦是组织部长,毛泽东只是组织部秘书,因此,对于叶楚伦的排挤、打击和独断专行,难以有力地遏制,结果,叶楚伦把许多共产党员逼出了上海执行部,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在无形之中陷入停顿。为此,毛泽东等14人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名义于1924年8月11日致信孙中山,报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瘫痪的情况,标题是《呈报东日三四两区部开会情形》。电文如下:

(广州)孙总理钧鉴:

东日三四两区部曾贯五等,集少数党员秘密开会,强迫签字于致总理电文,黎磊被殴伤。更日,

谈两区部喻育之等二十余人拥入执行部，强迫楚伦盖印于致总理电文，邵力子被殴伤。党纪扫地，若无制裁，何以励众。再，楚伦主持不力，迹近纵容，并乞明察。

沪执行部 毛泽生 恽代英 施存统 邓中夏
沈泽民 韩觉民 王基永 杨之华 李成 刘伯伦

叩蒸

电报的署名，毛泽东误写为毛泽生。这份重要的历史文献，真实记录了国民党右派反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形以及毛泽东等人的应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中都没有记载，实有补充之必要。

“东日”即8月1日，国民党上海第三、四两区党部（非全体的）召集各区代表会议。国民党右派曾贯五、喻育之大致对工作作了报告之后，“即向各同志分发彼等早已拟就致总理之电文，并立刻提出向各代表签字”。这份电文要求“开除跨党分子”，旨在破坏国共两党的合作。第五区党部的共产党员姚绍虞，会前接到三四两区部会议通知。他认为国共合作的目的都在于革命，何分彼此，何况国民党还要联合民众，增加革命战斗力，以达国民革命之速成。因此，只要遵守国民党宣言、总章，就不应该排挤共产党员以分散国民党的战斗力。姚绍虞再三考虑，若不出席这次会议，诚恐右派分子“捏造意见，欺骗总理及中央”，遂决定代表第五区党部出席会议。共产党员顾修代表第二区党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当曾贯五、喻育之等右派分子强行要求各与会者签字时，姚绍虞、顾修等认为，该电文内容“实为违反本党纪律，不信任中央委员会之措词”，遭到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不肯签字，请求退席”。不料，曾贯五、喻育之、何世楨、凌昌策等一拥而上，声色俱厉，拳脚交加，并扬言“不签字者即共产党，非打死不可”。于是双方发生冲突，右派分子一面将门户把守不许退席，一面大打出手，并打伤了第五区党部常务委员、国民党左派黎磊。姚绍虞、顾修等欲退不行、欲进不能，“只可暂时屈服，以党员资格签字，以脱危险”。毛泽东等决定给孙中山先生如实报告上海发生的事情真相。

第二天，在驻上海执行部国民党中执委叶楚伦的纵容下，喻育之等率三四两区部二十余人，拥入上海执行部，强迫叶楚伦盖印，并打伤了时为共产党人的邵力子，反共气焰十分嚣张。

姚绍虞、顾修等脱险后，于3日通过《致总理暨中央执行委员会》快信，报告了上述三四两区部会议经过情状，“除由第二五区党部名义电达外”，“再将泣告总理暨中央诸同志秉公处置，并声明此次签字作废，此等非法举动实系破坏本党纪律，请求依法惩戒，开除党籍”（以上引文均见顾修、姚绍虞、徐梅坤、倪志侠、孙良惠《致总理暨中央执行委员会》，8月3日，中国国民党环龙路档案9086.2）。这封快信信封上写着：广州惠州会馆汪精卫先生台启，落款为上海贵州路六号姚緘。还有批文：“此呈党内共产派问题应办”。

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内右派分子日益感受到革命的威胁，于是加紧反共分裂活动。6月18日，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不仅上书孙中山，指控中国共产党，而且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诬控共产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希即从速严重处分。”“弹劾共产党案”一经，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国民党右派就跟着效仿，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

电文局部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08月20日14版）

面对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浪潮，大元帅孙中山先生于8月13日对毛泽东等联名致信作出批复：“汇交大会”。

8月15日至9月10日，国民党第一届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弹劾案”问题。国民党右派指责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仍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国民党内发挥秘密党团的作用，“名义上跨党，徒滋纷扰”，国民党内的种种纠纷即由此而来。为免除这种纷扰，只好“以分立

为要”。公开揭起了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旗号。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反击下,国民党右派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被大会予以否决,上海执行部及其各区党部右派分子的反共活动也受到了遏制。

在此背景下,1924年底,王基永受中共中央派遣到湖南工作,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负责党的财务工作。同年,王基永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以国民党员身份参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筹建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及国民党的请求,中共湖南省委又派王基永等人帮助筹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王基永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按照党的指示,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1925年5月,国民党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秘密召开,王基永被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这时,他与湘乡县第三女子职业学校学生龙亦飞喜结良缘。

1925年5月底,当上海、青岛等地相继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湖南后,王基永以湖南工联、学联的名义召集工人和学生计2万余人,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号召在长沙全市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在全省掀起了反帝高潮,反动军阀赵恒惕统治下的长沙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1926年春,王基永前往衡阳从事争取唐生智部拥护广州国民政府、拥护北伐的联络工作。曾多次往来于广州、韶关、衡阳、长沙之间,为迎接北伐军入湘从事各种活动。还曾兼任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委员,在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英、日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暴行,联合全省457个团体共同发表了《对于时局之通电》,号召人民一致起来打倒军阀,驱逐军阀赵恒惕。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中共湖南省委一面在政治上加紧发动民众,参与反赵斗争;一面在军事上联络反赵恒惕的军方实力派人物联合反赵,并利用在衡阳拥兵自重的唐生智与赵恒惕的矛盾,孤立赵恒惕。王基永等奉党组织的派遣,先后数次赴衡阳与唐生智会谈,终于说服了唐生智。唐生智表示拥护广州国民政府,愿意参加北伐,讨伐赵恒惕和吴佩孚。就这样,王基永等在政治和军事两条战线对赵恒惕展开攻

势,使湖南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王基永还曾多次与湖南工农商学各界进步团体的领导人一道组织了反英反日,讨伐吴佩孚和赵恒惕的示威游行,并且在毛泽东主办的《政治周报》上发表了一些抨击时弊,宣传革命的文章。

北伐军进入湖南后,中共湖南省委为了加强对各地工农运动的领导,派王基永担任湘西特委书记兼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湘西特派员、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等职。王基永到湘西以后,整顿了中共创办的湘西民校,培训了湘西民校的革命骨干。在湘西各县发展和建立了中共基层组织,组建了国民党县党部,成立了农、工、商、学等民间协会,随后又建立了农民赤卫队和工人纠察队,收编杂牌队伍,开展肃清土匪、发展生产、普及教育、打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工作,湘西革命斗争如火如荼,篷篷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1927年1月的某一天,驻常德第八教导师长周斓忽然接到一份来自省城的重要信件。周斓审慎地拆开封皮,赫然跃入眼帘的竟是省主席唐生智发来除掉袁祖铭的密令。原来袁祖铭那时任北伐军左翼军总指挥,并于1926年底进驻常德。名为北伐将军,不去讨伐北洋军阀,反而与吴佩孚眉来眼去,又和孙传芳暗送秋波。周斓身感事关重大,当即找来王基永秘商除袁大计。王基永认为对付这样一个阴险狡诈、穷凶极恶的军阀只能智取,万万不可蛮干,提出了设宴诱杀之计。为了配合北伐,王基永协同唐生智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设下“鸿门宴”。

1927年1月30日,地处东门外贺八巷的商业研究社现出一派喜庆迹象,街道上人来人往,一切依旧是往常的模样,不久,袁祖铭一行大摇大摆地应邀前来赴宴,早已等候一边作东的周斓含笑上前,热情地将袁祖铭等迎上楼来。一阵寒暄过后,周斓趁敌不备,看到时机已到,便一声令下,左右拥上来当场将袁祖铭及其参谋长朱崧等一举击毙。与此同时,在工农群众的协助下,将袁部分割包围,俘缴其全部官兵和枪械。

三、遭遇“马日事变”

1927年3月,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北伐军前敌总指挥政治部推荐王基永担任唐生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4月,王基永离开湘西,前往长沙,准备向省委汇报工作后去河南省驻马店三十五军军部报到就职,组建三十五军政治部。但到了5月,湖南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局。在唐生智、何键等国民党将领幕后教唆及支持下,反动军阀许克祥团长率部从驻地常德开赴长沙,与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留在长沙的二营相勾结,展开疯狂地反共大屠杀。几天之内,杀害工农赤卫队队员、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近万人。在腥风血雨中,革命力量横遭野蛮摧残,长沙陷入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中,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马日事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发动政变,史称“四·一二政变”。4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并以“国民政府秘字第一号令”的形式发布了“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命令诬称:“共产党窃据武汉,破坏国民革命之进行。数月以来,肆行残暴,叛党叛国,罪祸贯盈,最近实施卖国之外交,牺牲国权,以取悦于帝国主义者;又复爪牙四布,荼毒民众,使湘鄂两省演成大恐怖,我先民固有之美德,数千年所恃以立国者,亦皆败毁无余。综其所为,祸有甚于洪水猛兽;瞻念前途,不寒而栗。政府奉行先总理之遗教,誓竭尽全力,期三民主义之实现。唯欲建设独立平等之国家,必先扑灭一切反革命之势力。共产党图谋倾覆本党,逆迹昭著,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并致训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于最短期间,拯清叛乱。查此次谋逆,实以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以及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省国民革命总司令、各军长官、各省政府通令所属一体严缉,务获归案重办。至该党忠实同志,遵守三民主义始终不贰之信徒,在革命地域大都与贼相持,奋斗不懈,应着悉心保护;其余压迫而心迹可谅者,政府必分别办理,决不绝其自新之路。此令。”这份“国民政府秘字第一号令”还附有被通缉的人员名单,包括支持共产党的国际友人、国民党左派、中共党员及中共重要领导

人,王基永就在被通缉的共产党要人名单之中。

四、王基永失踪之谜

“四·一二政变”和“马日事变”后,东南各省陷入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少数幸存者被迫转入地下。

在反动军阀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紧急关头,中共湖南临时省委迅速组织工农群众进行反击,王基永于“马日事变”发生的当晚就秘密离开长沙,转移到湘潭,于5月23日出席了柳直荀主持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工农义勇军总司令部,王基永任政治部主任,与柳直荀负责率领工农革命军围攻长沙。但由于反动军阀势力太过强大,围攻长沙的战斗受挫,损失惨重,王基永不得不撤出战斗,秘密潜回湘乡,隐藏在永丰的一位亲友家中。此时,反动军阀又悬巨赏,花高价追捕王基永等中共湖南临时省委领导人。王基永无处藏身,只得扮作术士,浪迹江湖,继续寻找党的组织。

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王基永不听父亲的劝阻,不顾个人安危,又赶往衡阳寻找去寻找他的同乡、战友龚际飞。打算通过龚际飞找到党的组织,但因反动军阀的血腥屠杀,龚际飞已经遇难,中共党组织逼迫转入地下,王基永与中共党组织的联系就此中断,寻找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愿望,也因没有找到党组织而落空。王基永陷于迷茫之中。

此时,王基永听说占据西北各省的冯玉祥,此前虽然曾经声明反共,但因蒋冯之间政见不同,西北各省局势相对较为缓和。为了摆脱敌人的悬赏追捕,王基永选择了远走西北,待机再举。

1928年春夏之际,王基永改名更姓为“王鸣真”后,在其好友、中学同学郭庆初的掩护下先到西安。然后,郭庆初给其在甘肃天水法院工作的岳父写了一封信,让王鸣真拿上那封信,到甘肃天水寻找他的岳父——时任天水法院推事的赵文钦先生。王鸣真在天水找到赵文钦先生后,赵文钦先生接纳了他,并且让他暂住在自己家里,安顿下来后再给他找工作。

1928年春,赵文钦先生又将王鸣真推荐给时

任礼县县长的马绍棠，马绍棠县长将王鸣真临时安排在县政府里工作，担任政府司法录事。

王鸣真为人忠诚厚道，稳重历练，擅长诗文，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宣传鼓动能力，深得马绍棠县长的喜爱。特别是谈及孙中山，抨击劣政时弊时，两人对时局的看法和政见不谋而合，也因此深得马绍棠县长的喜爱和信任。1928年秋，马绍棠县长正式任命王鸣真为县政府录事兼任民政科科长。

王鸣真来到礼县的第二年，也即1929年春天，甘肃中部大旱。陇西、通渭难民纷纷涌进陇南，每日来礼县的难民不下千人。王鸣真心系灾民，急难民之所急，及时与马绍棠制定了救济方案，共筹赈济款5000多个银元，购进了一批大米和玉米，在县城设放饭点两处，每日放饭赈灾。同时以县政府的名义责成全县绅士放饭，号召和鼓励民间自愿救济难民，全县民间放饭共计用掉粮食数千石。自春至夏，救济救难民甚众，就其放粮数量之多，乃民国时期礼县之最。

从1928年夏季至1930年6月，王鸣真在礼县政府任职期间，与县长马绍棠相处很好，后来成为马绍棠县长的高参。在礼县政府任职的王鸣真，看到礼县百姓深受当地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又屡遭土匪的抢劫和骚扰，生活非常痛苦。他认为只有兴办教育，启迪民众的觉悟，才有可能改变现状。于是，王鸣真屡次向马绍棠县长进谏，力主兴学办教育，得到了马绍棠的赞同。为此，马绍棠县长充实和加强了礼县教育局的工作，并由县教育局具体负责，办了一期为期半年的师范讲习所，招收了30名学员。这些学员毕业后，被安置到全县重点乡镇分设的小学堂里任教，以推进全县的教育事业。同时在全县向地方士绅筹款集资600多个银元，派人到兰州购得课本和新文化图书等几百册。为了进一步加大办学力度，王鸣真还向省府呈报计划、表册，要求省府将礼县教育纳入计划拨款范畴。这些努力，后因战乱虽未实现，但王鸣真办教育的热忱有目共睹。

王鸣真与马绍棠为了纪念孙中山，在县城东填平一块沼泽地，栽上了白杨树，取名中山林，将

附近的马路也取名中山路。

五、土匪来犯时誓死保卫礼县县城

王鸣真到礼县时，正是兵荒马乱的年月。1929年1月（1928年农历11月下旬），陇南土匪王佑邦部王常胜率1000余人攻打礼县。王鸣真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力主保卫县城，马绍棠更加信任和器重他。从此，除公开职务外，王鸣真事实上已经成为马绍棠的高参。在土匪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马绍棠采纳了王鸣真的建议，一方面写了一封信，派人向驻防陇西、甘谷一带的吉鸿昌师长求援。另一方面率全城百姓，凭借城墙的厚实高大，用大刀长矛，土枪土炮打退了王常胜匪军的多次进攻。三日之后，吉鸿昌派张仙洲营长援救礼县，城内城外配合，对王佑邦部下王常胜匪军展开内外夹击，王常胜惨败而逃。

王常胜围攻礼县城之际，正是民国十八年遭逢特大天灾之时，再加上土匪王常胜匪帮抢掠，礼县城关居民一贫如洗。史载“礼县大饥，饿殍载道，外来流民每日不下千人”，县城饥民如堵，祈求之声不绝于耳。民政局局长王鸣真、建设局局长张槐三等官员见状不忍，心急如焚，向县长马绍棠苦谏：“百姓沦入患海，我等见死不救，岂称父母官啊！”马绍棠虽然年轻，也有胆略，但遇到如此大事则有些踌躇不决，于是问王、张两位局长有何良方以救灾民，张槐三说：“只要县长出头，张某愿竭力相助。火速通知四乡绅士，共商赈灾大计！”马县长当即委托张槐三和王鸣真拟出救灾方案，通过全县绅商会议，付诸实施。在赈灾过程中，王鸣真和张槐三身先士绅，救命如救火，他俩上下联络，求得省赈济会拨款3500块大洋，倡导绅商富户捐款825块大洋，富商私设放饭场7处，县政府公设放饭场1处，赈粮数石，购进包谷数石，救活了本地及外地饥民无数。

礼县城解围后的第三天，吉鸿昌大军奉命挥师陇南，扫除王佑邦势力，路经礼县。因感戴吉鸿昌军解礼县之围，王鸣真自始至终陪同马绍棠县长参与了迎送吉鸿昌的各项活动，并负责吉鸿昌部队的联络和后勤供应等具体工作。按马绍棠的安排，王鸣真筹备了接风宴会和欢迎吉鸿昌大军

来礼县剿匪的大会，为马绍棠起草了祝酒词和欢迎吉鸿昌大军大会上的讲话稿，并指挥礼县士民向吉大军送猪肉、白面，犒赏官兵。吉鸿昌大军在礼县期间，王鸣真与赵科长为之筹备了大批粮草，基本上保证了吉鸿昌大军的粮草供给。吉鸿昌为了感激礼县政府对剿匪大军的支持，给礼县政府赠送支枪 20 多支，子弹 1 万多发。给守城有功的民团 80 多人各奖励银元 1 到 2 元，还给当地绅士张槐三、林望南、李寅三、马子清、王希恕等题词鼓励，给张槐三题写了“功高梓里”匾牌一方。

在礼县城里，多次接触吉鸿昌的王鸣真，与吉鸿昌彼此都有知遇之感，相互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王鸣真对吉军英勇善战，军纪严明，不侵扰百姓，解民于倒悬的功迹十分钦佩。吉鸿昌对王鸣真辅助马绍棠保卫礼县县城的才智和欢迎吉军的出色工作非常赞赏。吉鸿昌大军离开礼县时，两人紧紧握手，依依惜别。

鉴于土匪滋扰的教训，马绍棠、王鸣真决定利用吉鸿昌所馈赠的枪支弹药，发展地方武装，以增强保境安民的实力。王鸣真还建议马绍棠，及时撤换了警佐，清除了民团中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改组了警察局和民团，充实进去了一些贫苦朴实的农民。

王鸣真在礼县主持城防工作期间，还置生死于度外，亲赴西和大桥、石峡、武都草川崖等地，与占山为王的山寨武装头领马尚智、邵青莲等举行谈判，先后收抚了三支较大的地方割据武装。其中邵青莲一支，多系因抗粮抗捐逼得上山的朴实农民，其中不乏武功超群者。王鸣真将他们改编为县区民团的一个营，后成为县区民团的骨干力量，在反击马廷贤礼县屠城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0 年春，蒋、冯、阎之间爆发了中原大战，冯玉祥所部吉鸿昌师等部队东调，陇南空虚，甘肃军阀马廷贤收拾残部，乘机占据天水及陇南所属十四县，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陷入痛苦深渊。马廷贤还按照自己的需要更换了陇南十四县的县长。当他得知礼县县长马绍棠有吉鸿昌留下的枪

支弹药，自己又购置了一批枪支弹药来发展武装，有几百条枪支和大批弹药，遂馋涎欲滴，打算派安澜去担任礼县县长，调马绍棠去秦安任县长，而马绍棠知道这是马廷贤的调虎离山之计，拒绝到秦安任职。马廷贤大怒，遂于农历 6 月 17 日派韩进录、王占林率三千多人攻打礼县。马绍棠、王鸣真为了全城八千余民众的安危，率警察、城防队员、民团，奋起抵抗，保卫县城二十余日，打退了马廷贤军的无数次进攻，取得了一些显著战果。但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加之叛徒、内奸的出卖，最后匪军花了 800 个银元、一匹马的代价请来龙林乡阴山村的煤矿技工王积善，承包了挖地道和装填火药的工程，在北城沿黄家油店后院找好地方，日夜不停地挖掘轰炸城墙的地道，最后装进了三棺材火药炸开城墙，于农历闰 6 月 10 日凌晨，攻入县城。城陷。马绍棠、王鸣真、赵科长等被俘。马廷贤军对全城百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杀害民众七千二百余人，这就是被鲁迅先生和一些正义之士揭露的震惊全国的“礼县屠城”事件。

王鸣真、马绍棠和赵科长被俘后，韩进录、王占林二匪首严刑拷打讯问，三人被打得死去活来，皮开肉绽，但他们宁死不屈。最后，马廷贤军士用铁丝穿透其手腕，反缚其手臂，然后用大铁锁锁其双手，系于马尾，押往天水，听任马廷贤亲自处理。马廷贤见其宁死不屈，就下令将其斩首示众，遗体被抛于天水的荒郊野外，头颅被悬于天水城门之上。

王基永遇难时年仅二十七岁。新中国成立后，追认王基永为革命烈士。

1950 年 5 月 8 日，毛泽东主席致信王基永烈士的遗孀龙亦飞，深切表示：“王基永同志殉难，极为痛惜。兹幸遗孤成立，业已就学，为之喜慰。抚恤及帮助令郎等工作或学习事须与全国同类情形者同样办理，未便某处独异，请向当地党政陈明情形听候处理。”

（作者单位：甘肃省陇南市西和一中）

岷县方言地名研究

王小红

摘要:因原有民族布局、历朝移民政策、活跃的地域交流而形成的岷县方言与岷县方言地名的名胜古迹、山石形态、军政需要、生产劳动、神话传说、当地宗族、地方物产等成因关系密切,而岷县方言地名更因其命名的随意性、分布的普遍性、传承的稳定性、意义的通俗性、内容的多样性等特征顽强地保存了岷县历史文化的部分本来面目,并揭示出岷县历史文化的一些重要内涵。

关键词:岷县 方言 地名

自从人类开始定居之后,方言便开始形成。《礼记·王制》中就有“五方之民,言语不同,嗜欲不同”的记述。那么什么是方言?通俗地说,方言就是各种地方话。语言学意义上的方言,指的是一种语言的各种地域变体。随着方言的产生,各个不同方言区的人,便以自己所使用的方言来命名周边事物。由此,同一事物便出现了不同的名称,如我们身边常见的蔬菜马铃薯,浙江温州人称之为“洋番薯”,福建厦门人称之为“番仔番薯”,甘肃大部分人则以“洋芋”来指代。与此同时,各种方言在语音、语调、语义等方面的差别也逐渐显现出来。

什么是地名?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行政区域或居民点所起的名称。亦即人类运用图画、语言、文字、数字等方式赋予特定时空内力所能及的地理实体或地理方位某种名称。我国的地名可以分为汉语地名、少数民族语言地名和方言地名。方言地名是在地域方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往往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方言地名除了具有地名的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代表性等一般性特征之外,还有其特殊之处,笔者在对甘肃岷县境内部分方言地名作了分析对比之后,现

将自己的观点陈述如下:

一、岷县方言的形成因素

岷县位于甘肃省定西市南部,在方言分区上,属于现代汉语北方方言中原官话区秦陇片洮岷小片。关于岷县方言的形成,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因素:

(一)原有民族布局为基础

岷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接壤地带,先后主要居住有戎、羌、藏、汉等民族,这些民族不但在地理布局上纵横交错,而且在语言文化上彼此影响。尤其自唐上元二年(761)到北宋熙宁六年(1073)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岷州被吐蕃所据,使汉族和藏族成为此地的主体民族,也使此地的地域文化更加异彩纷呈。岷县部分地名中的汉藏双语命名现象便是这一事实的有力佐证,比如岷县维新乡的宏福寺、西江镇的法藏寺、梅川镇的大崇教寺,它们的藏语寺名分别是“哇布”、“曲宗班乔”、“隆主德庆(也称“曲德贡”)”。

(二)历朝移民政策增活力

因岷县地处偏远,出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长远考虑,历朝政府曾多次向岷县进行移民。年代久远的暂且不提,有明一朝,政府就曾以军事驻防、移民实边、刑事处罚等多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此地移民,有史可稽的便有来自江苏南京、陕西华阴、山西洪洞等地的移民。这些移民不仅带来了他们的衣冠服饰和风俗习惯,更值得一提的是还带来了他们的方言,在开发岷县的同时,也使原有的岷县方言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比如当今岷县方言中,用以表示责怪语气的常用词语“军犯”,还有表示棉衣的词语“主衣”、

“裹身”以及带有明显军事意味的寨、堡、旗等一系列村庄名称，都表明迁入本境的移民对原有的方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活跃的地域交流作补充

岷县地理位置特殊，有“西控青海，南通巴蜀，东去三秦”之说。由于地处青海、甘肃、四川、陕西四省区的交通要隘，尤其和藏区的宗教来往以及和四川的贸易来往，便使以香客、僧侣、商人、学者、官员等不同身份的客商自西北、西南云集此地，这些来自不同方言区的个体经过长期频繁的交流融合，使现代意义上的岷县方言初具规模。笔者调查得知，西江镇部分周姓的祖先因家庭变故自四川保宁府逃来岷县，西江镇王仑村部分王姓的祖先也因在故土四川难以立足而前来岷县，而因宗教需要来岷县定居的僧侣更是大有人在。这些例证都足以说明，活跃的地域交流在一定意义上为岷县方言的发展和完善作了不容忽视的补充。

总的来讲，现代岷县方言是在古代北方官话的基础上，融合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方言而形成的一套完整的语言系统。方言地名的研究，既和方言本身的语法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和方言的成因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岷县方言地名的种类及特征

(一)岷县方言地名的种类

岷县总面积约三千五百平方公里，按传统分为东、西、南、北四个片区，笔者在这四个片区做了力所能及的调查之后，对岷县方言地名做出如下分类：

1.常见方言地名

常见方言地名具有北方官话区方言地名的共同特征，这类地名在北方的相邻省区内比较常见，且具有重合性和相似性等一般特征。岷县方言地名中这类地名如川、河、沟、滩、湾（亦有“塄”）、谷、台、山、崖、峪、冈、嘴、梁、顶、坡、坪、坝、里、巷、铺、庄、集、城等等，这里不再赘述。

2.特有方言地名

门。原应作“臺”，指水流在山峡中，两岸对峙像门一样，今统一作“门”。这类方言地名在岷县如

维新乡的大花门、西江镇的斜沟门、秦许乡的三岔沟门、维新乡的暗门等。

窝。原指鸟兽、昆虫栖息的地方，也指人体上凹进去的地方，如酒窝、胳肢窝、眼窝等，后来语义范围扩大，用以表示比周围地势稍低的地理位置，这类地名在岷县出现频率较低，如中寨镇的石窝、麻子川乡的旋窝、西江镇的黑鹰窝等。

磨。原指粉碎粮食的工具，通常由两个圆石盘做成，有石磨、水磨等类型。在以柴油、电为动力的钢磨未兴起之前，岷县各地以石磨和水磨为主要磨面设施，山区以石磨为主，川区以水磨为主。在水源充足且水流落差较大的地方，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水磨坊，后来时过境迁，这些磨坊的名称便成了名副其实的方言地名，诸如十里镇有朱家磨，西江镇有火石磨、台儿磨、黄家磨、温家磨等。

营。即营盘，指军队驻扎的地方。后来把军队驻扎过的地方也称营，并赋予这些地方新的功能。岷县城区称“赶集”为“跟营”，称逢集日为“逢营”，那么“营”便与“集”有了相同的商品集散功能。这类地名集中于岷县城区附近，有枋板营、网子营、牛营、箭营等。

寺。原指佛教的庙宇或伊斯兰教徒礼拜、讲经的地方。由于岷县历史上佛教盛行，留下许多关于寺院的地名，后来大部分寺院败落，寺名却作为地名被保留下来。这些地名不再仅仅代指寺院，也代指寺院附近的居民点，如人们初次见面回答对方的询问：“我是某某寺上人”或“我屋里在某某寺上”，这并不是说此人的身份是僧侣，而是寺院附近的居民，这类地方诸如秦许乡庞家寺、西江镇法藏寺、中寨镇下寨寺、维新乡哇布寺等。

路。作“地区”解，在宋元时期曾作为行政区划名称使用，如秦凤路、熙河路等。岷县方言地名中的路与行政区划并无关联，多因所在居民点的交通状况而得名，如西江镇的峨路、维新乡的麻路和盘路、麻子川乡的占扎路、寺沟乡的张马路等。需要注意，民国时期将岷县划分为东路、西路、南路、北路四个片区，指代范围较大，不作地名讨论。

族。本意指家族、宗族，也指少数民族部落。由于少数民族大多聚族而居，后来又不断有外族成

员加入部落,因此,这里的“族”既是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也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体。《明史》中便有“岷州诸番族”和“岷番十八族”的记述,这类地名和当地曾经居住的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存的如西寨镇的上三族、下三族,秦许乡的包家族、大族、泥地族、林家族等。

旗。一般意义上指清朝的满洲八旗,即正黄、正白、正蓝、正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八旗,以及后来增设的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目前在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曾驻扎过的东三省、内蒙古地区,“旗”依然作为县级行政单位存在,如伊金霍洛旗等。岷县方言地名中的“旗”,是明代卫所军制中的最低编制单位,这类方言地名多因明朝驻防此地的将军姓氏而得名,如施姓将军驻扎过的地方,便称为施旗。在维新乡及其附近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境内的洮河沿岸,还分布有马旗、展旗、武旗、王旗、陈旗、韩旗、唐旗、常旗等十来个以“旗”命名的村落。

堡。指在要冲地点作防守用的建筑物,岷县方言音,如维新乡有郭家堡、西寨镇有刘家堡、秦许乡有中堡、寺沟乡有杨家堡等。另外,在清末同治年间,民间为防御西北回民起义武装而修筑的防御工事,也称为堡,但这类建筑物并不指代具体居民点,如岷县西江镇有一座大顶堡,中寨镇也有一座大顶堡,皆因位于山顶而得名。

寨。指旧时驻兵的地方。这一类地名,多沿河流两岸的险要位置分布,如西寨镇的西寨,蒲麻镇的砖塔寨,中寨镇的小寨、八月寨、上寨、中寨、下寨,维新乡的徐家寨、下中寨等。一般情况下,人们在指称自己所属居民点的时候,大部分人称为“庄里”或者“队上”,而在岷县维新乡和秦许乡部分地区,则分别称之为“寨子里”、“堡子里”。

少数民族方言地名。由于岷县历史上番汉杂居,故而岷县境内除了汉语系方言地名之外,还有少数民族语系方言地名。这类地名一般多有重复,而且译法多样,语义不详。如岷县城南寺沟乡的“绿沙”,也写作“禄撒”,再如城北中寨镇的“攒都沟”,也作“川都沟”等。这类方言地名部分属于纯粹的少数民族语系,部分则由少数民族方言与汉

语方言结合而成,前者如寺沟乡的立珠、巴仁、多纳,西江镇的拉珠、阴尼尕尼、哈撒,维新乡的扎尕等,后者如秦许乡的上阿阳、下阿阳等。

其他方言地名。因神话传说、地方掌故甚至某种机缘巧合而得名的岷县方言地名,如清水乡的迭马、锁龙乡的锁龙、西寨镇的野狐桥等,这些地名大多各具特色,不成系统,此处不作详述。

(二)岷县方言地名的特征

方言地名深受地名一般性特征的影响。笔者认为,岷县方言地名除了具有地名的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代表性等一般性特征之外,还具有如下特征:

1.命名的随意性

命名的随意性是岷县方言地名的突出特征。因受山川险阻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史上的岷县人口相对较少且多集中在地理位置比较优越的河谷地方。后来随着本地人口的增长以及外地人口的迁入,有限的河谷地方无法满足人们与日俱增的居住需求,这便促使一大部分人进入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无人之地。那些最先进入当地的居民,对他们所选择的无名之地,大多按照当地的某一突出特征来命名而并不刻意追求地名的寓意。

2.分布的普遍性

分布的普遍性是方言地名的一般性特征。按分布空间来说,岷县境内各个乡镇的地名大都属于方言地名的范畴;按分布时间来说,各个乡镇的方言地名基本都是代代相因;按使用频率来说,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方言地名进行有效信息的交换。也就是说,遍布岷县各乡各镇的方言地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传承发展并为各地居民所广泛使用。

3.传承的稳定性

方言地名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稳定保持其独立的发展,并不受物质生活的变化和其它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特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独立性,属于方言地名的一般性特征。传承对于方言地名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方言地名传承的稳定性既是其分布的普遍性和内容的多样性的必要前提,也

是其旺盛生命力的有力保障。正是这种特性,才使方言地名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基本保持了原有的面貌。

4.意义的通俗性

方言地名之所以被人们广泛接受、使用并传承,正是因为其意义的通俗性。通俗性既是方言地名与人民大众关系密切的充分体现,也是方言地名区别于其它地名的重要特征,更是方言地名分布的普遍性和传承的稳定性的有力保障,这一特性也可以称之为实用性。岷县方言地名通俗易懂,不像“归安里(雍正初年,岷县多纳土司赵廷贤因触犯王法被改土归流,以其地为“归安里”)”、“维新(因“维护新集场”改镇名为“维新”)”等官方命名的地名那样具有强烈的政治寓意。

5.内容的多样性

岷县方言地名主要有上文提到的常见方言地名(川、河、沟、滩、湾、谷、台、山、崖、峪、冈、嘴、梁、顶、坡、坪、坝、里、巷、铺、庄、集、城等)和特有方言地名(门、窝、磨、营、寺、路、族、旗、堡、寨等)两大类,这些方言地名不但在类型上多种多样,而且在内容上纷繁复杂,涉及到当地的名胜古迹、山川形态、军政建置、经济生活、民俗文化、种族构成、地方物产等各方各面,能对该县诸如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县情作出较为全面的反映。

三、岷县方言地名的成因

(一)因名胜古迹而得名

这类方言地名因当地特有的风景或历史遗迹而得名,前者如西江镇王仑村的礅礅石,因当地被称作“石礅子”的红砂岩巨石而得名。后者如始建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的维新乡铁城(现已被毁),因城内龙兴寺的两根铁制旗杆而得名。再如秦许乡马焯仓,因明代岷州卫指挥使马焯而得名等。另外,佛寺、道观名称由专指寺观扩大到指代寺观附近的居民点也属此类,如秦许乡吉祥寺因曾有庞姓财主施舍资财,又叫庞家寺,今村名亦然等。

(二)因山石形态而得名

山石形态即山地、岩石等在地貌形态上显现出来的长、宽、高、坡度等外形甚至土壤、岩石等在色彩上显现出来的红、黄、青等颜色。冠以这类方

言地名的地方一般具有比较醒目的外在特征,表现出与周围环境不同的面貌,如梅川镇的鹁鸽龟山,西江镇的牌豁牙、青石沙豁岷,中寨镇的窗崖、红崖,维新乡的红石头等等。

(三)因军政需要而得名

军事驻防对于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朝廷的绝对权威更要通过对地方的统治来彰显。这些军事、政治方面的需求催生了一大批的方言地名,这类地方多因原有的军政设施而得名,如前文所举的营、旗、堡、寨,主要满足的是军事需要,起到防御、盘查等作用。再如铺、城,主要满足的是政治需要,起到物资输送、统辖一方的作用,如十里镇的十里铺、十三里铺、三十里铺,中寨镇的古城,西江镇的红城等等。

(四)因生产劳动而得名

传统的农业(包括手工业)生产劳动是在自然经济状态下,通过人力、畜力、手工工具等劳动方式,以土地资源作为生产对象而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目前在岷县国民经济总量中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这类方言地名多因农作物、役畜甚至手工设施、手工产品而命名,和生产劳动关系密切,如维新乡的青稞山、禾驮乡的牛沟、岷阳镇的瓦窑沟、西寨镇的连枷山等等。

(五)因神话传说而得名

神话传说源于人类对客观存在歪曲的反映,往往因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象的某种相似性而赋予前者虚幻的主观内涵,并将二者通过各种逼真的情节串联起来。这一现象在岷县十里镇的大卧龙、小卧龙两个方言地名中有充分的反映。十里镇的大卧龙和小卧龙,因传说有神龙驮九十九缸金子、九十九缸银子赶路,天明未到达目的地,化为山脉而得名。还有梅川与西江两镇交界处的金鸡嘴,传说远古时期洮河要在此处改道,两边群山正在缓缓移开缺口,却在金鸡报晓时分被下地耕作的农妇喊破,群山便无法移动,该地因此得名金鸡嘴。

(六)因当地宗族而得名

作为一种社会单位,较小的宗族可以称为家族,若干个宗族并在一起可以称为部落。岷县的这类方言地名大多在沟、山、湾、庄等村落名前冠以

宗族姓氏,表示当地居民的宗族归属,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表示土地归属,尽管这一宗族外迁或败落,地名却会稳定地得以保留。这类地方,如岷阳镇龚家堡子,岷山乡何家台子,西江镇杜家湾、唐家川,十里镇曹家庄、齐家庄、雷家庄,秦许乡秦家庄、许家庄、林家族等等。

(七)因地方物产而得名

地方物产包括植物和动物等类别。随着人口的迁入与定居,原本的无名之地便被新住民以当地的某类物产名称赋予新的名号,岷县方言地名在这一点上很有特色,如维新乡的韭菜坡、西江镇的蕨菜坡、苦韭花儿冈、荨麻冈等便因当地盛产韭菜、蕨菜、苦韭、荨麻而得名。还有的地方因当地曾生存过的某种动物而得名,如西江镇的老虎湾、黄鼠湾、熊子沟,维新乡的马鸡湾等,原来是有老虎、野鼠、熊和马鸡生存的地方。这类地名随着生态的破坏,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含义。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从岷县方言的原有民族布局、历朝移民政策、活跃的地域交流等成因和岷县方言地名的关系出发,通过对岷县方言地名中川、河、沟、滩、湾、谷、台、山、崖、峪、冈、嘴、梁、顶、坡、坪、坝、里、巷、铺、庄、集、城等常见方言地名和门、窝、磨、营、寺、路、族、旗、堡、寨等特有方言地名的分类和阐释,分析总结出了岷县方言地名命名的随意性、分布的普遍性、传承的稳定性、意义的通俗性以及内容的多样性等特征,揭示出了岷县方言地名形成的名胜古迹、山石形态、军政需要、生产劳动、神话传说、当地宗族、地方物产等重要内涵。笔者的研究仅仅从个人的经历和有限的文献资料出发,在某些问题的讨论上尚欠考量甚至存在错误,只能遗憾地付之阙如。文中的错误与不足,迫切希望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纠正和补充。

参考文献:

[1]政协岷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岷县文史[M].2009.12

[2]周振鹤 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0

[3]项梦冰 曹晖编.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9

[4]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

[5][清]张廷玉等撰.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4

[6]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概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10

[7]甘于恩主编.七彩方言——方言与文化趣谈[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3

[8]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1

[9]丘学强.军话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9

[10]徐兆奎 韩光辉.中国地名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1

(作者单位:甘肃省定西市岷县第六中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民勤部队番号考

孙明远 刘根德

1949年9月23日民勤解放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曾有过2次对于民勤的重要军事部署和行动,即解放民勤和接管建政。但是后来的多种书籍和文献资料或语焉不详,或相互矛盾,令人遗憾。笔者仔细阅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史》有关记载,和民勤现存相关资料进行比对,走访当事人、见证人,寻求谜团的破解,终于得到了较为清晰的答案。

《民勤解放》第12页“9月21日,我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所辖6军抵达武威后,经武威军分区、地委领导与6军指挥部联系,便派16师尖刀团——244团团长王绪带领部队北进民勤,执行解放民勤的任务。23日,民勤和平解放。”

盖子顺回忆录《艰难的岁月》“军分区接到信后,与路过武威的6军16师取得联系,派244团北进民勤。”

《民勤县军事志》第22页“9月23日民勤县和平解放,民勤县人民政府成立,第一任县长陈云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6军16师224团与中共民勤县工委,民勤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进驻县城,各界人民集会热烈庆祝解放。”

第一个问题是1949年9月第一个来民勤的解放军部队番号究竟是第6军16师224团还是244团呢?

经查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史:遵照中共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颁布的《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和1949年1月15日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1949年2月1日起全军统一编制了部队番号。224团当时属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25军75师,1949年9月正在皖南作战;244团当时属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28军82师,1949年9月正在福建作战。

由此可见,既不是244团也不是224团。

再查解放河西走廊的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所辖的第3军、第4军、第6军军史,结果第6军第16师第46团的前身是红25军225团。1935年9月18日225团编入新组建的红15军团为第75师第225团,1936年4月16日225团扩编为红15军团新的第75师,225团2营扩编为75师224团。224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期又历经多次改编,1949年2月1日全军统一番号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军16师46团。该团是老红军团队,战斗作风勇猛,执行命令坚决,作战经验丰富,攻守兼备,战斗力很强,是军、师主力团,也是一野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团之一。

经此查证,244团实为224团之误,而224团又实为46团。

第二个问题是第6军16师46团(224团、244团)北下民勤时来了多少人呢?

根据《彭德怀回忆录》解放兰州一节“有的团一千五六百人打得只剩三四百人了”,由此说明当时团的编制人数应为一千五百多人,一个营为五百多人,一个连含非战斗人员应在一百七十人左右。而叶建军回忆录《向往光明》说“军分区接信后,决定派二兵团244团团长王绪和政委率兵百余人,于20日早晨乘汽车5辆赶赴民勤。”陈云樵《任民勤县县长接管政权的一段回忆》“六军即派5辆汽车载满部队奇袭敌人。”按5辆汽车每车载人三十多人推断,当时46团所派兵力应为某营某连一个连兵力,并非全团兵力。既然是一个连,团长越级带连身份也有疑,有资料显示46团1949年4月到10月进疆前团长为连承先。

当时王绪以一个连的兵力报为团,也不难理解。因为一则武威解放后,9月20日第二兵团司

令员许光达正在部署第三军搞武威进城阅兵仪式,而第四军、第六军主力正在西进,数万国民党溃退败兵及行政机构人员在酒泉企图负隅顽抗,整个河西走廊战事还很吃紧,各处兵力不足;二则“兵者诡道也,实则虚之”,当时形势还敌我不明,解放军对民勤自卫队尚有戒心,所以以少报多,形成威慑,符合兵法。

第三个问题是第 6 军 16 师 46 团 (224 团、244 团) 究竟进民勤城了没有?

据叶建军回忆录《向往光明》“下午 2 时许,解放军到达距城三十里的小坝口时,因洪水阻挡,汽车不能过河。”“9 月 21 日早晨,我身着军服从齐腰深的急流中过河,会见了解放军二兵团 244 团团团长王绪和团政委及全团官兵。”“因为县城内的省警察已被消灭,所以王团长不再打算进城,就打电报请示武威军分区。军分区回电,另有任务。于是 244 团全体指战员即日返回武威。”由以上叙述证明第 6 军 16 师 46 团(224 团、244 团)未到民勤城,只在距城三十里的小坝口住了一夜后随即于 21 日返回了武威。

第四个问题是 9 月 23 日民勤解放时来的究竟是哪个部队呢?

根据叶建军回忆录《向往光明》“9 月 23 日,武威军分区参谋长魏先剑和指战员,会同民勤县委书记毛迎时……及工作人员数百人”。另据毛迎时《任民勤县委书记的片段回忆》“1949 年离开部队前,我是四军十师政治部民运科长。9 月上旬,我们随军到达永登住在满城时,突然接到师里通知,让我也离开部队到地方去工作。此时十师已抽了不少干部战士准备配备地方,搞建政工作”,“9 月 21 日由武威出发,一同北进的有我们的 32 个干部和十师的一个连共百余人。”“十师的那个连住南街,我们的干部和已起义的县自卫队住县政府。”另据 1949 年 9 月 27 日参加民勤县第一期地方干部培训班的离休干部刘玉华老人回忆“来民勤时毛迎时不超过 35 岁,陈云樵约 42 岁”。按此年龄推算 1992 年 8 月毛迎时写《任民勤县委书记的片段回忆》时不超过 78 岁,加之他本人是第 10 师的,记忆和回忆应不会有错。再据 1995 年版《民

勤县志》编辑李万禄老人回忆:“9 月 23 日,我作为学生队伍的一员参加了欢迎仪式,来的总共 200 人左右”。不难算出 200 人减去 32 位干部刚好 170 人左右,符合一个连编制。现年 98 岁的原 3 军 8 师 23 团 1 营政治教导员康敏老人也证明是 10 师的一个连。所以 9 月 23 日民勤解放来的应该是武威军分区参谋长魏先剑带领第 4 军第 10 师某团某营的一个连。

第五个问题是,第 4 军第 10 师的这一个连在民勤驻了多长时间?为何还有驻军 3 军 8 师和 88 师之说?

《民勤县志》1995 年第一版第 569 页第二章第一节驻防军三、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1949 年 9 月至 1951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三军八师一连,武威军分区警卫营二大队县支队分驻县城、柳林湖等地执行剿匪任务。”《民勤县军事志》第 102 页第五节驻军的表述与《民勤县志》相同。这与前面所说的第 4 军第 10 师的一个连又有了矛盾,这是怎么回事呢?再查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史》可知,1949 年 10 月整个河西走廊至新疆全部解放后,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第 3 军驻防河西走廊,军部驻张掖,第 7 师驻高台,第 8 师驻武威,第 9 师驻酒泉。原武威军分区撤消,军分区司令员陈仕南调武都军分区任司令员。驻武威的第 8 师代行武威军分区职责,第 8 师师长杨嘉瑞兼武威军分区司令员。第 4 军调临夏、临洮驻防,所以第 10 师的这个连在民勤驻的时间并不长,1949 年 10 月头就陆续开走了。据李万禄回忆“这个连驻时间不长就走了,十月学校又组织我们到距城南三四里路的王家碱滩欢迎部队,部队人多,足有 500 人。”。据刘玉华回忆“八师的部队是十月才来的,来时十师驻民勤的解放军只有七个人了,他们来了 500 多人”。由此可见,10 月中旬来民勤接防的正是第 3 军第 8 师第 23 团第 1 营全营官兵,营长张智海,营政治教导员康敏,副营长杨有生。这也和叶建军回忆录《向往光明》“民勤县蔡旗堡一带有散兵一百五十余人。本来是步兵,由于抢劫群众骡马,变成骑兵。……决定由魏参谋长、敏营长率领指战员百余人,轻装前往蔡旗堡围剿”互

有印证。国民党军队实行一元领导,无政工长官。而我军实行二元领导,政工首长分政委(团及团以上政工首长)、教导员(营)、指导员(连)等称呼,所以叶建军称营政治教导员康敏为营长亦合情合理,叶建军在回忆录中称康敏为“敏营长”,也是因为往事久远,记忆不清了。

第8师23团1营进驻民勤后,多次执行剿匪任务,为保卫民勤新生的人民政权,巩固革命成果,稳定社会治安作出了贡献。该营是民勤解放前后,解放军驻军人数最多的部队。1950年5月,该营奉上级命令抽调两个连进祁连山剿匪,民勤留下了一个连驻防。1951年春,朝鲜战争爆发后,剩余一连也调走,该营全部入朝补充到42军125师375团,原营政治教导员康敏升任375团政治部主任。

《民勤县志》1995年第一版第591页和《民勤县军事志》第126页均有“1951年10月,残匪约100余人窜至夹河乡骚扰。武威军分区警卫营奉命与三军八十八师二十二团二连赴夹河围剿。”查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史》,88师在1949年属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30军,1950年1月第30军撤消番号,88师改隶第9兵团26军,随后26军又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于1950年11月入朝。再查知1951年10月驻守武威的仍为第3军第8师,直到1952年6月,第3军与第1军合并,取消第3军番号,第8师与第1军第2师合并,第8师番号取消。所以《民勤县志》1995年第一版第591页“三军八十八师”也是第3军第8师的误记。至于有些文章出现“三十三团”,也系23团之误,因为33团属第4军第11师,1949年10月至1952年6月不在武威辖区驻防。

综上所述,诸多谜团和疑问均有了答案:

1949年9月20日早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第6军第16师第46团某营某连奉命在王绪带领下乘5辆汽车北下民勤。当天下午2时,到达距城南三十里的小坝口,因南沙河发齐腰深的洪水,人车均不能过河,遂停止行军,

开锅做饭,休息待命,等待洪水消退。傍晚,接到叶建军省警察已被消灭的报告后,决定原地过夜。于21日奉命乘车返回武威。返回途中,于钟家大门(今凉州区九墩乡北)附近遇见了21日从武威出发来民勤的武威军分区参谋长魏先剑带领的第4军第10师某团某营某连解放军,民勤县委书记毛迎时、县长陈云樵等32个地方干部约200人。这些北下民勤来接管政权的领导班子和解放军指战员,21日从武威出发,经俞家湾(今凉州区中坝镇)、钟家大门(今凉州区九墩乡北)、香家湾(今民勤县重兴乡)、龙王庙(今红崖山水库北),于22日傍晚到达小坝口过夜。这时南沙河洪水已消退。23日中午到达民勤城。两天半行军200里,应该是徒步跋涉。到民勤后,第4军第10师某团某营某连部队驻县城南街东面的大营盘(今工会处),该连10月初陆续调走。10月中旬,来民勤接防的是第3军第8师第23团第1营全营官兵,该营于1950年5月调走两个连,留一个连驻防。1951年春,留守的这个连也奉命调走,由8师22团某营2连接防。

参考资料:

-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史》
- 《彭德怀回忆录》
- 《民勤解放》
- 《民勤县志》1995年第一版
- 《民勤县军事志》
- 《艰难的岁月》盖子顺著
- 《任民勤县委书记的片段回忆》毛迎时著
- 《任民勤县县长接管政权的一段回忆》陈云樵著
- 《向往光明》叶建军著

【作者简介】孙明远:中国共产党民勤县历史编纂组、民勤县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刘根德:中国共产党民勤县历史编纂组、民勤县地方志办公室特约编辑

世界文化遗产——瓜州锁阳城遗址

李春斌 胡艳

瓜州县锁阳城,原名苦峪城,处在瓜州县城东南 62 公里处荒漠戈壁中,属现今瓜州县锁阳城镇境地。据有关史料记载和专家考证,锁阳城最早在汉代是冥安县所在地,晋代属于晋昌郡管辖。唐设瓜州郡于此,这个时期,是锁阳城的鼎盛时期,现在的瓜州、玉门、新疆哈密等地都是它的管辖范围。薛仁贵、张守珪、章怀太子等名将曾任指挥使、刺使。从汉、唐、宋到元代,锁阳城一直是瓜州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宗教文化中心。到了明代嘉峪关关闭,这里成为游牧民族活动区域,而逐渐衰落废弃。这里的古代军事防御体系和古代农田水利灌溉体系完好程度堪称全国之最,是集古河道、古城址、古寺院、古墓葬为一体古文化遗存地。

此城其所以流传叫锁阳城,是因为有一段传说:唐代名将薛仁贵奉命西征,一路顺利,可是打到苦峪城后,中了埋伏,被哈密国元帅苏宝同围困在城中。唐军虽多次冲击,仍冲不出重围,只能固守苦峪城。一天天过去了,城中粮草快要断绝,老将程咬金杀开一条血路去长安搬救兵,薛仁贵号召将士节衣缩食,并亲自带人挖草根树皮充饥,以待援兵。有一天,薛仁贵发现城周围田地里生长的一种植物和红萝卜一样,名叫锁阳,可以食用,便命令将士挖出来充饥,这里遍地都有锁阳,将士们挖吃锁阳一直坚持到程咬金救兵到来。以后为纪念锁阳解救全军性命一事,就把苦峪城改为锁阳城。

锁阳城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具体筑城年代无从考证,但从城中发掘出的开元通宝等唐代器物 and 城外白塔下挖出的唐碑断定,城的始筑年代当不晚于盛唐。文物部门考证,锁阳城就是唐代瓜州的治所晋昌县城,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 622 年)于此置瓜州,设总管府,督肃、瓜、沙 3 州。明代作过哈密卫的治所。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考证,该城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

民国时期在锁阳城附近发现一块半截石碑,据考证为唐代地名碑,当时称为唐朝断碑。据中华民国《安西县志》第二部—甘肃省通志·安西县采访录记载:“唐朝断碑在苦峪城东半里寺基内,字画不甚剥落。一面逼真唐体,虽未为唐人极佳者,而断非唐后之书。因首尾残缺,仅存中段,文义不能连贯。而总系大中时复河湟,张议潮归唐授爵。内有‘大兴屯垦,水利疏通,荷插如云,万亿京坻’,‘称功颂德’等语。其一面字体流入五代宋初,文意与前大略相仿,似颂曹议金之语。夫张、曹二公本治沙州,而瓜州亦其兼统,此处总系瓜州地方。但当日此处地名碑文缺失无考”。可惜这块石碑失落已久未能保存下来。

锁阳城气势雄伟,规模宏大,分为外城和内城。外城总面积 81 万平方米,在战争时期又成为阻击入侵者的外围防线。周围建有关厢,关厢前面地带宽阔,是养马、练兵的场所。关厢外西北角有小土堡两个,很可能是用以关押战俘和处罚士卒的地方。内城总面积 28 万平方米,城墙夯土版筑,高 10 米,宽 5 米,城墙四角有角墩,西北角的角墩保存最为完整,高 18 米。登城而望,但见搗石堆积,房屋遗迹遍布,城内外散布有大量的陶片、砖瓦,百里山川,尽收眼底。内城分东西二城,有 4 个瓮城,城的四周还筑有若干用以加固城郭的马面。一条南北走向的墙把全城分成东西两部分。东城较小,据说是当年驻军将领及其家属的住地。西城较大,据说是驻扎士兵的地方。城内布满沙丘、积炭堆、瓦砾和断墙残壁,长着红柳和沙生植物。西城内有一口深约 1.5 米的水井,传说这口井是唐代名将薛仁贵西征途中被困在此城时挖的。井旁有棵老柳树,也传为唐人所栽,称之为“唐柳”。城西北角有一高大的点将台,点将台旁有一大堆积炭层,传说是唐代哈密国元帅苏宝同占领此城时铸造兵器和起炊的遗址。

外城、内城、羊马城、瓮城、马面和高大的角墩与远处烽燧等军事设施遥相呼应。支渠、毛渠、斗渠等水利设施与大片耕地交错相连。这些遗迹、遗址现在依然清晰可见,保存非常完好。

距离锁阳城东 1 公里处有座塔尔寺遗址。塔尔寺即唐开元寺,为唐代著名寺院,是当年官方和百姓祭祀的佛教寺院,四周有土筑围墙残迹,寺门西南侧有僧舍及大殿厢房台基,遗址北侧有小塔 11 座,其中主塔高 14.5 米。祠旁不远,有一个十多亩大的凹坑,坑内坟头累累,很可能是古代死亡将士的墓地。据《大唐玄奘法师传》记载,唐开元三年玄奘取经,途经瓜州,在此讲经说法一月有余,一时香火旺盛,高僧云集。

锁阳城地处大漠深处,登城远眺,南面荒漠一片,远处祁连山峰洁白明净;北边,田野中大大小小的水泊湖池闪闪发光;西面,广阔的草原绿草如茵。城周围天阔地广,苍茫幽远,塞外风光尽收眼底。

锁阳城遗址及墓葬于 1957 年 3 月 5 日被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锁阳城墓群归入锁阳城。

2000 年 8 月 18 日,甘肃省省长宋照肃同志前往锁阳城参观考察,对锁阳城给予很高评价,欣然写下“锁阳照日月,安西定乾坤”大幅题词(安西 2006 年更名瓜州)。2000 年 10 月,甘肃省旅游局组织中科院院士李吉均及旅游规划建设方面专家学者考察锁阳城。专家们一致认为,锁阳城无论从规模、周边环境、历史文化积淀都优于新疆的高昌、交河和楼兰故城,如果能得到开发,将会带动酒泉和嘉峪关以及张掖地区的旅游。近年来,先后有世界旅游组织亚太地区总干事雷德先生、文化部部长孙家正、香港孔教学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珠海市政府代表团一行,深圳上市公司总裁刘承运先生及美国大东洋投资控股集团副总裁周建华、日本文化旅游界专家宇田川浩一、小林克、秋本英雄等一大批中外著名人士慕名前来参观考察,均对此无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深感惊叹。

2006 年,由中国政府牵头,会同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共同签署一个联合申遗行动计划,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积极协调下,启动丝绸之路跨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2012 年 5 月,项目名称调整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由中国和中亚两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3 个国家入选 33 处文化遗产点,其中,中国有 4 个省 22 处。甘肃省入选 5 处,其中,酒泉市的锁阳城、悬泉置、玉门关遗址入选丝绸之路申遗大名单。

自瓜州锁阳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到 2013 年 10 月间,瓜州县按照申遗各项要求,为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建成锁阳城遗址博物馆和锁阳城遗址旅游管理服务中心等文物保护旅游接待设施,配备管理服务工作人员编制 30 人,其中专业导游 5 名,配备游览专用车 8 辆,于 2013 年 8 月按照旅游行规正式开展旅游业。2013 年 10 月 19—20 日,包括瓜州锁阳城在内的酒泉市 3 处遗产点接受国际专家现场检查验收。

2014 年 6 月 22 日,北京时间 15 时 49 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 21 国代表组成的世界遗产委员会 21 名成员,审议表决通过“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至此,历时 8 年时间,酒泉市锁阳城、悬泉置、玉门关 3 处遗址正式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2015 年 11 月 27 日,甘肃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公示,酒泉市瓜州锁阳城景区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瓜州锁阳城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瓜州有了自己的世界文化遗产,有了瓜州新的名片,文化综合竞争力、市民幸福感认同感得到空前提升。申遗成功,极大地提升瓜州文化、旅游知名度;更好地改善遗址的硬件设施;获得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瓜州文化、旅游产业将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作者单位:瓜州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崇信县民俗“三绝”

张涛

崇信县位于甘肃省平凉市东南部，县境内西南部山区属关山余脉，是绿色屏障，中东部长期被雨水切割成狭长的两川两塬地貌特征。具有独特的黄土高原地理环境，形成了悠久浓郁的民间习俗，崇信县的点“法”、点灯背猴、娶“黑媳妇”被称为“民俗三绝”，2009年被平凉市政府公布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受到全县人民传承并发扬光大。

点“法”主要流传于崇信县黄花乡、新窑镇一带。每年端午节前，山里的放羊娃早早从杨柳树上砍下树枝，选一根粗壮高大的木头做芯子，栽在早已选好的一个高山岭上，将其它树枝围绕着芯子垒成宝塔形，就是“法”。到了端午节当天凌晨四五点钟，全村男女老小戴上早已准备好的各式香草荷包，端上早已做好的酒醅子、晶糕、熟鸡蛋，吆上自家的牲口汇集到垒“法”的地方，人们围绕“法”把各自的食物摆在“法”的周围。一个羊倌用火将“法”点着，红光满天，划破黑暗，噼噼啪啪燃烧声不绝于耳。人们相互品尝节日食品，喧闹声、牛羊的叫声、铃铛敲打的金属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山区特有的节日交响曲。这时，一些姑娘、小伙子情不自禁地手拉着手围着大火堆跳起舞来，把“点法”推向高潮。直到天色大明，人群、牲口才慢慢地散去。接着一些姑娘、小伙子到山洼洼、沟坡坡拔地椒草，在野鸡冠花、蒿子草上摆露水。据说，姑娘的手摆过露水锈花捏针不出汗，并且心灵心巧；小伙子的脚摆过露水会变得勤快，早早娶到媳妇。最后，他们折些柳枝插在自家的门口，避邪招吉。

点灯背猴 普遍流行于崇信县各乡村的特色民间民俗文化活动，历史悠久，寓意深远。背猴点猴灯的意思是传承香火，人们认为猴是人的祖先，人类的根，所以男方要到女方家点灯背猴提取香火。正月十五这天，先一年嫁出女儿的人家，请来本村或亲戚家擅长捏面灯的妇女，用酒谷或粘糜面团捏制和家中长者岁数相同数量的面灯，再捏

成一个高一尺许的面猴，猴的头顶、肩膀、腰背、膝盖、脚面等处共放九盏面灯，代表九九为大。灯芯是用火柴缠上棉花而成，加清油点燃。傍晚时分，村里大人小孩围拢到一块，等待点灯。东家在院子里摆放一张方桌，上面再放一个炕桌，炕桌上再搁一小木斗安放面猴，周围摆放一圈又一圈的面灯。新婚夫妇来到人群中间，先给所有面灯里添上食用的清油，然后一对新人同拜天地，再拜面猴面灯及父老乡亲，接着用麻杆点火，从面猴头顶那盏灯开始，将所有灯一一点着，待人们欣赏一番后，随着一声“抢”，大人小孩一拥而上，所有的面灯即被一抢而空。那尊面猴，理应由新女婿端走，若被他人抢走，新女婿就要带上礼品将面猴赎回。至此，点灯即告结束。次日，新婚夫妇背着面猴回家，擀成面卷吃掉。“点灯”寓意是新婚夫妇一生头清目明。

娶“黑媳妇” 流传于崇信县北塬黄寨乡、柏树乡一带的古老风俗习惯，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其起源有两种说法，一说相传古时，北塬区一位富户人家的公子看上了一个其貌不扬但却琴棋书画皆通的聪颖女子，非她不娶；女子也倾慕公子的才貌而非他不嫁，这本来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却难坏了爱面子的公婆，婚期一推再推。后来，不知是谁出了一个主意，将结婚的时辰定在了晚上，婚期的前一天下午，婆家人抬着花轿，赶天黑来到新婚女子娘家。吃过晚饭，抬上新娘子，不吹不打不放鞭炮，摸黑赶路，无论如何也要在天亮之前赶回。这样，“丑媳妇”便巧妙地避开了众人的瞧看。二说在汉代将月氏从河西迁来，在本县黄寨、铜城、崆峒区白水一带设立一个月氏道（相当于今少数民族自治县），有一个首领欺负没有结过婚的少女，人们为了躲避他，在两头不见太阳时娶亲和迎亲；久而久之，演变成了当地的一种风俗习惯。20世纪90年代后，娶“黑媳妇”的现象渐少甚至消失。

（作者单位：崇信县地方志办公室）

甘肃省农垦事业办公室重视二轮修志工作

甘肃省农垦事业办公室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精神,从加强组织领导,调整修志机构,充实补充人员,全力做好保障等方面,进一步推进二轮修志工作。

甘肃省农垦事业办公室在二轮修志中承担省志农垦分卷的编纂工作。2015年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之后,省农垦事业办公室召开专题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调整了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组成人员,甘肃省农垦事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省农垦集团公司董事长杨树军任主任委员,省农垦集团公司总经理何宗仁任副主任委员,其他党委成员任委员,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农垦系统工会主席王海清兼任编纂办公室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脱贵江兼任编纂办公室副主任及主编,在系统内抽调了一名熟悉农垦情况、擅长文字写作的基层企业党委书记任专职副主编。针对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编纂处关于《〈甘肃省志·农垦志》

(1989—2010)初审稿审读意见》精神,认真讨论研究,提出具体方案,靠实工作责任,实行层级负责,调整篇目章节,细化篇章布局,补充完善资料,排出工作计划,列出进度节点,参加省上培训,提升业务素质,尽快开展工作。并派员赴上海农垦考察学习了《上海农垦志》和《光明食品志》的编纂经验,结合甘肃农垦实际,对《甘肃省志·农垦志》(1989—2010)复审稿篇目进行了调整、完善和修订。与此同时,省农垦事业办公室积极加强与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处的联系,主动汇报工作,虚心请教业务,并邀请领导和省志处检查指导工作。

据悉,《甘肃省志·农垦志》(1989—2010)复审稿,正在加班加点,紧锣密鼓地修改完善,经过努力工作,预计在年内能够完成修改完善、内部自评,提交复审等工作,力争通过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评议终审。

征稿启事

《甘肃史志》是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办的全省史志类学术内部刊物,主要栏目有特载、工作论坛、文件选编、续志研究、篇目选登、史地考证、历史回眸、陇原人物、旧志整理、乡情民俗、志鉴动态、成果展示、史志随笔等。

投稿作者请提供真实姓名、署名单位全称、详细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

来稿注释请采用脚注,序号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参考文献条目编排在文尾,注明文献题目、刊名或出单位、编著者、起止页码等。

所有来稿请寄送纸质文本的同时以 word 格式发送电子邮件,邮箱:3498763120@qq.com。稿件一经采用,按国家有关规定酌付稿酬。

投稿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 51 号省统办一号楼 9 楼 927 办公室

邮 编:730000

联 系 人:汪举红 孔令奇

联系电话:0931—7821931 7821927

《甘肃史志》编辑部

《清水县志》（1991—2010）评审会议召开



5月19日，清水县召开《清水县志（1991—2010）》评审会议。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钱旭、市县志指导处处长贺红梅、天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建杰、天水市志办主任李宽余，天水市志审稿委员会成员，市保密办主任王建民，天水师范学院教授雍际春、刘雁翔、余粮才，天水市五县二区志办主任，清水县委副书记、县长马越垠，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王新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秀丽，县政府副县长杨庆森，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及县志编委会部分成员单位负责人共计5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秀丽主持，县委副书记、县长马越垠致辞。

会上，清水县志办主任石瑜首先汇报了二轮《清水县志》编纂情况。与会人员就二轮《清水县志》进行了认真评议。大家一致认为二轮《清水县志》体例完备，文风朴实，篇目设计较为合理，内容较为翔实，但志稿在篇目设置、特色的凸显、语言文风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

（怡晓红组稿）

傅亚峰作品赏析

